

# 革命史譚目次

馮序

自序

總理在香港……

總理習醫年齡的攷證……

「總理習醫校名的考證」增訂……

關於鄒著「中國國民黨史稿」的幾句話……

總理民元就任大總統記……

掃除封建的諡號……

記中國永除帝號的本末……

從護法之役談到復辟案件……

討袁珍聞……

目次

一

(一) (一五) (二〇) (二九) (三七) (四五) (四八) (五三) (六五)

五四運動的意義和效果·····	(七〇)
革命黨與基督教·····	(七六)
評介「革命逸史」·····	(一三一)
續談「革命逸史」·····	(一三七)
對金著「清史大綱」的黨史研究·····	(一四二)
對高小教科書「七十二烈士」批評·····	(一四九)
讀陳恭祿盧紹稷所述黨史後·····	(一五三)
研究中國革命史的我見·····	(一五八)
廣學會與革命運動·····	(一六三)
三、二九的二三事·····	(一六八)
卅二年前巨浪中的泡沫·····	(一七三)
辛亥革命的側面故事·····	(一八二)
史堅如口供的紅痕·····	(一八五)
民初悍吏陳景華·····	(一八七)

蘇曼殊蓄意槍殺康有爲·····	(一九八)
四大寇中之陳少白·····	(二〇三)
亦禪亦俠的潘達微·····	(二〇九)
總理的一位師友楊襄甫·····	(二一四)
四川黨人吳山的生平·····	(四一九)
蘇報案鄒容的收屍者劉三·····	(二二七)
楊雲史阻止兇手行刺總理·····	(二三一)
革命的教育家鍾榮光·····	(二三三)
琴書自娛的李仙根·····	(二三九)
懷悼報人廖平子·····	(二四六)
感悼革命元老李紀堂·····	(二五五)
憶王陸一·····	(二六〇)
徐宗漢女士·····	(二六六)
「革命通」馮自由·····	(二六九)

胡適之與競業旬報……………(二七五)

革命雜事談叢……………(二七九)

粵秀山上的三老樓——總理步行演講三民主義——孫夫人未隨北伐之原因  
——李紀堂籌款奇謀——劉錦洲裝瘋脫罪——毛文明不住公家房子——嶺  
南培英是革命機關——尹文楷自認不能做官——排滿通俗歌詞——優待清  
室條件主稿人——吳義如善於化裝——順德三傑趨向不同——從事革命的  
教士——練達成借教排滿——馬君武勇挫陳羣——林瑞銘運藥炸倭相——  
蔡鍾浩的死別——曲石詩錄中的革命稗史——章太炎家裏的鱷魚皮——趙  
聲詩文拾屑——「中華民國萬歲」牙印質疑



# 革命史譚

陸丹林著

## 總理在香港

中國國民革命的搖籃地，可以說是香港。雖然總理在廣州博濟醫院肄業的時候，已經潛伏了排滿的思想；不過只是和鄭士良們私人間談談罷了，那時還沒有具體的計劃和組織及行動。後來總理轉學到香港西醫書院，常常和陳少白、尤列、楊鶴齡們互相討論，大倡排滿理論；那時革命大業，纔開始播種。那麼，香港說是國民革命的搖籃地，自有實際的歷史性了。香港既然和中國革命有這樣的深切關係，就談談總理在香港居留的一切。

總理生平第一次到香港，有歷史可以稽考的，是他十八歲那年（民國紀元前二十九年公曆一八八三年），因為在香港（中）山翠亨鄉與陸皓東毀壞了鄉中北帝廟偶像，避免鄉人的怨恨，就到香港入拔萃書院讀英文；第二年的正月，轉學皇仁書院。冬天，往檀香山。二十歲那年的春天，返國成親，秋天，再次

到港入皇仁書院繼續讀書。廿一歲，在廣州博濟醫院學醫。廿二歲，轉學香港西醫書院。這一個時期，可以說是他一生偉大事業的轉捩點。

總理自傳說：『予在廣州學醫甫一年，聞香港有英文醫學校開設，予以其學課較優，而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按香港學校肄業。數年之間，每於課程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辭，無所忌諱。時聞而附和者，在香港祇陳少白尤少執楊鶴齡三人，而上海歸客則陸皓東而已；若其他之交遊，聞吾言者不以爲大逆不道而避之，則以爲中風病狂相視也。』又說：『余與陳尤楊三人常住香港，听夕往還，所談者莫不爲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爲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爲革命之問題。四人相依甚密，非談革命則無以爲歡，數年如一日，故港澳間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爲四大寇。』可見他那時的心志了。所謂寇者，當時因洪秀全反清未成而敗，清曾目之爲寇；而總理與陳少白尤列楊鶴齡四人的志願，與洪秀全的反清相同，所以當時的親友們就說他們做「四大寇」。

總理從民元前二十五年轉入香港西醫書院後，前後六年，都在香港。畢業

的時候，各科都滿分，只有一科是九十分。教員與考試官舉行會議，說他是書院內最好的學生。結果是加他幾分，他得到全部滿分的榮譽。畢業的證書副本，現在還存在香港大學。證書，由監督和教員十三人，試官八人，與牧師書記等簽字。英文是監督寫的，中文是陳少白寫的。由香港總督羅便臣親為頒發。准以內外科產科行世，是在香港華人領得醫照的第一人。這一天，是民元前二十年（一八九二年）七月廿二日。

排滿機構的發軔，本在廣州的廣雅書院，在那時同志寥寥，沒有什麼組織。到了甲午年（民元前十八年公曆一八九四年）的冬天，總理由檀香山歸港，爲了時勢的需要，即和鄭士良、陸皓東、黃詠襄、陳少白、楊鶴齡、尤列等聯絡各省同志，擴展興中會的組織，成立幹部。同時聞得楊衢雲謝纘泰們輔仁文社，同是站在排滿陣線，雙方經過幾次的接洽改組，於是兩派合流，仍用興中會名義，合併爲一。設總部於士丹頓街十三號，假託做買賣的莊口，挂著「乾亨行」招牌。這一個「乾亨行」，就是中國革命黨在南方比較有組織的最初革命總機關了。當時入會的一律要當衆宣誓，誓詞云：『驅除韃虜，恢復中

國，創立合衆政府。倘有貳心，神明鑒察。』

幹部會議決定後，總理計劃決選會黨三千人，襲取廣州，在西營盤杏花樓討論攻取方略。後來廣州事敗，陸皓東丘四朱貴全程奎光等殉難，這是中國革命第一次的首義與失敗。總理設法逃到香山的唐家灣轉澳門到港，往見他的老師康德黎醫生。康醫生介紹給達思尼律師相談行止的方針。恰值港政府答允清廷的請求，有禁止總理五年入境之令。於是總理便和陳少白鄭士良等到日本去了。這是民元前十七年的冬天十月的事。

他自這次離港之後，直至民元前十二年（一九零零年）夏天來香港。這次到港，雖屬禁止五年入境的命令期滿，但仍被禁止登陸，只得在船上逗留。紀元前十一年，再度到港，表面上沒有受到干涉，可是，在他離港不久，港政府又重申禁令了。

說到香港政府禁止總理入境的經過，牽動很大。香港法例彙編（民國二十五年香港華僑日報出版）乙編「醫業登記暨孫中山先生與香港法律及醫學之關係」，有極詳盡的記載。這是極好的直接史料，茲摘錄於后：

「……惟稽諸香港史書，載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八年間，孫先生與香港法律之關係，及英國衆議院關於此事之質訊，均有詳細之紀述，是亦爲孫先生革命史重要之一頁，用將其事編譯如后：

「一八九六年歲初（遜清光緒廿二年丙申），本港政府接據報告，以中國革命首領孫逸仙醫師反叛滿清政府，有違反香港法例之所爲。遂由當任總督威霖羅便臣遵照一八八二年第八號條例第三條規定，於是年三月四日下令放逐出境，由該日起以五年爲期。孫醫師籍貫廣東香山縣（改稱中山縣），早年在夏威夷（檀香山）讀書。嗣來港雅麗氏醫院附設之西醫學堂肄業。一八九二年卒業，爲該校第一屆畢業生。當下令放逐孫醫師出境時，孫已離港赴英，旋被誘捕非法幽禁於倫敦中國公使館。中國公使欲設法押解回國治罪。時香港西醫學堂教師詹士簡德利（有譯作康德黎——丹註）醫生方歸英國，乃以師生之誼爲之奔走營救。事既張揚，英國上下，咸知此事，以中國使館擅捕駐在地之本國逋逃政治犯，大悖國際公法。當經英國外交部向中國公使嚴重交涉。孫醫師乃得恢復自由，遞赴日本。

「孫醫師途次橫濱時，曾致書於香港當道，要求取銷前令，許其歸港居留。港政府以前頒放逐出境令，尙未屆滿期，礙難收回成命。乃由當任輔政司史超活駱克復函拒絕。原函云：

孫逸仙先生：頃接來書，備悉一是。來函係未註明寄發日期者。

茲奉上峯命函復先生。本政府雅不願容許任何人在英屬香港地方組設策動機關以爲反叛或謀危害於素具友誼之鄰國。茲因先生行事誠如來書所云：

「弔民伐罪，爲解除國人備受韃虜專制暴虐之羈絆。」凡若所爲，有碍鄰國邦交，自非本政府所能容許者。如先生貿然而來，足履斯土，則必遵照一八九六年所頒放逐先生出境命令辦理，而加先生以逮捕也。謹此奉復，香港輔政司史超活駱克。一八九七年十月四日（遜清光緒廿三年丁酉九月初九日）

「本港政府既拒絕孫先生之請求，所頒放逐出境命令亦非因關係港地治安而發。故當時報章評論，社會輿情，於政府辦理茲事，頗多非議。迨後此訊傳至英國，英國上下亦多以國際公法應當遵守而表同情於孫先生者。及至一八九八

年，英國衆議院於四月五日（光緒廿四年戊戌二月二十五日）開會，有南美奧地方代議士茂藻戴維德，特因此事提出質問，要求理藩院大臣加以答覆，其問題如左：

「孫逸仙醫生於一八九六年由香港放逐出境，其理由安在？彼在港曾否犯案？罪名如何？或被當地政府控告否？渠有無顯著犯罪行為與違反香港法律而經過審判程序否？如有之，其審判紀錄或卷宗有呈報理藩院否？如未嘗經過審判程序，遽下命令，加以放逐出境處分，此項命令，能否撤回？」

「理藩院大臣參伯連逐款加以答覆。其答案如下：孫逸仙先生一八九五年離去香港。當是時，港政府據報，中國發生革命，黨人幾度舉義謀奪廣州。孫均與於其事。嗣據探報，孫將有回港之行，港政府行政委員會遂下令將之放逐出境。彼未嘗違反當地法律，未被控告，亦未被官廳審判成立罪狀。該放逐令現且是否有效，或有無爲之申請撤銷等情事，本席概無所知，容當令行前途查明真相云云。」

「當日之放逐出境令，乃適用一八八二年第八號條例第三條規定辦理。查

本港政府一八五五年一月十五日在滿清政府與太平天國發生內戰時頒布是年第一號嚴守中立條例，取締當地官民干預中國內戰。明年一月二日，另訂一八五六年第一號條例，以補充前例未盡事宜。嗣以洪楊黨羽混跡港地，藉洋界爲護符，一方爲謀補充糧精軍械，一方爲便利募兵襲擊九龍，港島治安，至受影響。港政府遂於一八五七年一月一日，頒布是年第九號維護地方治安條例。迄一八八二年重訂，爲是年第八號放逐出境條例。凡在境內之外籍人民有擾害人民治安之嫌疑者，得下令驅逐出境，當日政府即根據該例第三條規定將孫先生放逐出境者也。

「查一八八二年第八號放逐出境條例第三條條文規定如次：『本港行政委員會得以命令禁止任何人之非在本港出世者或非屬於英國籍者在香港地方住居或入境，以不逾五年爲限。併得在所頒布命令或另行頒令明定驅逐出境日期。所有依照本條規定頒發制止入境或住居本港之禁令，須併附其理由。』依據上開條文規定，凡有驅逐出境者，應並宣布其理由，故英國議員戴維德在衆議院提出質問時，開宗明義，即以放逐理由安在爲問。而理藩院大臣未作圓滿答



覆，僅謂容當令行查明真相爲詞。迨至同年七月十八日（一八九八年夏曆戊戌六月十一日）爲英國衆議院會期，議員戴維德復申前議，向理藩大臣質問查訊結果，要求解釋放逐孫先生出境理由。戴氏問詞如左：前次質問，關於香港政府下令放逐孫逸仙先生出境之理由有無詳細查究？結果何如？理由安在？事前中國政府（指滿清政府下同）有無照會香港政府要求驅逐孫氏出境情事？如有之，此照會曾否先行呈達理藩院然後執行辦理？孫先生爲現代中國維新人物，其在英屬地方居留，未嘗違反或觸犯英國法律，遽被放逐出境，此項命令，能否撤回之？

「理藩院大臣答辭云：此事業經查詢，事實與前次答案無出入。孫逸仙醫生非在香港出世，亦非入籍爲英國人。孫依據一八八二年放逐出境條例第三條規定禁止其在香港居留，由一八九六年三月四日起，以五年爲期。按據理由，則在當地總督與行政委員之意見，以孫氏於港地治安及秩序均有妨害之故。中國政府未嘗移文照會驅逐孫氏，孫氏離港乃在出境令頒發之前，然孫共同謀叛反對其本國政府，已無疑義。因此之故，乃不欲其寄跡於香港耳。此次暫行禁止其

在香港居留，爲一地方之行政，似不必遽加干預也。戴維德繼續發問曰：孫逸仙醫生既受嫌疑，顧未予以答辯之機會，請問理藩院大臣知之否乎？參伯連答曰：此一問題，現在不能答覆，蓋未蒙貴議員先行通知也。惟據報章所載，孫氏現在中國爲領導革命之工作。戴曰：余亟希望其成功。參曰：如事非虛傳，猶足證實香港政府之意見也。

一同日（一八九八年七月十八日）議院戴維德復提出質問多款，蓋皆涉及滿清政府與太平天國發生內戰時香港政府於一八五五年一月十五日頒布是年第一號維護地方治安條例與斯時孫逸仙先生進行革命之關係，要求總檢察官加以答覆。戴氏問詞彙列於下：當一八六四年七月九日，英廷頒布諭旨取締僑華英人參加中國內戰，務須嚴守中立，犯者按律予以處分。該諭至今是否仍爲有效之執行。如其然，則當日諭旨雖爲取締參加中國內戰而設，顧其時英人受滿清帝國聘用與太平天國革命軍抗戰者，實繁有徒，概未聞英廷加以取締。今次中國革命，發生內戰，或有英人參與其間，如當日廷諭有效，是否適用於今日參豫中國革命事業之英人？且一八五五年一月十五日，香港頒布是年第一條，人

咸知其爲當任香港總督約翰保陵勳爵之中立條例，乃英廷一八六四年七月九日所頒諭旨，竟變更英國國際立場，對於滿清帝國出力之英人予以諒解，而對於參加太平天國革命軍之英人，則嚴加取締，違者處罰不貸。當日變更態度，以至頒布諭令，加以取締，其故可得聞歟？

一當任總檢察官李察屈斯特勳爵答稱：一八六四年七月九日之廷諭，早經宣告無效。蓋一八六五年三月三日所降諭旨宣告撤廢者。而約翰保陵勳爵在一八五五年一月十五日，頒布之中立條例，亦經同時宣告撤銷。至改革該例理由，當任外交部副大臣李押氏於一八六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在衆議院演說時已有詳細之解說，當可覆按云云。查一八六四年七月九日之英廷諭旨，爲取締僑華英人之參與中國內戰者。而一八六五年三月九日之廷諭，乃明定僑華英人之法益者。同時劃分香港總督及駐華欽使兼商務總監之職權，解除歷來由香港總督兼任之責，另委駐華欽使兼商務總監，專理在華英僑事務，并劃分司法管轄權，另設駐華高等法院於上海，管轄在華英僑之重要民刑事及上訴案件，更復制定華人入英籍應該遵守之法規等事項。至關於一八六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外交部副大臣

李押在衆議院演說詞，係爲報告改革英國在華原有制度暨改變歷來對華態度之原因及理由者也。

「英國衆議員因香港政府不能容留國際政治犯，致引起劇烈之爭辯，已如上述。乃香港當道辦理此事，不以國際政治犯待孫先生，而適用香港法例執行地方政權，避免國際糾紛，以塞難者之口，亦如上述。惟是五年期限屆滿之后，孫先生亦未嘗足履斯土。迨一九一一年（辛亥）我國光復，革命成功。孫先生自海外歸來，轉赴南京，道經香港時，備受華僑熱烈歡迎，始再度臨一別十餘年之港島也……。」

在民國前十二年（一九零零年）的春間，長江閩粵各省黨會的首領在香港舉行聯合大會，歃血同盟，公推總理爲會長，聲勢浩大，積極進行。總理感覺勢力日張，決計回粵大舉。於是在五月間，由日本率領楊衢雲，日人平山周，宮崎寅藏等同志返港。「總理年譜長編初稿」有說：「李鴻章因北京拳亂，納港督卜氏之言，擬合黨人倡廣東獨立，即囑劉學詢函招總理，旋派安瀾兵艦駐港待之。總理至港，即依同志決議，派宮崎爲代表，乘安瀾艦赴粵，晤學詢。」

得鴻章確復，謂北京未陷落前，未便遽行獨立，請轉慰稍候云云。事以中變，然港督卜力猶授意於議員何啓，令興中會同志，擬定獨立宣言，暨大綱六條，由港督交鴻章宣佈，總理亦嘉許之，而仍命同志分途準備軍事，……總理復于八月轉上海。』第二年（紀元前十一年）的十二月，總理由日本到香港，住在中國日報。不久，又去越南。（中國日報，是革命黨機關報的元祖，同時也是負責策動南方革命工作的交通機關，與招待同志往來的處所，地點初在士丹利街二十七號，後遷永樂街。廣東光復，移粵出版，二次革命失敗停刊。）

此後，總理便往來日本南洋歐美各處，聯絡留學生華僑等策動革命事業，並致力外交工作。直至辛亥年（公元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上旬，由法國到上海，纔經過香港，逗留時間很短。

總理於民元四月，向參議院行臨時大總統解職禮后。五月間，曾回廣東，調停粵事，往來香港，略有逗留，和各舊友共話闊別。後來如護法之役，有幾次往來廣州上海間，都曾經過香港，只是匆匆一過，沒有多大的耽擱。

綜觀總理一生在香港居留的日子，要算在西醫書院學醫時期爲最久，前

後六年。國民革命，推翻異族專制政府，建立民國，也在這個時期奠下了基石了。於今事隔五十年，地方人士，變幻許多，如香港西醫書院名目已不存在，道濟會堂（合一堂）等，也由荷理活道搬到般含道去，中國日報停辦了三十多年。當年的「四大寇」，也先後去世。撫今追昔，真有滄桑之感。

## 總理習醫年齡的考證

總理年譜，坊間出版的書籍，有些是錯誤的，如「中華百科辭典」（民國廿四年增訂三版），「孫文」條，有說：「一八八一年，學醫於廣州博濟醫學校」。這個曆數，是不對的。總理出世之年，是公元一八六六；那麼，一八八一年應該是他十六歲。與「總理年譜長編初稿」及林伯克「孫逸仙傳記」，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等所敘述，均不相符。然而「中華百科辭典」的所述，又從何而來的呢？查考有關黨史的著作，似乎它是由吳稚暉的「中山先生的革命兩基礎」一文裏「附中山先生年系」而來的。今把吳文一段，摘錄如左：

「辛巳清光緒七年，西一八八一，十六歲，由夏威夷回國，尋入廣州博濟醫學校，在校識鄭士良弼臣，與談革命，士良悅服。壬午八年，西一八八二，十七歲，轉學於香港阿賴斯醫院，又識陳少白、尤少紉、楊鶴齡、陸皓東。與陳、尤、楊昕夕談革命，港澳間親友，呼爲「四大寇」。癸未九年，西一八八三，

十八歲，甲申十年，西一八八四，十九歲。是年中法啓釁於廣西安南間。乙酉十一年，西一八八五，二十歲，自傳曰：『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由是以學堂爲鼓吹之地，借醫術爲入世之媒。』據此，先生畢業香港醫校，懸壺澳門廣州，在此年也。丙戌十二年，西一八八六，二十一歲。丁亥十二年，西一八八七，二十二歲。西人記載謂先生以本年方入香港醫校，誤也。』

這幾年的年譜，據後來所查實考證，是錯誤的，「中華百科辭典」，初版在民十九印行，而吳氏的文是在民十四 總理逝世不久所發表。據此，「中華百科辭典」「孫文」條所說，似是由吳文而來。吳文所說『西人記載謂先生以本年方入香港醫校，誤也。』所謂『西人記載』，恐是指林伯克的「孫逸仙傳記」而說。林伯克在「孫逸仙傳記」裏「第四時期，中山的職業，一八八六至一八九四」有說：「一八八七年，一個新的醫學校成立於香港，中山爲革命活動便利計，轉入這個學校，他在香港讀了五年（一八八七至一八九二）。」林氏此說是極正確，不知吳氏當時有何根據，而說 總理在廣州習醫，是在公元一



八八一的十六歲，在香港畢業醫科行醫是二十歲的時候。今查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印的「總理年譜長編初稿」，和中央宣傳部編印的「國父孫先生年譜」及「中國國民黨黨史初稿」，都是說總理二十一歲（公元一八八六）入廣州博濟醫學校習醫，二十二歲轉學香港雅麗氏醫院附設之醫學校（借用原文名稱），二十七歲（公元一八九二）總理以全校第一名畢業醫學。陳少白與總理是在港習醫時的同學，且屬「四大寇」之一，見聞自當親切，記述必然可靠，在他「興中會革命史要」裏「孫先生最初之革命言論與行動」第二節，「香港之求學時代——革命思想之發源」有說：「孫先生當時在博濟醫學校，雖得鄧士良日夕暢談，很覺有味。但在廣東省城，耳目衆多，言論也很受束縛，不如在香港較為自由，所以在雅麗氏醫學校成立時，即由博濟轉入，其時孫先生已二十二歲了。」又據馮自由「革命逸史」的「孫總理行醫廣告」所附錄光緒十九年十二月廣州的中西日報武沁恭頌廣告。光緒十九年即公元一八九三，是年總理二十八歲，即在香港醫校畢業的第二年，在廣州洗基，開設東西醫藥局的一年。且查香港西醫書院發給總理的畢業行醫執照，是在公元

一八九二年，叙明『在本院肄業五年』，算來也是一八八七年二十二歲在港習醫，是毫無疑義的了。

最後還有一個反證，就是吳稚暉後來在「總理行誼」內，對「總理生平歷史所說的，和他在「中山先生的革命兩基礎」所述，已經不同了。吳氏在「總理行誼」是說『他自從十七歲，即宣說滿清政局的腐敗，十八歲在家鄉指說土偶淫祀的不應存在。於是二十歲在香港入學……他二十七歲，畢業後行醫亦兼運動。』這是說「總理二十歲在香港皇仁書院讀書起而至在廣州香港習醫到畢業爲止，這樣敘述，是對的。

綜而言之，「中華百科辭典」與「中山先生的革命兩基礎」所附「中山先生年系」所載的一部分（即「總理在廣州習醫時的年齡」是不對的。特不憚煩的考證如上。

吳稚暉覆中央週刊函

承示陸丹林先生辨正「總理習醫年齡至當。弟所作兩基礎文，在「總理逝世時倉猝應報館之請，無要籍可檢，錯誤極多，後已於他處略加以改正。惟兩

基礎文爲朝生暮死之作，久當摧毀，故未訂正。至書局沿誤，抱歉良深。近年信史已續續而出，坊刻之書，在慎重者本不應取證。故中華百科辭典等，再版亦當更正。今有陸先生考證刊出，尤使辭典及兩基礎等，皆謬誤昭著，不致誤人矣。惟兩基礎內所稱西人，似係指上海西報等所叙。當時林伯克先生之作，弟尙未能讀到，西報却已據之，以不誤爲誤，弟之草率，尤可笑也。然弟當時以爲總理天縱，其革命行動必甚早，有此成見，反以曲解致誤矣。承賜讀，感謝之至。即叩撰安。吳敬恆啓。卅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總理習醫校名的考證」增訂

我在中央周刊第五卷第三十四期，發表了一篇「總理在港習醫校名的考證」後，繼續又得了一些材料，特把原文補充修改，作為對於研究黨史的一個參考。

總理在香港肄業醫學的校名，在歷來各種書籍刊物中（包括中外人士的著作），絕不一致。甚至一部書裏，前後的稱謂，也不相同；致令一般研究總理歷史的，很難了解。為着免除將來以訛傳訛，或流入習非成是起見，參攷各種書籍，來一個考證，也是必需的工作吧。

說到總理在港習醫的校名，我們先來看總理自己的著作吧。第一，「倫敦被難記」中所說：「當一八八六年時，余學醫於廣州之英美傳道會，主政者為戈爾醫學博士。次年，聞香港創立醫科大學，遂決計赴港肄業。」在「建國方略的「行易知難」第八章中「有志竟成」內說：「予在廣州學醫甫一年，

聞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予以其學課較優，而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考香港肄業。』在這兩段文中，總理所敘述的：一是「醫科大學」，二是「英文醫校」，校名卻沒有寫出。查「倫敦被難記」，是在前清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公元一八九七年）於倫敦用英文寫成的。「孫文學說」則是民國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上海寫成的。但中國新教育由「學堂」改爲「學校」，是在民國二年。民二以前，多是學塾、書塾、書院、學堂等名稱。總理在港習醫，是在前清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年）那時只有書院，（尤其是守舊的香港，到了民國三十年還有書院存在。民國十五年，有人在香港創辦學校，尙稱書院，如民生書院，即是一例）還沒有醫科大學或醫校的名稱。總理在這兩書內所用醫校字樣，想是翻譯的採用民初學制的稱謂，便於行文罷了。

民國廿七年春，我由上海到香港，卅一年春，由香港返國內；兩次都是逃難，身邊書籍異常缺乏，僅就所有與借閱所得的，分別摘錄，做一個例子。最後再把我所得的史料來做參攷，這樣一來，當能得着正確的答案了。

一、關於敘述「醫校」的：林伯克的「孫逸仙傳」中說：「一八八七年有

新的醫學校成立於香港，中山爲革命活動計，便轉入這個學校。」康德黎的「孫逸仙與新中國」中說：「一八八七年，我初次在香港認識孫逸仙，他進了爲華人而設立的醫科大學。」以上兩書，都是英文本，這裏所引的是中文譯本。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的「總理年譜長編初稿」說：「是年，轉學香港英人康德黎所主辦之雅麗醫學校。」中央宣傳部的「中國國民黨黨史概要初稿」說：「二十一歲，復轉學到香港雅麗醫學校。」張旭光的「中華民族發展史綱」第十章第四節說：「轉學香港英人設立的醫學專科。」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改革與革命」章說：「後聞香港新立醫學專科，設備完備，渡港就學。」陳功甫的「中國最近三十年史——革新與革命」裏說：「逾年轉入香港英文學校。」陸友白的「孫文全集——孫中山先生傳記」在事略中說：「改入香港之英文學校」；行狀中說：「先生因爲香港英文醫校學課較好，而較自由，改到香港讀書」；外傳二中說：「一年後，香港有醫校設立（即今香港大學），設備較全，遂去而之港」；外傳三即文莊的「孫中山先生評傳」裏說：「那時所住的學校即現在的香港大學」；徐民「年表」中說：「肄業香港皇仁

醫校」；這一部書裏，前後各文，稱謂已不同了。吳錫祥的「中國國民黨史略」說：「轉至香港醫校讀書。」貝華的「中國革命史」中說：「以香港英文學校，學課較好，而地較自由，隨入香港醫校讀書。」黃造雄的「孫中山」中說：「他在雅麗醫學校讀了五年」；而盧紹稷的「中國近百年史」中卻說：「轉學於香港阿刺斯醫學校」；同一初中學生文庫的書中，兩人所說，各說各的。

二、關於敘述「醫院」的：胡去非的「總理事略」中說：「轉學香港，入雅麗氏醫院附設之學校。」陳功甫的「中國革命史」裏面說：「逾年，轉學於香港雅麗士醫院。」和他所寫「中國最近三十年史」所說又不同了。華林一的「中國國民黨史」中說「轉學於香港雅麗氏醫院」；又云：「先生畢業於香港醫校」，前後乖牾。金兆梓的「高中本國史」中說：「旋又轉學香港雅麗士醫院。」吳敬恆的「中山先生的革命兩基礎」中說：「轉學於香港阿賴斯醫院。」黃埔叢書「中國國民黨黨史紀略」中說：「迨卒業雅麗士醫院」。馮自由的「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編「孫中山略歷」中說：「翌年，轉學於香港雅麗士醫院」；而在「革命逸史」中「孫總理行醫廣告」內說：「孫總理在香港雅麗士醫校畢

業後」・鄒魯的「中國國民黨概史」說：「在香港雅麗士醫院肄業時」；但在他的「中國國民黨史稿」中組黨篇之興中會章內卻說：故「投考香港雅麗士醫院肄業」；其附注二又謂：「一說 總理畢業之醫學學校爲香港西醫院」；而在宣傳篇中興中會之宣傳章內則說：「轉學香港英文醫學肄業」；在一書裏面，三種說法，各不相同。

陳恭祿的「中國近百年史」中「孫文傳略」裏面說：「二十一歲，始習西醫，入博濟醫校；次年，入西醫書院。」這樣寫法，與他在「中國近代史」所敘述的相異。且最可惜的，博濟醫校與西醫書院都沒有地名冠上，使人有點茫然。

陳少白的「興中會革命史略」中說：「孫先生在博濟醫學校，大約讀了兩年書，就到香港進雅麗氏醫院附設的學校。這個雅麗氏醫院怎麼樣成立的呢？當日有一位何啓博士，在英國讀書，畢業後，娶了一個英國人雅麗氏(Alice)爲妻，回國後數年，雅麗氏去世，遺下幾萬塊錢的產業。何啓博士抱鼓盆之痛，非常傷心，很不願意得到他妻子的遺產，所以就代她捐造興學；修了一個醫院，名之謂雅麗氏，以誌紀念。同時在院內，附設一個醫學堂，叫 The Col-



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現已改組爲香港大學醫學部) 廣招中國學生入學習醫。何啓博士亦校內教授之一，吾等之師也。」

從以上各書的敘述，多不相同。學校，有說「醫科大學」，有說「醫學校」，有說「雅麗醫學校」，有說「醫學專科」，又有說是「英文醫學」，更有說是「皇仁醫校」的。醫院呢？有說是「醫院」，有說是「醫院附設之學校」，或「附設之醫學堂」。至 Alice，有譯「阿麗氏」的，有譯「雅賴斯」的，有譯「阿刺斯」的，各人寫法不同。而屬於直接史料比較詳細的，首推陳少白所寫的一段。因陳氏與總理是在港習醫的同學，且屬初期革命「四大寇」之一，所見所聞所親歷的，自然較其他來得翔實而可信的了。不過，我們把陳氏所引寫的英文來看，意譯只是「爲中國人所設立的醫學專科學校」，並沒有雅麗氏醫院（或醫校）字樣。

然則這所醫校，究竟當時的華文名稱是甚麼呢？是值得研究的問題了。記得民國二十九年的春間，在香港的中國文化協進會舉辦廣東文物展覽會，香港大學醫學院曾把總理在港習醫的畢業執照（當時不叫文憑，也不是叫證書）

副本一張，送會展覽，陳列在革命陳列室中。當時我是這會的常務委員，見着這樣珍貴的直接史料，就把他全文抄下，今錄於左。（本來還有照片，可惜在香港戰事時失落了。）

香港西醫書院掌院並講考各員等

爲

發給執照事照得

在本院肄業五年醫學各門歷經考驗於內外婦

嬰諸科俱皆通曉確堪行世奉

醫學局賞給香港西醫書院考准權宜行醫字樣爲此特發執照仰該學生收執以昭信守須至執照者

右仰該學生收執

主降

年

月

日

發

這張執照，中英文合璧。右方是中文，左方是英文，下方有掌院（等於今之校長）和教員十三人、試官八人和牧師書記等署名，由香港總督羅便臣署名發給。在左角上方，有英文字註明執照副本，一給孫逸仙，一給江英華字樣。

（丹按一八九二年即光緒十八年壬辰七月二十二日，香港西醫書院舉行第一屆畢業典禮，畢業生二人，首名總理，用孫逸仙名，次名江英華。江醫生後來在南洋山打根埠行醫，民國卅年纔去世。）執照上方中間有一圓形圖案，中英文圓徑相連。中文是香港西醫書院，英文卽是陳氏文裏所引述的。

綜合以上所說，則知道總理在港習醫的校名中文是「香港西醫書院」，英文則是「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意譯是「爲中國人所設立的醫學專科學校」，並不是「雅麗斯醫院」，「附設之醫學校」，「醫科大學」，或「英文醫校」等名稱了。

或者說，這所醫院從前和現在，中文是「雅麗氏醫院」，英文是 Alice Memorial Hospital（這個名稱是根據康德黎的「孫逸仙與新中國」所說的），用他原有的醫院名稱，是權宜之計。殊不知這是用不着的，因爲當時已經有了中英文的定名，自應根據「本證」來做事實，纔不失卻真實性；否則，是「似是而非」的呵！還有，康德黎在「孫逸仙與新中國」書裏，也說「醫科大學卽在該院（指雅麗氏醫院）分班上課，使生徒實地練習。」由此說來，只在

醫院上課，便於實習罷了。故只可以說雅麗氏醫院，是香港西醫書院假座上課及實習的醫院，這是非常明顯的事實，必要分別清楚。

於此順便再說一件事，廣州沒入淪陷以前，有一所「孫逸仙博士醫院」。這所紀念醫院，是屬於嶺南大學醫學院的，即在博濟醫院的院園裏。博濟醫院即是總理在二十一歲時候習醫的處所。他的名稱，中英文不同，中文「博濟醫院」，英文是「Canton Hospital」，意譯是「廣州醫院」。我們用中文說時，絕不能膠柱鼓瑟的說。總理在廣州習醫是在「廣州醫院」，也不能自作聰明的說。總理在廣州習醫是在博濟醫學校。因為中文的「廣州醫院」，另有一所，和博濟醫院絕無關係。博濟也沒有另叫過醫學校。現在由博濟醫院出身的醫師健在的，還有好幾位，如池耀廷、張允文、梁培基、張竹君、謝愛瓊等都是。他們的畢業文憑也是博濟醫院，並非博濟醫學校。那麼，香港西醫書院，自然絕不能够用雅麗氏醫院（校）來代替，也是很顯淺的道理。

## 關於鄒著「中國國民黨史稿」的幾句話

二三十年來，國內外出版書籍，對於中國國民黨史料，比較的有系統，材料又屬豐富，首推鄒海濱（魯）所編撰的「中國國民黨史稿」了。這部書，初由上海民智書局出版，風行一時，後改由商務印書館印行，分洋裝平裝兩種。現在我所看的是洋裝本。文中所說的頁數，是指洋裝本而言。

這部書，真可以說是皇皇鉅著。因為是鉅著，自非一兩月的時候，可以完成。加以材料的採集，不是來自一處，而是多方面。偶一大意，那就前後很難統一。加以付印時，恐不能親自校閱最後的排稿，那就錯漏字句，難以改正。一經印刷所打了紙型印刷之後，及到勘誤更正，便費時耗工不少了。這是曾經辦理過圖書刊物的，多知道個中意味。茲把我讀過這部書後的意見，寫些出來，給著者再版時和讀者們一個參考。至講到這部書的優點，吳稚暉（敬恆）的序文，已經說得非常確當，用不着我來贅述了。

這部書應該注意之點，有若干呢？應如何的改善，以求精益求精呢？我以

爲應該注意的有下列的幾點：

一、姓名應統一：查書中所敘述人的姓名，間有不統一的；有用其名的，有用別號，亦有名號併用的。如吳摯父、吳稚暉、章行嚴、鍾惺可、景梅九等，均用號而不用名。蔣介石、張溥泉、張靜江、陳道一、孫少侯、黃克強、譚石屏、楊滄白、商起予、朱執信、胡毅生、林煥廷、劉申叔、廖子良、汪精衛等，則名號混用，似覺不妥。因研究史事的容易誤會一人爲兩人。至以字行如馬君武等，或引用他人著述的原文，則可除外。

二、路名應統一：如九九二頁十二行之「寶昌路」與九九三頁十二行之「霞飛路」，實際同一路名。在「洪憲一役」一節內，所敘史事而路名不同。「寶昌路」爲上海法租界路名之一，第一次歐戰後，霞飛將軍遊滬，滬法租界公董局纔把「寶昌路」改名「霞飛路」。但同時閘北有一路名「寶昌路」。今在「節文裏，而用「寶昌」「霞飛」兩路名，不知的以爲閘北與法租界兩路。又敘述租界，不能從俗如九九三頁十二行簡稱「法界」，而脫落「租」字。

三、姓名錯字應更正：書中姓名錯謬之字頗多，如周震鱗之「鱗」誤「

「麟」，楊庶堪之「堪」誤「湛」，多至不可數計。曹錕之「錕」誤「琨」，陳宣之「宣」誤「宮」，他如岑春「煊」(萱)，李宗「黃」(璜)，徐紹「楨」(禎)、廖仲「凱」(愷)、李「紀」(杞)堂、伍「廷」(庭)芳、黃詠「商」(觴)等，均兩字併用。還有四一頁吳永珊誤「柵」。四二頁景耀「月」誤「日」，吳春陽「吳」誤「英」，九七頁徐錫麟誤「齡」，一二四頁黃廬午「廬」均誤「慶」，三七一頁韓麟符漏「韓」字，四九一頁陳具年誤「筆」，五百頁范「光啓」誤「啓均」，五一四頁武「士英」誤「英士」，六六〇頁王煜初「王」誤「黃」。按煜初牧師爲王寵惠之先德，一查便知。六七四頁史堅如「堅」誤「經」，六九八頁李「發根」誤「根發」，七三二頁杜之林誤「杖」，八〇八頁陳輔臣漏去「陳」字，八一二頁潘達微缺「微」字，八六四頁馬福益誤「祥」，八八七頁龐青城誤「燈」，九〇二頁莫紀彭「紀」誤「非」，九一五頁自逾恒「逾」誤「愈」，九二〇頁「冉效譽」誤「審冉效」，九二一頁王天傑「天」誤「大」，九二五頁趙光誤「先」，九二七頁劉「之潔」誤「潔之」，黃金龍誤「龍」，羅紹圖「紹」誤「沾」，九二九頁朱芾皇「芾」誤「希」，

九八五頁鍾鼎基誤「荃」等。此外尚有載「湑」常誤載「恬」，三五三頁杭辛齋「杭」誤「梓」，八八〇頁奚駿聲「駿」誤「竣」，傅孟誤「孟」，九〇五頁七行張根仁「根」誤「振」，九〇一頁王和順「王」誤「黃」，九〇七頁孫道仁誤「人」一〇二五頁楊庶堪「庶」誤「樹」等，皆是須改正的。

四、稱謂要審慎：書中如敘述載湉，常直舉其名，但在九五頁忽用「德宗」二字，在民黨立場，似不必如此稱呼。且「德宗相繼歿」，於修辭學，似有語病。又一一〇〇頁對廢帝溥儀，而稱「宣統」，嚴格來說，也有不妥。

五、闕誤字句應補修：九八五、六、七頁所列省名，漏了福建。一〇四六頁「士密西報」之下，漏去「記者」二字。大本營時代，葉恭綽曾任財政部長，似應補入。又如一〇九頁黃泥涌，恐是黃泥涌道之誤。四四二頁嚮導週報，「嚮」誤「響」。五〇一頁日知會誤「堂」。五〇三頁道德會，應註明汪兆銘等。心社，應註明思復、紀彭、彼岸，直勉等名字。五九六頁四行，應改為「對青年會全國大會演說」，方合事實。七三九頁「文武巡捕」誤「撫」。七六七頁一行「一標第二第三營」句，誤「標同二標第三營」。七八八頁「井擬



擒賊先擒王」句，漏去「先擒王」三字。甘水橋「水」誤「石」。七九五頁「余等尙無此觀念，」「尙」誤「當」。八〇二頁「跑馬地三十五號」，其中恐漏去「黃泥涌道」四字。八〇三頁「靖門」，門字之上，漏去「海」字。「清水行台」，似是「水師行台」。石馬槽「石」誤「不」。九二八頁健爲縣「健」誤「健」。八九五頁「六十二標」「六」誤「八」。九二七頁江安誤「定」。一〇三〇頁紹安似是邵安。還有二十一頁新民叢報「民」誤「聞」等。又六九五頁甲辰「辰」誤「電」。七五四頁「十一月初十」誤「十月初十」。八九二頁「紀元前五年」「五」誤「六」。九〇六頁四行「紀元前九年」「九」誤「五」。六行「紀元前九年」「九」誤「十」。九二八頁三行十二日誤「月」。九一四頁二行立憲誤「商」。八行「十月初二早」，「十」誤「九」。九五四頁三行「二月十三」，十字上多一「二」字。都要分別修正，纔符事實。

六、雷同者宜刪去：八四五頁註九和一〇〇六頁註七所載「鍾明光傳」雷同，且查八四五頁註九，在該節文字裏絕沒有註九之出處，不知何故排入？

七、敘事稱謂宜一律：書中二頁說「總理在港習醫」故投香港雅麗士醫院

肄業」，而在「註二」則說「一說總理畢業之學校，爲香港西醫院」。但在四五九頁却說「轉學香港英文醫學校肄業」，同一之事而在一書內，三種說法不同，使讀者不知以何者爲對。查總理在港習醫校名，華文名稱是「香港西醫書院」，另詳拙作「總理在港習醫校名的考證」。至興中會問題，已有人指出，不必再說了。

以上所說，或因鈔寫而墜落，或因排字而錯誤，或因校稿之大意，或因原來資料的錯訛，便造成如許誤漏。其他尙未舉出之點，想必還有。呵凍寫字，很不方便，故僅暫舉如上。其他如「正」誤「𠂔」，「卒」誤「率」，「侯」誤「候」，「泊」誤「泊」，「蹙額」誤「蹙額」，「商榷」誤「商確」，「斑」誤「班」，「澧」誤「澧」等字，恆見迭出，這則恐是手民所誤。校書如掃落葉，本是難事，希望再版時，酌予分別整理改政，使成爲一部良好完備的黨史。因爲他是「稿」，顧名思義，自然尙須增補修訂，纔成正史。故不辭煩瑣，把一得之見寫些出來，與黨中史家研究，聊效野人獻曝的微意罷了。

頃准三月八日大函，附陸丹林君文稿兩篇，囑閱其可否發表。具見貴社慎審黨史，無任欽佩。陸君文稿，魯經細閱一遍，所言均屬事實，有大助于魯著黨史稿。查黨史稿材料，來自多方面，甲所言者與乙所言者不同，因時間關係，未能切實整理；所以出版者，雖曰因胡漢民先生之催促，尤志在藉此徵集材料。此在原書序文內已詳言之，一查即可明瞭。此其所以有人名地名未能統一之現象。至錯字所以太多之原因，因該書交民智書局出版時，胡漢民先生特鄭重其事，命該書局專請一位精通中外文之國內某著名大學教授負責校對；詎該教授因有他事，轉囑其夫人代勞，其夫人雖亦留學外國，然于中文則未能深邃，遂至魯魚亥豕之誤，層見疊出。時魯在日本，出版後始寄來，明知錯誤，而亦無法補救矣。迨魯重長中大，搜獲材料甚多，重爲整編。既編竣，正待出版，適抗戰發生，敵機迭襲廣州，住家被炸，稿件同時一炬。魯恐該書絕版，將民智版交商務印書館再版，因無時間修正錯處，祇加再版自序一篇，此爲商務版仍爲民智版同樣錯誤之原因。竊念任何著作問世，如不正確，將貽誤後之學者匪輕，黨史尤無不然。魯著黨史稿雖出版，係初稿，係爲徵集材料之初

稿，故常計劃重新編輯，並時望同志同胞來函糾正或賜下材料。陸君所言，于魯有大助，極爲感激。務請貴社即照原文發表。嗣後仍請同志同胞如有發見其他錯誤，詳爲糾正，或將有關材料寄下，無任感禱。准函前由，相應函覆，陸文附還，即希查照。並請即將本函附註陸文之後，俾示魯著黨史稿所以出版之原因，及人名地名不統一與錯字太多之原因，藉以引起同志同胞研究黨史之興趣爲荷。此致中央周刊社。鄒魯啓 三十二年三月二十日

## 總理民元就任大總統記

中華民國元年元旦的一天，是中國數千年歷史上國體和政治改革的一個新紀元，也是曆法演變的一個轉捩點。這一天，就是總理就任民選的臨時大總統的日子，現在回顧起來，已有三十三週年的歲月了。

自從辛亥年秋，武昌發難後，未及一月，宣布獨立脫離滿清專制政府的省區，佔了全國的一半，革命軍的勢力，籠罩全國。但是南北各省，雖然宣布獨立，却是省自爲政，沒有一個聯合的綜攬行政的統一機關，對內對外，一切進行，很感不便。在九月二十一日江蘇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湯壽潛，聯電滬軍都督陳其美，提議由各省公舉代表，在上海集議，仿照美國十三州會議的制度，爲全國二十二行省的一致行動，略說：「……美國革命，苦戰八年，卒收最后之成功者，賴十三州會議，總機關統一進行，維持秩序之力。考其第一次，第二次會議，均僅以襄助各州議會爲宗旨。至第三次會議，始能確定國會，長治久安，亦是歷史上必經之階級。吾國急宜仿照美國第一次方法，於上

海設立臨時會議機關，磋商對內對外妥善方法……」并附提議大綱三條：

一、公認外交代表。二、對於軍事進行之聯絡方法。三、對於清皇室之處置。陳其美贊成。第二天即以江蘇都督代表雷奮、沈恩孚，浙江都督代表姚桐豫、高爾登的名義，分電各省派委代表來滬會議組織臨時政府，并請各省公認伍廷芳爲臨時外交代表。九月二十五日，代表舉行首次會議，定名爲「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三十日，議決承認武昌政府爲中華民國中央軍政府。十月四日，又議決各省代表赴武昌籌組臨時政府，各省酌留一人以上在上海爲通訊機關，接洽機要。代表們到了湖北，恰值漢陽失守，武昌遭受威脅，於是改在漢口英租界順昌洋行舉行會議，議決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二十一條。十四日，蘇浙滬聯軍光復南京，遂議決以南京做臨時政府的所在地，各省代表，於七日以內，務必齊集南京，如有十省以上的代表，即開臨時大總統的選舉會。當時留在上海的代表，已於十四日選舉黃興爲大元帥，黎元洪爲副元帥，和擬定大元帥職權，主持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而在武昌的各省代表，對於大元帥職權，表示異議，黃興因此辭職，各省代表重選黎元洪爲大元帥，黃興爲副元帥。可是

黎不能到甯，黃也力辭以候。總理歸，結果黎黃二人都沒有就職。

當武漢起義的時候，總理正在美洲活動，得到這個消息，因鑒於外交方面關係革命成敗，非常重要；而英國態度，尤爲特殊注意。乃由美赴歐，和各國政府接洽，結果甚爲完滿。外交任務完畢，即啓程回國。十一月六日，安抵上海。到滬以後，由黃宗仰（烏目山僧）恭迎，寄寓靜安寺路的愛儷園，一切供應，園主哈同竭誠招待，優渥備至。初十，各省代表舉行臨時大總統選舉大會，到會者有：直隸，奉天，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福建，山西，雲南，陝西，江西，安徽，四川，江蘇，浙江十七省代表，共四十五人，齊集南京。由浙江代表湯爾和主席，共投十七票。按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第一條之規定，滿投票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者當選。結果，總理得十六票當選爲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過了幾天，由十七省代表特派王寵惠陳陶怡等赴滬恭迎總理入京就職。於是總理「三十年如一日之恢復中華創立民國之志，於斯竟成」！（引用 總理話）

總理當選臨時大總統後，於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十時，偕代表特派員隨員等，

由上海乘滬甯鐵路花車赴京就職。那時上海各軍隊事前齊集北站，擎槍排列，各國體均舉代表歡送，連同中外各界，總數在萬人以上。車啓行時，鳴炮致敬，歡聲震天。過蘇州，在車站鵲候歡迎的，人山人海，共和萬歲的聲浪，數里可聞。到無錫，女學生數百人，列隊歡呼，代表登車表示敬意，總理和他們握手。過常州、鎮江在車站敬意的也踴躍異常。下午五時，車抵下關，升禮砲，奏軍樂。當由滬甯路和甯省路接軌，繼續乘花車入城，沿鐵路一帶，徧懸旗幟，軍隊密布。花車到城站時，軍樂齊奏，各軍步隊行舉槍最敬禮，駐甯各國領事和教士們也在車站恭迎，脫帽揚巾。南京各砲台，軍艦，皆鳴砲二十一發。城內各界站滿街道，莫不一欲瞻仰革命領袖的顏色。店戶屋宇，懸燈掛旗，極爲壯觀，爲南京空前的景色。是夜靈雨霏霏，宛如大旱的甘霖，雖朔風刺骨，然軍民歡迎大總統的興致，絕無少減。隨員專車，下午六時十五分，纔到總統府。

總理抵站在車中時，四周有重兵護衛，閒雜人等，一概不得上車。未幾，總理自花車下月台，手持平常軍帽，身穿土黃色呢質軍服，沒有佩戴肩章金帶



等。下車後，當即乘藍色繡花彩綢馬車，軍樂馬隊奏凱旋歌前導，後隨衛隊，直向總統府駛去。總統大門，電炬輝煌如白晝，用冬青樹枝紮彩，襯着紅色絲綢。馬車到總統府，黃興徐紹楨恭迎。總理下車，迎接入府。

是夜十時，行接任禮。黃興左立，徐紹楨右立，各軍團長各部司署科長以上，一律參加，衣禮服或西裝，排列兩階。先請大總統就位後，各部人員行三鞠躬禮，各砲台再鳴砲二十一發。大總統受任禮秩序如下：

一、奏軍樂。二、代表報告選舉。三、總統致詞。四、代表致歡迎詞并致印綬。五、總統蓋印宣誓。六、海陸軍代表致頌詞。七、總統答詞。八、奏軍樂。

大總統初臨大禮堂，海陸軍代表各省代表們，歡呼萬歲。奏軍樂畢，代表團推景耀月報告選舉經過，略說：『今日之舉，爲五千年歷史所未有。我國所希望者，在共和政府之成立，及推倒滿清專制政府，使人人得享自由幸福。孫先生爲近代革命創始者，富有政治知識，各省公民選定後，今日任職。願孫先生始終愛護國民自由，毋負國民期望。』并請總統宣誓，即由大總統朗聲宣述

誓詞如下：

「顛覆滿清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於國，爲衆服務。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於世界，爲列邦公認，斯時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謹以此誓於國民。」

孫大總統宣誓畢，代表團景耀月授以大總統印（印文「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印」），并致頌詞曰：

「惟中華民國建國元年元月元旦，民國第一期大總統孫文蒞任，燕遼冀豫湘鄂秦晉蘇浙皖贛閩粵蜀滇桂公民代表等迎迓祝頌而致詞曰：惟漢曾孫失政，東胡內侵，淫虜猾夏，帝制自爲者，垂三百年。皇漢慈孫呻吟深熱，慕法蘭西，美利堅人平等之制，用是羣謀衆策，仰視俛劃，思所以傾覆虐政，恢復人權。乃斷頭戡胸，羣起號召，流血建議，續法美人共和之戰史。今三分天下，克復有二，用是建立民國，期成政府，揀選民主，推置總統，僉意能尊重共和，宣達民意，惟公賢！廓清專制，鞏衛自由，惟公賢！光復禹域，克定河朔，舉漢滿蒙回藏羣倫共覆於平等之政，亦惟公

賢！用是投匭度情，徵壓紐之信，衆意所屬，羣謀僉同。既協衆符，歡迎擁戴。要知我國民久困鈐制，疾首蹙頞，望民主若歲。今當公軒車蒞任，蒼白扶杖，子女加額，焚香擁簪，感激涕零者，何也？忭舞自由，敦重民權也。用是不吝付四百兆國民之太阿，寄二億里山河之大命，國民委託於公者，亦已重哉。繼自今惟公翼翼：毋違憲法，毋拂輿意，毋作威福，毋崇專制，毋曜非德，毋任非才，凡我共和國民，有不矢忠矢信至誠愛戴，軒轅，金天，列祖，列宗，七十二代之君，實聞斯言。代表等受國民委託之重，敢不盡意。謹致大總統璽綬，俾公發號施令，崇爲符信，欽念哉。

大總統受印，鈐在宣言上，由胡漢民代讀，讀畢，海陸軍將士代表徐紹楨致頌詞，大總統答詞，略謂誓竭心力，勉副國民公意。隨由代表和海陸軍將士三呼「中華共和萬歲」，禮成，奏樂散會。

繼續發布命令，改用陽曆，就是以這一天爲中華民國元年一月一日。第二天，代表團議決添選副總統，黎元洪當選。并即着手組織內閣，提出代表團徵求同意，公布各部總次長如下：陸軍總長黃興，次長蔣作賓。海軍總長黃鍾

瑛，次長湯薌銘。司法總長伍廷芳，次長呂志伊。財政總長陳錦濤，次長王鴻猷，外交總長王寵惠，次長魏宸組。內務總長程德全，次長居正。教育總長蔡元培，次長景耀月。實業總長張謇，次長馬君武。交通總長湯壽潛，次長于右任。這是中華民國第一次的內閣，仿美國制，不設總理。內閣成立，復由各省代表組織參議院，以爲立法機關。參議院成立大會，舉林森爲議長，王正廷爲副議長。同時政府用中華民國名義，發表宣言，宣告各國及勸告北方將士，從此對內對外，都有明確的表示。

年華逝水，歲月駸駸，回顧三十二年的過去，國事人事，不知變幻幾多，只就第一期內閣的人物而說，目下還是健存的，只有王寵惠、居正、于右任等三數人而已，其中變節的反革命的也有。撫今追昔，想起總理「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遺訓，我們感到責任不能够卸下，還要加倍的努力呢。

## 掃除封建的諡號

不久以前，在一本刊物上，看到有幾條論文的題目，什麼張文襄辦新政，曾文正的用人，彭剛直的將兵，李文忠的出洋等。內容怎樣，用不着列舉，只看他的標題，也够使人感到有點肉麻了。

滿清の入主中華，在民族主義的立場說，照章炳麟的看法，等於石敬瑭一樣。我們對於他的一般臣子的諡號，用不着看得什麼重要，何況有許多諡號，都是那時効忠異族屠殺漢人而博得的，那就更加可鄙了。

其實現在寫文章，爲着通俗與普遍及名正言順起見，還是用他的名來得貼切。如張之洞，曾國藩，彭玉麟，李鴻章（照上段的名字次序）等，直寫其名，一般讀者一看便知。因爲在現在的中華民國的立場，對於這些專制政府的諡號，用不着特別重視，爲着一般讀者容易明白，也該用名字。如梁啓超所寫的戊戌變政記，及清代學術概論，對於其師康有爲，也直寫其名，沒有稱號。那麼，現在的寫文章（除了引用別書原來字句之外），又何必必要寫那些什麼

文正公，文忠公，文肅公等不通行不普遍的專制政府遺留下的稱呼呢？

希望一般作家與主編刊物的文友，對此注意一下。我感覺在民國時代不該忽略的一點。從前我主編「逸經文史半月刊」，「大風半月刊」，「文化界兩週刊」等刊物，已經實行。即是無論自己寫作及其他外來文稿，對於前清的人名，一律用名或字，遇着有稱諡如寫林則徐不用其名而寫林文忠公的必定改政。但他的文章要是引用別書或其他文字，則照原來的稱謂。這種工作，一連行了六七年，都感覺方便，尤其是一般青年讀者。這於正人心，明視聽的思想訓練，實在也有關聯。

最可惡的，還有那所謂遺老，準遺老之流，奴性未除，對於廢帝溥儀在民國成立以後，開了門做皇帝，還有頌典予諡，如陸潤庠諡文端，伊克坦諡文，世續諡文端，梁鼎芬諡文忠，周馥諡愍愍，錫良諡文誠等，已屬荒謬。溥儀在民十三年的冬天被逐出宮，不久，由倭寇的掩護，逃到天津日租界居住，直到民國十六年的夏間，王國維自沉頤和園，溥儀還是聒不知恥，頒布命令諡爲忠愍，這些都是反民主叛民國的事實。可憐有些遺老、準遺老們對於這種專制餘

孽，還是念念不忘，在言語上，文字中，照樣沿用。甚至有身任大學教授撰寫論文，左一句梁文忠，右一句王忠愍，封建毒害，真是深入頑固者的腦筋了。滌瑕盪垢，是在言論界的努力，並且應該先要以身作則。

## 記中國永除帝號的本來

民國元年元旦，總理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職的誓詞，開始即說：

「顛覆滿清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於國，爲衆服務。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

這是很鮮明的，揭布滿清專制政府的推倒，是「國民之公意」，可是在一般遺老們準遺老們或者是離開民族主義立場別有存心的人，不說滿清政府的傾覆，是由革命黨入的力量，却用遜清或遜帝、遜位等名稱，來替滿虜解嘲與掩飾。這是中了什麼的毒呢？袁世凱的剛愎自用與背叛民國，也是有了他的藉詞，現在分別述評於下：

南京政府成立，南北議和，可是在雙方討論的時候，北京發生暗潮，和議因之停頓。原來那時清廷親貴如載濤、載洵、載澤、溥偉、善耆、鐵良、良弼們，勾結起來，組織「宗社黨」，力主戰爭，尤其是反對國體的變改，對於袁世凱也抱着不信任與嫉疑態度。因爲袁世凱當時一方面挾持清廷來自重，一方



而與南方議和，企圖從中得利。袁氏「一脚踏兩船」，在民黨，在清室親貴，對他都恨之刺骨，看做眼中釘，都想把他去掉。袁也知道環境惡劣，但機會也是千載一時，惟有施弄他的手段，把清室玩弄。又值北方將領覺悟大勢已去，無可挽救。第二軍統制段祺瑞聯電贊成共和，并有即帶全隊入京，與各親貴剖陳利害的含有恐嚇句語。南方各省府的人民，也紛紛電請清帝退位。空氣轉變，由公決國體問題，轉到溥儀退位問題。清廷召集皇族會議，解決一切。溥倫、奕劻主張讓位，溥偉，載澤抗言反對，互相爭持，幾經磋商，南北議和代表商定優待清室條件八款：（一）關於清帝：清帝的尊號不廢，民國待以外國君主之禮，歲撥經費新幣四百萬元，許他暫居宮禁，日後移居頤和園，宗廟陵寢，由民國設兵保護。其原有私產，亦由民國保護。（二）關於皇族：世爵仍照其舊，除免兵役之外，公權私權，與國民同等。（三）關於滿蒙回藏：其王公世爵及原有宗教，概仍其舊，并代籌王公及八旗生計，四族與漢族平等。此種條件，外傳是張謇、趙鳳昌起草，其實主稿的，是諸宗元，這是諸氏親口對我說的。

優待清室條件，由參議院通過，雙方通知各國政府之后，本來溥儀退位便了。可是他們所謂「遜位詔」（在詔文裏，根本無「遜位」字樣，只有「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閑」一句，遜位名詞，似用不着。）裏有「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爲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卽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海內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爲一大中華民國。……」這樣一來，袁世凱振振有詞，說是共和政府，係由清廷授權給他組織的，他是繼承清朝之後。因之他後來剛愎驕恣，壓抑民黨，實行獨裁，甚至違背民意，叛國稱帝，也爲所欲爲，無惡不作了。

民國三年，清室優待條件善後辦法第三款載稱，「清皇帝諭告及一切賞賜，但行於宗族家庭及其屬下人等。其對於官民賜給，以物品爲限。所有賜諡及其他榮典，概行廢止。」無奈，溥儀既不移居頤和園，又不安分守己，像所謂「遜位詔」所說，「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閑，優游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真是詔文末句「豈不懿歟」！可是他們却不如此，還是像煞有介事般開了門做皇帝。最荒謬的舉動，是繼續頒行贈諡，如陸潤庠

太傅諡文端、梁鼎芳諡文忠、周馥諡愨愨、（甚至王國維在民國十六年自殺，溥儀住在天津日租界，還諡王國維爲忠愨。後來給倭寇挾去長春，做了偽組織的傀儡，對於陳寶琛的死，也是一樣的頌典。）這些倒行逆施的反對民國，是無法可以解答與寬恕的。

加以經過了民國六年，康有爲、張勳等的擁挾溥儀復辟一幕怪劇之後，那些宗社黨，保皇黨，復辟餘孽，封建思想的軍閥官僚與遺老遺少們，甚至游離分子如江亢虎們，無時無刻，都妄想溥儀復辟。此種野心陰謀，久已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的了。等到民國十三年秋冬間，直奉戰爭，馮玉祥等回師，舉行首都（北京）革命，驅逐賄選總統曹錕。又察覺溥儀的再度復辟陰謀。馮氏乃先發制人計，於十一月五日，實行廢除清帝名號，并令交出玉璽，尅日遷移出宮。接着由國務院與溥儀商訂修正優待條件。因爲後訂的和初次所訂的不同，且屬中國的帝號從此永遠斷絕，民國史上光榮的資料，今把他原文錄後：

「第一條，大清宣統皇帝，從即日起，永遠廢除皇帝尊號，與中華民國國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權利。第二條，自本條約修正後，民國政府每年補

助清室家用五十萬元，并支出二百萬元，開辦北京平民工廠，儘先收容旗籍貧民。第三條，清室應按照原優待條約第三條，即日遷出宮禁，以後得自由選擇居住。但民國政府，仍負保護責任。第四條，清室之宗廟陵寢，永遠奉祀，民國酌設衛兵，妥爲保護。第五條，清室私產，歸清室完全享有，民國政府，當爲特別保護。其一切公產，應歸民國政府所有」。國務院并於八日通電全國，說明原委，當中所說「誠以北京爲政治策源之地，而宮禁又適居都會中心，今名爲共和，而首都中心之區，不能樹立國旗，依然仍用帝號，中外觀國之流，靡不引爲笑柄」。廢帝匿居宮內，很久都不照初次所訂的條件，移居頤和園，已經不對，還要幹出種種反民主叛民國的勾當，玷辱國家，貽笑國際，且影響全國的人心視聽，都是很大。所以這一次的辦法，雖屬做的較遲，然亦算清除專制瑕穢的必有手段。可惜溥儀不好好的「與中華民國國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權利」，而聽從耗子鱷魚們的唆使挾持，投到倭寇鐵蹄之下，過那非人的奴隸生活，博取萬年臭名，與袁世凱立於同等地位罷了。

## 從護法之役談到復辟案件

護法之役，在歷史上趨勢的檢討是：「舊政權解體，緊接着的現象，便是舊的黑暗腐敗勢力之轉見抬頭，而新力量無法加以統制。袁世凱誤認此種狀態之意義，而帝制自爲；康有爲又誤認此種狀態之意義，而參加復辟。」（見錢穆：國史大綱——辛亥革命以後之政局）

鄒魯的「中國國民黨概史」，對於是役有簡單的敘述：「洪憲告終，黎元洪任段祺瑞組閣，副府院發生不睦，段復藉張勳所組之督軍團及其所組流氓團，迫國會通過對德宣戰案，因而段內閣本身自行解體。張勳率兵入京，迫黎元洪解散國會，進行復辟。總理於是乃以護法號召全國聲討。迨段祺瑞率師由馬廠入京，仍任國務總理，毀法不顧。總理乃率海軍南下護法，開非常會議於廣州，就海陸軍大元帥職，成立軍政府，進行護法計劃。……」

護法之役，是從民國六年七月開始，這一役的意義，在國民革命過程中，異常重大。總理在「中國之革命」中，對於護法的解釋，是說：「故護擁約

法，即以擁護民國，即國人之對於民國無有異志也。余爲民國前途計，一方面更望有更進步、更適宜之憲法，以代臨時約法；一方面則務擁護臨時約法之尊嚴，俾國本不因以搖撼。故余自民六至今，奮然以一身荷護法之大任。」

因爲北方政府毀法瀆紀，故總理纔由上海南下廣東護法。而北方毀法的因子，是從黎元洪非法解散國會，康有爲、張勳擁持溥儀復辟而來。這一幕怪劇，和袁世凱叛國稱帝，原因雖有不同，但是封建餘孽最後蠢動的表現，則如出一轍。張勳的入京，外表似是調和督軍團的獨立。張抵京後，請黎元洪解散國會，廷芳不肯副署命令。黎准辭職，下令解散國會。接着暴風雨發生，即溥儀小醜復辟。

事情不是這樣簡單的，原來保皇黨首領康有爲自民國成立回國以後，頻頻往來上海廣州間，有所企圖。袁世凱和康有爲，因戊戌政變，已成不共戴天之仇，勢如水火的了。袁任總統，對於康時存嫉忌，幾次用國務院總理職位來餌康，想康就範。可是康別有存心，向來主張君主立憲，無時不圖謀溥儀復辟，便把袁意推却。自從袁死後，張勳在徐州召集幾次會議，儼然爲北洋軍盟主。

康和張往來甚密，利用張是武夫，又和復辟黨接近，容易共謀。張未入京前，在徐州會議，已商得各省當局多數同意，贊成復辟計劃。他因此胸有成竹，只帶了五千兵，和新總理李經羲北上。可見他事先已有充分準備，得了軍閥們的合作。張到京後，由張的參謀萬繩棻密電康有爲。康到京，即住張家，協商復辟陰謀。

當六月三十日的深夜十二時，張約了陸軍總長王士珍、步兵統領江朝宗、警察總監吳炳湘、十二師師長陳光遠等密謀，並定開城使定武軍入城。議定後，改穿前清的朝衣朝冠，由張勳率領王士珍、江朝宗、吳炳湘、陳光遠、劉廷琛、沈曾植、勞乃宣、阮忠樞、顧瑗、萬繩棻們幾十人於七月一日晨三時，同入清宮，奏請復辟。當即發布所謂上諭，略說：張勳、馮國璋、陸榮廷等合詞奏請復辟，瞿鴻機等奏請御極聽政，黎元洪奏請奉還大政，允如所奏。並宣示興革九大端如下：一、欽遵德宗景皇帝諭旨，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定爲大清帝國，善法列國君主立憲政體。二、皇室經費，仍照所定每年四百萬數目，按年撥用，不得絲毫增加。三、慊遵本朝祖訓，親貴不得干預政事。

四、實行融化滿漢之畛域。所有以前一切滿蒙官缺已經裁撤者，概不復設；至通婚易俗等事，並着所司條議具奏。五、自宣統九年五月本日以前，凡與東西各國簽字條約，及已付借款合同，一律繼續有效。六、民國所行印花稅一事，應即廢止，以蘇民困。其餘苛稅雜捐，並着各省督巡查明奏請分別裁撤。七、民國刑律，不適國情，應即廢除，暫以宣統初年頒定現行刑律爲準。八、禁除黨派惡習，其從前政治罪犯，概予赦免；倘有自棄於民而擾亂治安者，朕不敢赦。九、凡我臣民，無論已否剪髮，應遵照宣統三年九月諭旨，悉聽其便。這九條所謂革新大政，東拉西扯，手忙腳亂，以爲是面面俱到，其實只是非驢非馬的混合罷了。

復辟公布之後，跟着發表了一批官僚，設置內閣政務大臣，並閣丞二員。其他京內外員缺，都照着宣統初年的官制。僞內閣的職名如下：太傅徐世昌，大學士瞿鴻機、升允，協辦大學士周馥、張人駿，內閣議政大臣張勳、王士珍、陳寶琛、梁敦彥、劉廷琛、張鎮芳，內閣閣丞萬繩栻、胡嗣瑗，外務部尙書梁敦彥，民政部尙書朱家寶，度支部尙書張鎮芳，陸軍部尙書雷震春，海軍



部尙書薩鎮冰，學部尙書沈曾植，郵傳部尙書詹天佑，農商部尙書李盛鐸，法部尙書勞乃宣，理藩部尙書貢桑諾爾布，參謀部大臣王士珍、副蔣作賓，弼德院院長徐世昌、副康有爲；還有什麼侍郎等職名。外官呢，則有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留京辦事張勳，兩江總督南洋大臣馮國璋，兩廣總督陸榮廷，直隸巡撫曹錕，江蘇巡撫齊耀琳，安徽巡撫倪嗣沖，山東巡撫張懷芝，山西巡撫閻錫山，河南巡撫趙倜，江西巡撫李純，湖南巡撫譚延闓，浙江巡撫楊善德，廣東巡撫陳炯明，廣西巡撫譚浩明，湖北巡撫王占元，黑龍江巡撫許蘭洲，福建巡撫李厚基，雲南巡撫唐繼堯，貴州巡撫劉顯世，新疆巡撫楊增新，甘肅巡撫張廣建，奉天巡撫張作霖，吉林巡撫孟恩遠，四川巡撫劉存厚，陝西巡撫陳樹藩，熱河都統姜桂題，綏遠都統王丕煥，察哈爾都統田中玉等。

這些帝制人物，自然有許多是自告奮勇或同意的，而其中的名字，給他「強奸」式隨便公布的也不少。我們研究歷史，只可把他當做是當時的一張名單而已。事後有人說，這張單子，沒有段祺瑞的位置，所以弄出馬廠的起兵討伐，說是分贓不均的反響。其實這種違背民意，反叛民國的舉動，結果必定崩

潰，是沒有甚麼疑義的了。

復辟怪劇的演出，當初沒有人知道，及到揭布的那一天，北京市民，纔得知道，只有三數商店被迫懸掛黃龍旗，其他也沒有什麼異動。梁鼎芬受了張康之命，入總統府遊說黎元洪，沒得要領。黎避到日本使館，通電否認歸還政權，任命段祺瑞爲內閣總理，請馮國璋代理總統。段和張勳本來不睦，但對復辟，初亦沒有反對的表示。直隸曹錕不滿張勳的專橫，且搶了直隸總督的位。梁啓超早已和其師康有爲意見相左，面和段有往來。因此種種緣故，馬廠起兵討伐復辟，便馬到成功了。

當雙方戰事劇烈的時候，張勳手足無措，康有爲逃入美使館，張鎮芳、雷震春、馮德鄰都被捕。徐世昌在天津向段協商，電告清室世續說：「幼君安住宮中，則優待一事亦可繼續有效。」又電張勳即日把軍隊移交王士珍，解除武裝，遣駐城外，且說：「執事既不操兵柄，自可不負責任。至於家室財產，已與段總理商明，亦不爲已甚，昌當力爲保護。」徐世昌是沉着陰鷲，善於應付的老官僚。辛亥袁世凱復出，以至洪憲稱帝，溥儀復辟等內幕，他都是幕中人。

看他給張勳電文所說「昌當力爲保護」一語，可見他的潛勢力了。張勳進退失據，只有十二天的把戲，便踉蹌逃入荷蘭使館，來結束他最後之一幕了。

關於復辟一幕的前奏，錢基博在「現代中國文學史」談及康有爲也說到：「袁世凱既殛，有爲彌用自喜，昌言無忌，好惡拂人之性。久之，漸爲論政持國是者所不喜。獨長江巡閱使張勳有貳心於民國，陰贊其說而加以隆禮焉，則以遜帝復辟之說進也。張勳曰：諾，是吾志也；汝其問諸馮華甫。華甫者，副總統領江蘇督軍馮國璋也。有爲乃以勳意贊於國璋及廣西督軍陸榮廷，皆無違言。國璋且曰：張紹軒豈能辦此，倘君出，我則執鞭弭以從。有爲則大喜，乃囑周樹模以致告於段祺瑞。時祺瑞方以國務總理不得志於總統黎元洪，而元洪又挾國會自重，鞅鞅以失職，則應曰：民主日爭，非君主不能已亂，但只可有其形式，不可用其精神。有爲曰：此我之所謂「虛君共和」者也，段芝泉同我矣，我則問諸徐菊人。徐菊人既聞有爲之言，而協贊焉。有爲則以復於張勳曰：衆謀僉同矣。於是十四省督軍以六年五月，會議徐州，謀復辟，署盟書，信誓旦旦，盡諾惟謹，而推動爲主盟。」

在段祺瑞發兵聲罪致討時，張勳即通電反駁之，內有云：「勳知國情祇宜君主，即公等卓見亦早詆共和。茲方擁戴冲人，輒即反對復辟，或實行攻戰，或電文誚罵。若謂擁護共和，何以摧殘國會？如以王公之位未獲寵封，故不甘於爲叢廠爵，而爲逐鹿中原，則並不爲大局綢繆，純爲利權起見；徒說伸張大義，豈爲好漢英雄？若必激浪揚沙，翻雲覆雨，深恐九州鼎沸，無以奠寧也。」張奏請復辟文中有說：「臣等反覆密商，公共盟誓，謹代表二十二省軍民真意，恭請我皇上收回政權。」對於段祺瑞也說：「芝老雖面未表示，亦未拒絕。勳到京後，復派代表來商，芝老仍謂解散國會、推倒總統後，復辟一事，自可商量。」失敗後，更發洩憤慨感傷的自白通電，有云：「已獲巨罪，人慶大勳。恨當世無直言，怨民國妙公刑。」張勳這些話，究竟是否事實，不得而知。但是張勳在憤恨之餘，幾次想把復辟前後文電公開宣布，都給督軍們反對或疏通，纔忍氣罷止。康有爲也憤憤不平，致書徐世昌，洋洋五千言，揭發經過，力指段祺瑞、馮國璋、徐世昌們均與司謀，即所謂「與徐太傅書」，登在「不忍」雜誌第九第十合冊，可見參加這一幕怪劇的演員，提場、布景、導

演、編劇等，是些甚麼人物了。

於此順便摘錄康有爲的詩數首，如「五月十三日復辟成出遊瞻宮闕謁文廟飲萬寶園」云：「六年四亂亦堪悲，聖主中興萬物熙。雞犬不驚金鼓靜，駝車九陌看龍旂。」怎知過了幾天，他倉皇失措了，如「十八日南苑飛機隊潘世忠尉遲良以飛機投彈于宮中斃三人宮廷大震」云：「流涕皇宮避艱難，宮頂飛機幾次盤。奉召趨朝不俟駕，臨危叩闕呈鳴鑾。羣臣散走殿廷寂，外使商量宮禁安。不意廿年歸國日，龍樓鳳閣對汎瀾。」「諸帥本與紹軒徐州訂盟復辟今竟妬功背盟無信」云：「圍城慘澹賭龍爭，蟬吟聲中聽砲聲。諸帥射王敢傳檄，羣僚賣友竟稱兵。晉陽興甲何名義，張柬無謀召喪傾。信義云二人道絕，龍旂收影涕沾纓。」馬廠興師，梁啟超曾與謀，康因此恨梁實深，如「此次討逆軍發難於梁賊啓超也」云：「鴟梟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中關。逢蒙彎弓專射羿，坐看日落淚潸潸。」看了這幾首詩，也可以反映當時事實的一斑。

復辟既然曇花一現，馮國璋繼任總統，段祺瑞繼任內閣總理，本可恢復國會，尊重約法，那就南北也可以統一。可是軍閥自有他們的手法，段因前次對

德宣戰案國會不予通過，餘恨未平，心存嫉視，決定另行改組。所以復辟雖然崩潰，代表民意的立法機關，還是中斷。西南各省激於義憤，聯合反對。雲南督軍唐繼堯，首先通電主張總統復職，國會應即召集，國務員應由總統任命，稱兵抗命之禍首，應按律懲辦。春雷一聲，天下震動。到了八月二十一日，海軍總司令程璧光，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通電以擁護約法、恢復國會、懲辦禍首三事自矢，統率艦隊，南下廣州。國會大部分議員和民黨同志，也紛紛到粵，一致擁護 總理的護法大業，在粵組織政府。於九月十日，總理就任大元帥職，發布命令，敘述北京政府另組織新國會的悖謬。並以段祺瑞、倪嗣冲們背叛民國，毀法瀆紀，下令討逆戡亂，來號召全國。

護法之役，雖然起端於民國六年，而其伸引延綿轉變，中間經過革命軍北伐，而到西南歸政中央，前後不下二十年，廣東纔能真正的歸屬中央統治。然而國民黨的改組，革命軍北伐的成功統一全國，打倒軍閥。他的動機，都由護法役起始。那麼，護法之役對於國民革命的關係，重要性也可知了。

綜合的結論，有如下述：

北方軍閥們充分表現舊的黑暗腐敗勢力活動，如各省軍閥的割據和反抗中央。

思想腐化的官僚、遺老、準遺老、買辦、紳耆、大地主們，無不妄想帝制復現。

段祺瑞雖然馬廠起義討伐張勳，但他還是摧殘民意，毀法壞紀，目無民國的軍閥。

徐世昌、馮國璋、段祺瑞們對於復辟案，直接間接，各有關係。事後還是逍遙法外，先後掌握政權。

在此艱鉅過程中，不屈不撓，始終領導國人討逆戡亂、尊重民意與法統的，只有總理。

中國國民黨自始至終，主張全部的政治革新，並採取革命手段，絕不和滿清專制政府狹義的部族政權妥協，與康有為所倡的保皇變法及虛君共和等論調不同，甚至立在絕對相反的地位。

國民黨本着一貫的革命主義，在總理領導之下，從事護法。雖然經過了

許多艱難險阻，內傷外感，都能够掃除障礙，抵達成功的途徑。換一句說就是違背三民主義的反革命的一切新舊政權，終必傾覆。



## 討袁珍聞

十二月廿五日，有三個偉大的紀念：一是西安事變的民族復興節；二是護國軍在雲南起義；三是耶穌降生的紀念日。現在讓我來談談與雲南起義有關聯的幾段珍聞。

袁世凱叛國稱帝，總理早已洞悉他的野心陰謀。故事前特派委幹部同志分赴各重要省區，從事運動討袁工作。民國四年九月，派胡漢民赴菲律賓，鄧鏗、許崇智、宋振赴南洋籌款討袁。十月，命陳其美赴上海，居正往山東，朱執信回廣東，于右任返陝西，石青陽回四川，夏之麒赴江西等省市，運動軍事，發兵討袁。這是中華革命黨討伐袁氏的布置。同時發表討袁宣言和檄文，聲討袁氏罪狀，使中外各方都能瞭然袁世凱叛國稱帝的罪惡。

說到雲南的護國軍起義，不能不說到蔡鍔了。蔡鍔未赴滇之先，在北京時，任總統府統率辦事處的辦事員。統率辦事處由袁世凱兼任處長；辦事員都是中將階級以上的人物，地位很高。蔡又兼任全國經界局督辦。他平日行動，

袁氏早已注意，蔡也知道。故借花天酒地，在筱鳳仙處流連，來掩飾警探的耳目。這一段豔事，許多人都曉得，用不着贅述。而當中有一段枝節事情，據參加是役的韋君告我，是這樣的：

馮國璋那時是江蘇督軍，馮的祕書長黔人胡嗣瑗，原屬滿清翰林。辛亥革命，自命爲遺老。後來得人介紹，夤緣馮任祕書長，兼金陵道尹。馮事無大小，倚他如左右手。民四夏間，馮保荐他巡按使記名，怎知袁氏不准。胡抱恨在心，常常想找機會報復。恰值張勳的顧問潘若海，常奔走徐州甯滬間，從事各方聯絡。和胡是文字知己，彼此同情反袁。那時，梁啓超已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汪鳳瀛發表「致籌安會書」，徐佛蘇發表「對於籌安會之意見書」。都是反對變更國體的。各方最注目的文字，還是要推梁啓超的一篇。梁到上海後，潘以同鄉關係，特往訪梁。雖知梁與蔡鐸有密謀，但未知底蘊。於是設法向梁探索根源，而對梁說：「馮華甫（國璋字）是反對帝制的，不過因和袁歷史較深，不便發難。倘有別人首義，他必響應。可惜袁現在已偵悉馮的舉動，內調爲參謀總長，不日離寧，失了固有地盤，難以附義。事已危急，刻下

還無陳涉吳廣的人們，實在可惜！——那時，梁一時不察，竟信爲事實；且憶及那年秋天，和馮相見，談及帝制事，馮也微露反對。前因後果，信不之疑。於是把倒袁計劃告潘，并請潘在南京代爲收發密電。潘均答應。過了幾天，梁已接到南京復電，說一切照辦。那時，梁已準備入桂。於是吩咐潘赴寧，請馮密爲部署一切，候電發難。

梁與岑春煊等在廣東肇慶組織兩廣都司令部，岑爲都司令，梁任都參謀。廣西、廣東、先後獨立；未幾，四川、湖南、貴州，也扶義而起。袁氏卒取消帝制，而至暴死。而馮國璋始終坐鎮南京，沒有變動，絕未有跟隨滇黔桂粵川湘各省之後。梁覺得非常詫異，馮爲什麼食言爽約。而當日奔走運動的潘若海，恰在民五的三月病逝，死無對證，實在感到奇怪。

過了些時，馮被舉爲副總統。梁到南京，乘便問及當時反袁之事，爲什麼不履行約言出師。馮聞之愕然，隨反詢什麼人相約。梁說潘若海。馮不識潘。梁即在皮包中取出當時南京軍署的電報。馮纔知是胡的所爲。原來當時的一般軍閥，自己向不看公事，任由秘書長判行。故在上海，潘與梁所談和南京代表

發出一切密電，馮均未之知，只是胡藉此而發洩報復袁氏之不肯准他巡按使記名的憤恨。但是無論如何，胡之假公濟私也好，潘買空賣空也好。這一幕趣劇，倒便宜了馮國璋得任副總統而至大總統的機緣。胡自此事揭發後，即去徐州，依附張勳，參與復辟。後來，又跟溥儀走長春，演傀儡劇。這也可算是沒有心肝的滿清餘孽，反覆無常的官僚典型。

陸榮廷的反袁，亦有原因。初時陸想去電勸進，先電詢龍濟光如何。龍不復，再問段祺瑞。段說北方諸將聯銜電早已發出，既然贊同，只可獨單入告。

陸纔用個人名義，照例發出「非袁莫屬」的電。陸子裕勳，本在模範團供職，與龍觀光之子用乾，倪嗣冲之子道杰，叫做三公子。帝制醞釀的時候，段芝貴派員和裕勳南下兩廣疏通。怎知裕勳到桂之日，陸即接到段電，不允他附名勸進，很不高興。裕勳北上，未幾，因再南歸，行到半途即咯血死。陸的左右說是袁所毒害。陸舐犢情深，又因各方反袁的力爲慫恿挑撥，於是也參加討袁的工作。陸的夢寐間，刻刻想做兩廣巡閱使。袁知其故，特准給他。但因封爵階級，陸還未滿。到了蔡鍔雲南起義，陸電袁自請征黔，以陳炳堃任桂督，索軍

費百萬元。袁給他，任陸爲貴州宣撫使。陸率軍出發。龍觀光也奉命假道廣西入雲南。陸與龍是親家，龍性庸愚，僅帶少許部隊攜運新式軍械入桂，行至百色，即遭陸幽禁。陸那時有餉有械，就在民五的三月十五日宣布廣西獨立。

蔡鍔在民四的十二月二十三日致電袁世凱，請懲治禍首：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段芝貴、朱啓鈴、周自齊、梁士詒、張鎮芳、袁乃寬、顧鰲等十三人，以謝天下。限廿五日上午十時以前答覆。到時沒有收到復電，故特宣布獨立。這一批帝制餘孽，到了現在，只遺留顧鰲一人還在上海，其他均已先後去世。梁士詒呢？在他的「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裏，極力洗刷和洪憲事件有關，反而標榜和國民黨接近，協助總理革命活動，是非顛倒，令人難信了。

## 五四運動的意義和效果

中國自從辛亥革命，傾覆滿清專制政府以後，以至二次革命，護國護法等役，只是對內的政治問題，還沒有對於帝國主義者的侵略，發生過直接的革命運動。直至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的五四運動，纔是民族的對外革命的一種表示。這可算是中國革命運動中的新動向，也是新文化運動開始的一頁。

原來歐戰告終，美總統威爾遜發起在巴黎舉行和平會議，各國均派代表赴會。中國也以戰勝國地位，派陸徵祥、王正廷、顧維鈞、施肇基、魏宸組等五人參加。五代表在和會中，提出議案，收回租借地，撤銷領事裁判權，改訂關稅等。同時留歐學生以民國四年，袁世凱沒有經過國會通過，私與日本訂立二十一條件，要求代表一併提交會議，請求公判。和會以二十一條件，不是他們權限能够裁判來推宕，擱置不理。跟着山東問題，便引起全國的震憤了。

那時，協約國和日本代表正與德國締結條約，規定日本繼續承受德國在山東的權利，中國代表據理力爭，並且提出膠州應該歸還中國的理由。而日本代

表宣言，根據民四袁世凱簽字的條約，和民六駐日公使章宗祥同意的照會，說中國確已允許日本承受德國在山東的權利。同時英法俄意等國，又各和日本訂立的密約中，曾作同樣的允許，不能夠靠他們說什麼公道話。因此一來，山東問題和膠州歸還問題，便成爲中日直接的交涉了。警耗傳來，全國震憤。這是五四運動的主要來由。

章宗祥暗中歸國，本來他的陰謀，是準備和曹汝霖陸宗輿們，想着掉換陸徵祥王正廷等，實行聯日賣國。怎知這個消息，給上海時事新報和東京時事新聞探悉密情，就把他揭布出來。留日學生界又有一篇聲討賣國賊電文發表，當中有說：「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徐樹錚、靳雲鵬等，狼狽爲奸，甘心媚日。迹其邇來所爲罪狀，足以制國家之死命，約有二端，而已往之借款借械，賣路賣礦不計焉。一曰掣專使之肘以媚日也。二曰藉邊防之名以親日也。」爲了此電，激起北京學生的公憤。本定五月七日國恥紀念，在天安門爲大示威運動，後接得留日學生通電，知道青島問題，將讓歸日本。於是急不及待，由北京大學首倡，即定在四日齊集天安門舉行示威運動。當演說的時候，法科學生

謝紹敏咬破中指，扯碎衣襟，用指血寫「還我青島」四字，一時羣情洶湧，淒涼悲壯的氣象，瀰漫全場。第二天，各校學生齊集，天安門橋南，樹起一張大白旗，隨風招展，旗上寫了一聯云：

賣國求榮，早知曹瞞遺種碑無字。

傾心媚外，不期章惇餘孽死有頭。

上下款是「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遺臭千古」，「北京學界輓」等字。大旗之外，又有小白旗數十面，如「取消二十一款」，「誓死力爭」，「保我主權」，「勿作五分鐘愛國心」，「爭回青島方罷休」，「寧爲玉碎勿爲瓦全」，「頭可斷青島不可失」，「賣國賊曹汝霖」，「賣國賊章宗祥」等，即謝紹敏的血書「還我青島」，也懸挂在內，各校學生到場參加的見着，都大受感動。

開會時的宣言，說得慷慨激昂，義正辭嚴，如云，「……背公理而逞強權，將我之土地，由五國共管，儕我於戰敗國，如德奧之列，非公理，非正義也。今又顯然背棄山東問題，由我與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紙空文，竊掠我二十一條之美利，則我與之交涉，節言之，是斷送耳，是亡



青島耳，是亡山東耳。……我同胞處此大地，有此山河，豈能目睹此強暴之欺凌我，壓迫我，奴隸我，牛馬我，而不作萬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於亞魯、撒勞兩洲也，曰，「不得之，毋寧死」。意之於亞得利亞海峽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寧死」。朝鮮之謀獨立也，曰，「不得之，毋寧死」。夫至於國家存亡，土地割裂，問題吃緊之時，其民猶不能下一大決心，作最後之憤救者。則是二十世紀之賤種，無可語於人類者矣。……至有甘心賣國，肆意通奸者，則最後之對付，手槍炸彈是賴矣。」一面又另送傳單，全體三千多人，浩浩蕩蕩，往東交民巷各國駐華公使館，請求協助中國，爭回青島。警察總監吳炳湘、教育部代表等雖然極力的勸阻，也給民衆的愛國公憤，衝破了官的勢力。羅家倫等代表向美英法等使館呈遞意見書。之後，羣到趙家樓曹汝霖住宅，搗毀家私雜物，又把章宗祥當場毆傷，并把曹宅放起火來，（關於曹宅放火，一說是學生憤恨，燒曹宅來洩憤。一說是曹賊臨逃時，授意家人縱火，既可架誣學生罪名，復可以號召軍警，趕散學生。亦有說曹宅傭人，自行放火，希圖搶掠衣物。）一時火光熊熊。這次曹宅被毀，曹汝霖腿傷，章宗祥被打傷，只便宜了

陸宗輿一人。

當時北京總統徐世昌發出一篇很妙的通令來，他既不替曹章伸冤，也不責備學生，反把警察總監吳炳湘訓斥，說吳「事前調度失宜，殊屬疏忽」。更要懲戒警察人員。可是吳炳湘不肯任咎，以學生滋擾，不服攔阻呈復。徐世昌於是下令將當場逮捕之學生，交法庭辦理。因此，引起上海的工商學各界罷市罷學罷工，要求罷免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并釋放被捕學生。及後南京、杭州、武漢、天津、九江、山東、安徽、廈門、廣州等地的學生工人，一致繼起聲討賣國賊和抵制日貨。徐世昌知道民氣激昂，下令免曹陸章三人職務，上海纔開市復工復課。

這次運動的結果，中國在和會各代表不敢違背民意，在六月二十八日拒絕簽字於和約，聲明除了第一百五十六至一百五十八的三條外，餘均贊成，對德奧兩國的邦交與協約國同時恢復。我們知道這次的意義和效果，不僅是毆打一兩個賣國賊，同時對於許多的賣國賊，如北洋軍閥，也聲言打倒。又不只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至歐美的各帝國主義的國家也受警告。不僅要廢除日本的二

十二條件，即對各國的不平等條約，也同時要廢除。新文化抬頭，陳腐文化消蝕，這些都是五四運動所收的成果。

## 革命黨與基督教

蔣主席在「中國之命運」第三章有說：

就宗教來說：……明末清初，基督教輸入中國，皆有裨益於中國的學術思想。中華民族能够如此，所以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歐洲中古時代那樣的宗教戰爭。近百年，基督教在中國，對於科學知識的灌輸，與社會風氣的改革，都有良好的影響。太平天國的革命，以基督教義爲思想的根本。即國民革命的潮流，基督教理也多播其種而植其因：……

這是明白揭示我國革命，從太平天國而到國民革命，都受了基督教理的影響。總理的「孫文學說」第四章，也有說：「人類進化之目的爲何？……耶穌所謂『爾旨得成，在地若天』，此人類所希望，化現在之痛苦世界，而爲極樂之天堂者，是也。」換一句說，革命最終的目標，是使全世界的人們，都能够如耶穌在指導門徒祈禱中所說的，上帝的意旨，能够成就，人類在世界上沒有一些痛苦，天國降臨在世間。所謂「在地若天」，就是這樣。

我們從我國的中古史，近世史，現代史來看，知道基督教（包括新舊二派）對於中國的學術政治，都有極大的直接關聯，如明末的耶穌會（屬基督教舊教，即天主教（公教）的一派。）教士輸入西洋科學，替政府製造銃礮。中國人已認識西人曆算的精密，和製造技術的奇巧。可惜多數的認製造爲作奇伎淫巧，效法蠻夷，沒有多大肯去潛心研究。所以天主教在中國對於政治改革，影響并不甚大。直到公元一八零七年（嘉慶十二年，英人馬理遜傳入基督新教，纔對於中國近百年史的政治革新運動，無論直接間接，都有密切的關係。蔣主席所說：「太平天國的革命，以基督教義爲思想的根本，即國民革命的潮流，基督教理也多播其種而植其因」。那麼，吾國革命運動，尋因探緒，這個結論，實在確切不磨，不論是否信仰基督教的，事實具在，是不能夠否定的了。

我們現在從事實上而研究本題。

## 一、基督教與太平天國

洪秀全反清的動機，和太平天國的一切設施，都和基督教理有關係，這是

很多人都知道的。歐得利牧師 (Rev. Alex. Wylie) 在「中國改正教的出版物」中，列舉梁發著作目錄有說：『一八三二年，在廣州著「勸世良言」，這是包含九種小書的一個集子，由馬理遜先生代爲校訂付印。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最初認識基督教的真理，就是讀了這本集子』。這是說明洪秀全的認識基督教的因子。至洪秀全怎樣的得讀梁發的「勸世良言」和思想上的變動，我們在麥沾恩所作的「中華最早的佈道者梁發」書中第十四章所敘述梁發派送佈道小冊子的效果，便可以知道了：

梁發和他的同事們在學院分送小書的時候，曾把書籍一份派給一個童生。這個童生的名字，叫做洪秀全，考試落榜，帶了那份基督教書籍回到他的家裏去，這件微小的事情，後來竟造成中國歷史驚天動地的一個大變局。洪秀全落榜回家的時候，年紀只有二十歲，他起初對於梁發所派給他的書，并不注意，只將他放在書架上，擱了九年（丹按事實上只有七年）之久。一八三七年，他再赴府試，仍舊名落孫山。考試完畢回家，不久，就生起病來，他在病中看見許多異象。他在恍惚之中，看見一個令人

起敬的老人授給他一把斬魔劍。又看見一個自稱「長兄」的中年男子，教他如何使用那劍。一八四三年某日，他坐在書房中看書，忽有友人前來拜訪他。那個人書架上發見梁發的書，而對洪秀全說着，這纔引起了他的注意。當下他從書架上把那書拿出來閱讀。他讀了這書以後，就相信已尋得解釋他所見的異象的鑰匙了。他知道那令人起敬的老人，就是上帝，而郝所謂「長兄」者，就是耶穌基督。他悟到他所見的異象，是神的啓示，因此他就拔劍而起，從事他的革命運動，這就是「太平天國之亂」的來由。洪秀全同一個名叫馮雲山的友人，受了梁發的書的感動，興起打倒偶像的戰爭，組織一個上帝會。可是他們雖有熱誠，却少知識，而他們所用的破壞手段，更難博得人們的同情。洪秀全久有意思要加入基督教會。到了一八四七年，他第三次府試落榜以後，他就決定意思加入教會，他跑去拜訪美國浸信會宣教士羅孝全（Roberts）牧師。他與那牧師同住了九個月，沈潛於基督教的教訓之中。洪秀全請求那牧師爲他施洗。可是牧師因爲洪秀全的神學觀念，有些怪誕不經，不願與他施洗。洪秀全

失望之餘，就回去創立他自己的團體，集合一些有志反抗清朝和反對崇拜偶像的人，在他的旗幟之下。可惜後來他因戰事上的勝利而變壞了他的性格。他的心理發生了不平衡的狀態，他竟欲求與神子并列，可謂褻瀆神明已極。他曾經採取梁發先生用文字佈道的方法，著作宣道小書，他初期所作的小書，極合於基督教的教義，其中一種，叫「宗教戒律」，麥都思牧師曾說：「此書可說是太平天國諸人所著作的一些書中，最好的一本。其理由正當，其禱告文亦佳，而其關於人類之邪惡，耶穌以血救贖人罪，及聖靈感動人心等教義之敘述，皆能引導一切有志求道之人，共行天國」。洪秀全所組織的團體，除了他們自己所著作的傳道小書外，又印送聖經。當時英國教會，對於他們這種運動，認為極有希望，以為可使中國人趨向聖經。當時英國聖書公會適逢五十周年紀念之期，就乘此機會，籌募款項，印刷華文聖經一萬本，在中國各地分送。

梁發，是基督教入華以后，華人第一個的宣教士，他的墳墓，現在還在廣州的嶺南大學校園裏。据「浸會在華布道百年略史」所說，「勸世良言」小書，



不是由梁發直接送給洪秀全，而是由浸會牧師羅孝全（丹按：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裏，羅孝全譯爲洛波士），送給洪秀全的。又據別種記載「上帝會」的組織，是在「十九世紀初年（嘉慶末），廣東有朱九濤者，自稱明室遠裔，創上帝會於廣州，頗有假借祕密結社恢復明室的意思。花縣人洪秀全馮雲山并師事之。九濤死，秀全繼爲教主，官廳捕之甚急，秀全乃走香港，入基督教」。〈見余遜的高中本國史〉其實洪秀全始終沒有依照入教儀式來正式加入基督教會，在「浸會在華布道百年略史」，也有說及羅孝全在一八五零年再到廣州，「這年有洪秀全請求他給施浸，他沒曾允許，因爲看洪秀全的信仰不夠」。這種記載和「梁發」書中所敘述，完全相符，只有時日有些先後的區別了。惟余遜所說洪秀全走香港入基督教一說，是無根據的，因爲在教會歷史所載述，洪秀全始終沒有正式加入教會。

洪秀全的太平軍，以排滿滅清，解除人民痛苦相號召，當時頗受一些民衆的歡迎。「梁發」書中并說「記載這個革命運動最詳細和最精確的書籍，是美都司（Meadows）所作的一本書（出版於一八五六年），書中論及梁發對於

洪秀全的影響，說「洪秀全和他的朋友馮雲山決意到外省去傳道，而以販賣筆墨，維持生計，那是他受了梁發書中所載的『先知在故土室家外，莫不受人的尊敬』的一句話，和使徒行傳十九章保羅傳道的事跡的影響」。由此看來，洪秀全雖因信仰關係，教會牧師不允替他施水禮，收他正式加入教會，但他本人和他的同志們，曾經緣飾教義，如：「天父下凡詔書」，「天條書」，「昇天祭告奏章」，「太平治書」，「頒行詔書」，「三字經」，「太平救世歌」，「天理要論全編」，「天情道理書」，「御製千字詔」，「天父詩」，「醒世文」，「士階條例」，「英傑歸真」，「軍次實錄」，「己未九年會試干王寶製」，「開朝精忠軍師干王洪寶製」等（各書目摘錄簡又文的太平天國之文物）。都是引經據典，把政治、軍事、禮儀等，引申宗教道理。雖然其中有些是穿鑿傅會，但他借託宗教來期望達到他們的目的，如「誅妖救世文」，敘說聖經中的故事，上帝創造天地，怒降洪水，救以色列人，遣子耶穌降生，天王救世。咸豐胡奴，爲中國世讎，且率人變爲妖類，望志士起兵，共立勤王之勛，人民亟早回頭等語。

當洪秀全們初期宣傳宗教，常勸人必須毀掉孔子牌位，和一切偶像，專心拜一位上帝。所以到處都引起人們反對，說他是邪教。在太平建國的時候，還是脫不了帝王思想，唯一的宣傳，只是叫人反對偶像，改拜上帝。對於耶穌贖罪重生的道理不甚注重，而注意的是舊約的教義。加以急進地破壞偶像，與一般民衆的習慣，也發生齟齬，教徒和平民之間，不能相容。官廳得着情報，說他們妖言惑衆，嚴加禁止。但是他們仍然努力進行，向下層社會工作，楊秀清且借託能說預言，用祈禱來治人疾病，又禁止教徒吸煙飲酒，更不准吸食鴉片。每七天舉行禮拜一次，經過相當期間，平民因此而信仰的便漸多了。

太平軍起義之後，連戰皆勝，固然是由於民族思想的鼓勵，人人希望驅除鞏虜，光復漢族，所以詆滿人爲妖魔，用殺盡妖魔爲口號。然這是表面的號召，而他們根本的原因，却是他們宗教的信仰和組織。政治、軍隊都是宗教化，士兵充滿宗教的犧牲精神，每逢打仗，大家勇往直前，置生死於度外，共同篤信死後靈魂上天國，得享永生的福樂。爲誅伐妖魔而死，是最榮耀的事。那麼，以不怕死的太平軍，來和怕死的腐敗清軍交鋒，勝敗如何，也可以知道了。

太平軍當攻取一城一邑的時候，必先派間諜去張貼布告，宣傳反滿的意義。大意是說太平軍是稟承天父旨意，來驅逐滿族妖魔拯救天父的子女，凡是歡迎太平軍的，就可以出迷途而登天國。這些話，很能迎合一般人民所謂「真命天子」的封建思想。所定的軍律，尤其是充滿宗教的意義，如軍營規例中的第一條，是「要恪遵天命」，底下附有詩云：「皇天上帝是真神，朝夕禮拜自超昇；天條十款當遵守，切莫鬼迷昧性真！」舉一反三，可見一斑。軍中有一位洪仁玕，是秀全的本家，賜封干王。他原是倫敦會的宣教士，他投到軍中，想着在宗教方面工作，但秀全却派他當軍師。他對於宗教方面，也有過一番規劃。當時西教士不知太平軍內容，只靠道聽塗說的傳揚，多爲驚歎。於是有幾位西教士前往觀光，如楊格非由上海到蘇州，見李秀成洪仁玕，又到南京謁見洪秀全，要求在太平軍轄境內自由傳教，已得到允許。美國人白齊，本在清軍服務，因太平軍的宗教信仰，表示欽佩，特地轉到太平軍中，代爲策劃軍事，并且說：

鋒鏑之中，乃能篤信宗教，不失儀節，其道德自當高出於清軍，吾何

憤憤，乃爲虎作倀，憑利器而殺上帝之信徒哉？

白齊且祈禱懺悔，決志效忠於太平軍，後來竟爲太平天國而死。林利在「太平天國外紀」有說：

基督教在中國三十年中，僅得一千四百信徒，今太平天國一旦有七千萬信徒，而歐洲教士不知加以扶助教導，其外交官且禁止教士入太平境，此其顛倒之甚者矣。

可見西人中贊成太平軍的，大有其人。但是相反的，有些教士又得了些不好印象，如羅孝全因爲和洪秀全相善，特到南京遊覽，看見南京各種設施，大失所望。雖經忠言善道，開導洪楊。可惜他們非常驕矜，不聽羅氏的話。有些教士看見太平天國的宗教儀式，加入許多中國固有的禮節，認爲是離經叛道，而加以反對。且有向本國政府報告，說些壞話，如郝姆士的「南京遊記」裏有說：

洪秀全不是一個詐騙者，也必是一個無智識的狂徒，從他的人，都是些危險分子。他的組織，無異於一羣盜匪，擁戴他做盜匪的頭兒罷了。

這篇遊記，由英駐華公使轉呈英政府。英倫當局得了郝的報告，便把太平天國看做亂黨，派兵幫助清曾攻打太平軍，這是太平軍失敗的一個原因。林利對於郝姆士的著作，深抱不平的說：

太平軍之宗教戰爭，不背上帝之誠，而歐洲教士之至支那者，未能扶助此宗教革命，……如維多利亞主教，如約翰，如密爾，如密納，如洛勃斯克，如倫白等皆未反對者。獨有郝姆士，則更狂詆太平軍，不足以言傳教矣。

爲了郝姆士的話，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如天主教徒對太平天國大都表示不滿，因爲洪秀全的宗教觀，起初是取法天主教，後來又受了基督新教的影響，反對偶像，不獨普通的泥雕木塑要打倒，就是佛道兩教的偶像和天主教的聖母像等，都在毀壞之列。於是天主教士把破壞正教的罪名，報告到羅馬梵諦岡教廷和法政府。因此，法政府也和英政府取同一行動，幫助清曾，攻打太平軍了。

太平軍因着缺乏外交的協助，內部又發生爭奪政權的糾紛，於是這新興的

勢力，也就日趨衰敗，而不可收拾的了。

洪秀全假託天兄下凡，震駭徒衆的幼稚舉動，已給士大夫所非笑，而他的自己所產生的宗教，仍舊是變相的迷信，想要利用宗教做手段，來達到他反清的目的。幹部人物，對於本國文化，既少認識，對於外來文化，也沒有領略。他們的力量，一時或能推倒滿虜政權，而不能搖撼中國社會所固有的道德信仰以及風俗習慣，這又是太平軍失敗的主要原因。舉義時是用愚民政策，軍事上的實際活動，也缺乏有一個預定的全盤計劃。故他們的措施，不只惹起了一輩安居樂業的商民的敵意，且激動了一輩傳統的讀書人的反感。加以每攻下城邑，即焚毀學宮廟宇偶像，更引起封建思想下的民衆憤恨。曾國藩們的起兵，就是利用當時人民的心理，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思想，說太平軍這種舉動，是中國名教的奇變。換一句說，是拿着維持綱常名教的儒道，來推翻外來的宗教的勢力。曾國藩在「討粵匪檄」文裏，便有鮮明的揭布，文云：

逆賊洪秀全、楊秀清，稱亂以來，於今五年矣。……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僞君僞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

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王之用。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而謂貨皆天王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爲之所也？自古生有功德，沒則爲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雖亂臣賊子，窮兇極醜，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粵匪焚郴州之學宮，毀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嗣是所過郡縣，先燬廟宇。卽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皆汚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怒，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不特紓天子宵旰之勤勞，而且慰孔孟人倫之隱痛。不特爲百萬生靈報枉殺之仇，而且爲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橫行中原，赫然奮怒，以衛吾道者，本部堂禮之幕府，待以賓師……



曾國藩這篇文章，強調名教孔孟之道，期以煽動人心。獨其所說洪楊「崇天主之教」，那就簡直沒有認識洪楊所假託之宗教。因爲洪楊所緣飾的，是基督新教，絕不是基督舊教的天主教（公教）。最不通的話，是「自古生有功德，沒則爲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這幾句話，簡直是「新青年」雜誌裏「什麼話」的資料，然而亦可反映那時的士大夫的思想是怎樣糊塗的了。

我們研究歷史，固然絕對不能用「成王敗寇」的眼光去批評洪楊之役，但是無論如何，太平天國的崛起，以及十四年的反清，他的動機與設施，和招致曾國藩們的起兵，無一不和基督教有關係。雖然他們的信仰及施政，多和正宗的基督教理違背，又和舊新二約所載的道理相忤逆，這是人事的問題，並不是基督教本身的問題。故我們研究太平天國，便絕不能撇開他的最大的原動力來看做等閒了。他的原動力是什麼，事實上，就是基督教理。

總理在漢公（丹按：漢公，即劉成禺的筆名。）「太平天國戰史」序，對於洪秀全建國，有深切的識解與評價，可知總理在幼年所受太平朝的感發，序文云：

朱元璋、洪秀全，各起自布衣，提三尺劍，驅逐異胡，卽位於南京。朱明不數年，奄有漢家故土，傳世數百，而皇祀忽衰。洪朝不十餘年，及身而亡。無識者特倡種種謬說，是朱非洪，是蓋以成敗論豪傑也。……漢公是篇，可謂揚皇漢之武功，墨從前穢史一澄清之，俾讀者識太平朝之所以異於朱明，漢家謀恢復者，不可謂無人，洪門子弟，手此一篇，亦足徵高曾矩矱之遺，當世守其志而勿替，予亦有光榮焉。

孫總理這番偉論，義正辭嚴，實可以糾正曾國藩們的謬論。太平天國是上接朱明的反元，下啓國民革命的排滿，意義極爲深重大。總理的革命動機，受了太平天國戰役的影響。吳稚暉演講「總理與中國革命」有說：

總理那時在這私塾內讀書，卻一切也不能解決他的疑難，還是他六七歲的時候，聽到了太平天國的老兵講洪秀全的故事，倒給了他不同的教育。總理的革命思想，就在這種教育下發生的。

吳氏又在「中山先生革命的兩基礎」附「中山先生年系」有說：戊寅，清光緒四年，西一八七四年，十三歲，入其叔所設之私塾，聞談洪

楊故事，潛抱革命大志。

据此，太平天國與國民革命的聯繫，有這樣的密切。太平天國在歷史的地位，總理也重新估定，給人們一個正確的認識。即如所謂「清史稿」的修史者，在曾國藩傳裏，什麼「粵寇破江寧，據爲僞都，分黨北犯」。洪秀全傳則說：「僞號太平天國」，什麼「粵匪」，「賊」，「陷某地」，「僞某王」，「犯我軍」等一片否認民族的話，也間接的糾正。明是非，正人心，確是目前亟需，聯想所及，也順便的一說。

## 二、總理與基督教

舊約聖經的「出埃及記」，詳記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和新約聖經「路加福音」一章五十二三節所說：「他叫有權柄的失位，叫卑賤的升高，叫飢餓的得飽美食，叫富足的空手而回，」這些故事和教訓，使入主中原的滿洲部族統治下的漢族，得了一個極大的教訓，而共同反抗。上章所論太平天國的起義反清，就是最好的例子。我們現在談談總理和基督教的關係。

總理最初和西教士的接觸，是在民元前三十五年，他十二歲，在香山縣翠亨鄉，從美教士克爾習英文。這位克爾教士，可以說是他開始認識西方文化的啓蒙師，同時也可以說他最初和基督教接觸的開端。坊間關於總理史略傳記之類，多是叙說總理的信仰基督教，是在檀香山的時候，其實這是誤傳的。

總理初在夏威夷讀書的學堂，是基督教會所設立的學校，這是他受教會學校教育的起始。不久，升學夏威夷大學，時得牧師的宣教，對於教理潛心研究，致遭受他的哥哥德彰公的責備，總理逼得回華，但他的哥哥不給予旅費。

總理乃求助於他的業師美教士芙蘭諦文，芙牧師慨然贈他美金三百元。這可以證明他年紀雖然不大，已得到西教士的另眼愛護了。而據總理的姊姊西姑太太談，總理「十四歲赴檀香山，讀洋書，習英文。越二年，入耶穌教，以破壞神像，爲壽屏不滿。」（羅香林的國父孫公中山家世試探。）但據吾們所得的正確史料，總理在檀香山時，只是研究教理，還沒有正式加入教會。原來總理的受水禮，是由檀島返國后，在香港皇仁書院讀書時，是胡清光緒九年（公元一八八三年），纔受水禮，正式加入教會。那時施水禮的，是喜嘉理（C. H. H.

ayer) 牧師，教會的名稱，是公理會禮拜堂。同時受水禮的，還有陸皓東。喜牧的施水禮名冊，今還存在。他們倆當日入教的名字，總理是用孫日新，陸皓東是用陸中桂，籍貫均寫「香山翠亨鄉」。（參閱「廣東文物」）由此看來，總理的加入基督教會是在香港，而不是在檀香山的明證了。

馮自由的革命逸史裏「區鳳墀事略」有說：

孫總理之漢文教師區鳳墀，爲廣州有名之基督教宣教師。總理在檀香山基督教學校畢業后，尙未能閱讀華文書報，返香港乃拜區爲師，發奮學習國文。當其在港教會受洗禮時，名籍下尙署孫日新，蓋取大學湯之盤銘，「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義，其后區爲之改號逸仙，而逸仙之名遂漸轟傳於世界……

馮氏的敘述，可以作一個參攷。麥梅生的「基督教在廣東」文裏，還說到總理受水禮以後，「常隨喜牧往香山傳道，招得三人入教，蓋初欲習傳道也」等語，在宗教觀說，傳教是救世的工作，代天宣化。總理初蓄此念，和後來的致力國民革命，實有密切的關聯。

總理奉教的經過，喜嘉理牧師在民國元年特撰一文，發表於美國網紀慎會月刊，（原文是英文，後由馮自由譯爲華文。）這一篇又是直接史料，其中所述，有些在各書裏，還沒有提及，今把他摘錄如下：

一八八三年秋冬之交，余與先生初次謀面，聲音笑貌，宛然一十七八歲之學生，時其方自檀香山歸。檀香山，其兄營業之地也。先生從遊，肄業檀埠者已數年，余職在佈道，與之觀面未久，卽以是否崇信基督相質問。先生答云，「基督之道，余固深信，特尙未列名教會耳。」余詢其故。則曰，「待時耳，在己固無不可也。」嗣後數月，果受禮奉教，余身親其事。其受之地，在香港舊設之華人學堂中，距現有之美以美會教堂，約一箭地，地不著名，儀不繁重，而將來之中華民國臨時第一大總統，於是受聖禮皈依救主焉。

自是以后，先生移居該學堂之二樓，同室者尙有其他華人，與一大美聖書公會之售書者，余則居於三樓，時相往返，甚愛重之。先生之蒞港也，始則肄業於英國聖公會學堂（丹林按：卽是拔萃書院。），後乃轉入皇仁書院

八八四年，余與英人某，偕先生赴香山縣，卽其釣遊地焉。未行之先，余等備福音書若干，擬於途中分售於人，道經澳門，銷售頗多，因暫駐足。先生導余等至一中國旅館，膳宿之費，日僅三四角，食息與共。自澳門復行一二日，乃抵先生家，頗蒙其優待。觀其居室服御，知其爲殷裕之家。資產在中人以上，殆由其兄營業發達之所致也。余於客居數日之中，嘗一晤其夫人，禮意亦甚渥，當時其好客之情況，及今思之，猶歷歷如在目前焉。

先生既束身信道，卽熱心爲基督作證，未幾，其友二人爲所感動，亦虛心奉教。夫居今日宗教自由之世，而言皈依基督，固不足奇，當日情勢，與今迥異，明認基督教者，殊不多覩。蓋明認基督者，人咸恥與爲伍，以故人人咸有戒心。然先生熱心毅力，竟能化導其友人，使不得不出於信仰之途，其魄力之宏，感人之深，可略見其端倪矣。彼僑居海外之七百萬華人，皆表同情於其排滿之主張，非無因也。卽彼同教之信徒，雖受外界之牽掣，不能顯助其運動，然而已心心相印矣。嗚呼，中國能自專制政體，一

變而爲民主政體，非其感動力之偉大，庸有濟乎！

先生熱心宗教，百折不磨，方其奉教之初，其兄聞而嚴責之，謂苟不速與基督教割絕，必不復寄銀資助之。長兄之命，凜凜難違；顧其夷然處之，不以稍奪其志，力傳基督之道，闢偶像之非，娓娓不倦。其兄察得之，莫知所措，乃促之赴檀香山，佯言有業務相託，實則欲其離中國也。既抵檀島，其兄迫脅禁阻之，又不予一錢，使無以爲饘粥資，而其竟不改其初志也。僑居之中華信徒，廉得其情，乃醵資遣之歸國，學習傳道科，蓋被時其傳道之志，固甚堅決也。向使當日香港或附近之地，設有完善之神學院，俾得入院授以相當之課程，更有人出資爲之補助。則孫中山先生者，殆必爲當代著名之宣教師矣。以其熱忱毅力，必能吸引多數人歸服基督；無如事不出此，蹉跎數月，而年齡加長矣。乃擬舍此而學醫，以爲傳道而外，惟行醫最能有功於社會。余徇其請，爲作介紹書於坎爾醫博士，且爲說項減輕其學費，當時學醫之費全年只二十元耳。先生就學約二年餘（丹按：實際只有一年左右），復返香港，時香港醫學堂已設，乃入而肄業



焉。……

……一八九四年，余返香港，先生偕倫敦會長老過訪，見其神采煥發，溫和莊敬，依然曩時態度焉。有倫敦會宗某長老者（丹按：即指區鳳墀），當日指先生顧謂余曰，「子果操何術而使之爲基督徒乎？」蓋先生當時已深爲名流碩士所器重，頗有左右一世之概，此長老之所由作此問也。

倏忽光陰又數年矣，天涯地角，音信闊疎，至一九零四年，始於舊金山重遇之，先生謂余曰，「中國痼疾已深，除推翻帝政外，別無挽救之法。」余解之曰，「君曩者主張之改革，中國現已採行矣。」先生雅不樂聞，第曰，「滿清惡政府，必不可使復存。」同年冬季，余復遇之于紐約華人所設之禮拜堂，形容枯瘁，疇昔英銳之氣已銷，然於基督教道，則復虔心如初。當時余職司募捐，將於香港建堂，承其介紹某君，則今任國務總理唐紹儀之戚畹也。囑余往訪，或能得其攸助云。

今者民國成立，先生竟解大總統之任，而躬行揖讓之事，其高尚誠樸之胸襟，與天下以共見，洵不愧爲忠直之基督徒也。……中華民國自此昭垂永久，

炳耀萬國，皆由其克己恆忍，始終不渝，汲汲爲同胞謀福利，絕不以一身之利害得失而有所欣戚也。向也余固切望其蔚成傳道之健將，以救多數垂斃之靈，今見其效忠上帝，服務祖國，解危機於倒懸，卜景運之日新，循是前進，合四百兆人而受其提攜，余心亦滋慰矣。

廣州的博濟醫院，是基督教公理會伯駕醫士所創立，醫科是由嘉約翰醫生籌設開辦。總理在博濟習醫的機緣，是由嘉醫生所招致。民元，總理解除臨時大總統職務回廣東，廣州各教會聯合舉行歡迎大會，會場即在博濟醫院側旁的長老二支會禮拜堂。當日總理演說，開首即說：「兄弟今日得有機會，站在二十五年前的教堂原址，和師長牧師兄弟姊妹們相見，實在無限欣慰。」（兄弟姊妹，是教會內信徒的互稱。）總理的習醫，是因爲醫學是拯救人類的疾苦，但其遠因，是他在檀島時和順德人在教會任傳譯的杜南山相往來。杜的書櫃上，有許多醫科書籍，故總理在那時已存了學習新醫的念頭，然而這一個因緣，也和基督教有關的。在博濟習醫的第二年，轉學香港西醫書院（俗稱雅麗氏醫院），這所西醫書院，在荷李活道的道濟會堂隔壁，由此，和教會中人往

來，較爲密切。

總理的上書李鴻章，是在一八九四年秋間，這封書的原文，在基督教會廣學會所辦的刊物「萬國公報」，連續登載，傳播國內外。談到這封書的文字，和太平天國也有些小的間接關係，陳少白的「興中會革命史略」有說：

孫先生到了上海……在陶齋家裏。碰到一位太平天國狀元王韜（號紫詮，別號天南邈叟），王韜曾到過香港，助英國牧師瀝博士繙譯四書五經。瀝博士回英國，也請王韜同去，在英國同住了幾年……聲名很盛，筆底下對於世界知識，也很充分。并且他是太平天國有關係的人，所以孫先生在陶齊家裏，一見如故，就把那篇大文章，同王韜商量起來。王韜也重新替他加修政。王韜有個朋友在李鴻章幕下當文案，王韜就寫了一封信，介紹孫先生到天津見李鴻章幕下的老夫子。

根據了這一段的記載，知道總理的上李鴻章書的經過，也和基督教與太平天國的人物有過一段因緣。但據事實所查考，王韜不是太平天國的狀元，只是和洪楊有點關係，陳氏說王韜是太平朝的狀元，恐怕是根據當日社會一般的

傳說而申述的罷了。

總理的倫敦被難，是在胡清光緒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九六年）的秋間，即那年的陰曆八月，總理由美到英，給清駐英使館誘禁準備僱船祕押運回國。幸得設法通知在港習醫時的教師英人康德黎夫婦，輾轉運動，纔得脫危。這件事的經過，和基督教理極有關係。當總理在使館裏對老年英僕柯爾所說的一番話，是站在基督徒的地位來感動柯爾的。總理所寫的「倫敦被難記」，對於此事的所載云：

柯爾於國事犯之名稱，若未能領會，予乃叩以生平於阿美尼亞人之歷史，亦嘗有所聞否？柯爾領之，予遂迎機以導，告以中國皇帝之欲殺予，猶土耳其蘇丹之欲殺阿美尼亞人。土耳其蘇丹之所疾視者，爲阿美尼亞人基督教徒，故欲聚而殲之。中國皇帝之所疾視者，爲中國基督教徒，故欲捕斬之，予即中國基督教徒之一，且嘗盡力以謀政治之改革者也。凡英國之人民，無不表同情於阿美尼亞人者，故予之身世及予目前之情況，苟爲英國所諗知，則其表同情於予，亦不言而可決也。

……君試思救人於死，與致人於死，其善惡之相去若何？又試思吾人盡職於上帝，爲重要乎？抑盡職於僱主，爲重要乎？更思保全正直之英政府，爲重要乎？抑袒助腐敗之中國政府，爲重要乎？君其三思余言。

總理這一段引證確切而極至誠懇摯的話，柯爾聽了，大受感動，馬上答應贈遞書信。在柯爾去后，總理記述當晚的心境有說：

以是而余知禱告之誠，果達於天也。以是余知上帝固默加呵護者也。余自逮后，衣未嘗解帶，夜未嘗安眠，至此，始酣然一睡，及旦而醒。

果然，康德黎得着柯爾所傳遞的消息，立刻多方設法，又在報紙上發表，促使英當局的注意，英當局於是照會清公使龔照璦釋放總理。

當總理在被拘禁的十二天中，他每天的生活是怎樣的呢？我們從他在使館釋出后，寄信給香港的區鳳墀長老，明白地說出是在信仰宗教的感召。這一封信，最可以證明他當時對於基督教的思想了。原信如下：

啓者：弟被誘擒於倫頓，牢於清使館，十有餘日，擬將弟綑綁，乘夜下船，私運出境。船已賃備，惟候機宜。初，六七日內，無人知覺。弟身在牢中，

自分必死，無再生之望。窮則呼天，痛癢則呼父母，人之情也。弟此時惟有痛心懺悔，懇切祈禱而已。一連六七日，日夜不絕祈禱，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無憂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禱有應，蒙神施恩矣。然究在牢中，生死關頭，盡在能傳消息於外與否耳！但日夜三四人看守，窗戶俱閉，嚴密異常，惟有洋役二人，日入房中一二次，傳遞食物各件。然前已託之傳書，已爲所賣，將書交與衙內之人，密事俱俾知之，防範更爲加密。而可爲我傳消息者，終必賴其人，今既蒙上帝施恩，接我祈禱，使我安慰，當必能感動其人，使肯爲我人傳書。次早，他入房中，適防守偶疎，得乘閒與他關說，果得允肯。然此時筆墨紙料，俱被搜去，幸前時將名帖寫定數言，未曾搜出，即交傳出外，與簡地利（按：卽康德黎）萬臣兩師。他等一聞此事，着力異常，即報捕房，卽稟外部。而初時尚無人信，捕房以此二人爲癲狂者，使館全推并無此事。他等初一二日，自出暗差，自出防守，恐溜夜運往別處。初報館亦不甚信，迨后被二人力證其事之不誣。報館始爲傳揚，而全國震動，歐洲震動，天下各國亦然，想香

港當時亦必傳揚其事，倫頓幾乎鼓噪，有街坊欲號召人拆平清使衙門者，沙侯行文，着即釋放，不然則將使臣人等逐出英境。使館始懼而放我。此十餘日間，使館與北京電報，來往不絕，我數十斤肉，任彼千方百計而謀耳。幸天心有意，人謀不臧，雖清虜陰謀，終無我何，適足以揚其無道殘暴而已。虜朝之名，從茲盡喪矣。弟現擬暫住數月，以交此地賢豪。弟遭此大故，如蕩子還家，亡羊復獲，此皆天父大恩。敬望先生進之以道，常賜教言，俾從神道而入治道，則弟幸甚，蒼生幸甚。

這封信不只是充分表露 總理的篤信宗教，而且把倫敦被難的經過，詳細敘述，實在是革命史中重要的文獻。原書沒有上下款，又缺乏年日，想是恐怕被檢而受牽連，故如此審慎的。現在原信爲麥梅生所珍藏。至信裏所說「蕩子還家，亡羊復獲」，都是耶穌在生傳道時候所用的譬喻。於此，也可以見到總理熟識聖經，引證比喻了。

賈立言的「基督教史綱」裏，述到「推翻清室建立民國的種族革命」有說：

孫逸仙某次曾說：『我們最大的希望，是將聖經和教育，從歐洲輸運給我們不幸的同胞，由此令他們得到公平的律法的福祉，并且從這高潔的文字中，得以革除他們的苦痛。』……

這是引用 總理對於聖經所給予中國政治革新的希望。總理於民國前十六年，答翟爾斯教授的信，自承是信奉基督教有說：

文早歲志窺遠大，性慕新奇，故所學多博雜不純，於中學，則獨好三代兩漢之文，於西學，則雅信達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流覽。至於教，則崇耶穌，於人，則仰中華之湯武，暨美國華盛頓。

總理於民國元年，在天主教堂的歡迎會演說詞，說明民國建設，也受了基督教理的影響，如云：

今日得與貴教及各教士學生等相見，異常感謝。吾人排萬難，冒萬死，而行革命，今日幸得光復祖國，推其遠因，皆由有外國之觀感，漸染歐美文明，輸入世界新理，以至風氣日開，民智日闢，遂以推倒惡劣異族之政府，蓋無不由此觀感來也。而此觀感，得力於教會西教士傳教者多。……



這樣子說：

總理在民元的三月三日，於南京總統府，寄給康德黎夫人的信，有一段是我感謝你爲着我的行動，貢獻的誠篤禱告，我歡喜告訴你，我們正謀中國的宗教信仰自由，并且我敢卜基督教在這新國度裏，日榮月盛。

包世傑在「請保護教會促進自立是文」裏，引述總理自認爲基督徒和對這時反宗教運動的意見：

予孰非基督徒者？予之家庭且爲基督徒之家庭。予妻子予子女予壻，孰非基督徒乎？予深信予之革命精神，得力於基督徒者實多。徒以我從事革命之秋，教會懼其波及，宣言去予，是教會棄予，非予棄教會也。故不當在教會，但非教義不足貴也。教會在現制度下，誠有不免麻醉青年及被帝國主義者利用之可能，然如何起而改良教會，謀獨立自主脫去，各帝國主義之羈絆，此教友人人應負之天責，亦爲一般從事宗教運動者應急起爲之者也，予奔走政治，不能爲直接此項運動之參加，然予亦反對現在反基督之理論。這一段文字，是包世傑所筆述在眞道周刊發表的。

以上所引述的，多是總理對於基督教的關係，或理論，或事實，都可以見到他的宗教信仰和關係。現在再談他的師友對於他生平所受宗教的影響。林百克的「孫逸仙傳記」裏「中山與耶教」有說：

「中山自火奴魯魯到中國的時候，帶來的書中，有一本耶穌聖經。他當耶教是教育文化的法規，他把中國文化同耶教國文化比較，看出中國沒有一種進步的宗教的害處。他看見耶教是與近代文化一同往前進的，而孔教佛教道教，都保持中國於二千餘年的狀態。……中山並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夢想家，他是最激烈的實行家，他的哲理，是腳踏實地的，並不是投機的。因為他親見耶教有實在的成功，他纔信服。他看見耶教訓練個人，增加他的力量，減少他的弱點。」

……但是在火奴魯魯，他知道有很好的教士，宣傳耶教精神，他承受他們的教授有各種事情，證明耶教都是活的真理，可以實行的。中山以為各種原理，都要有一個基礎。中國人要用什麼基礎建築一個新的文化，使世界上都尊敬這個民族？這個基礎，是不是就是宗教的基礎？

林百克敘述 總理在翠亨鄉打破北帝廟偶像之后，有說：

因爲他們不懂耶穌生死的道理，要使中國人知道耶穌犧牲的道理，不是三言兩語所能盡的。第一，必須使民衆的經濟情形提高，教育的地位也可增高，他們也可以知道耶穌救世的道理了呀。但是改變中國經濟情形的意思，就是經濟的力量，就是武器，就是不息地同壓制中國的暴力奮鬥到底。但是奮鬥，不是耶穌的教訓——因爲耶穌是愛與和平的救主。

林百克這個結論，是說明了 總理雖然受到基督教理的影響，但是實際的澈底改造中國，不是只從宣傳教理，便可以達到，必須改換方式。換一句說，就是要另創一種主義，合乎國情逼切的需要，纔是對症的特效藥劑。這個結論，是很對的，就是 總理後來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完成。

康德黎在「孫逸仙辦新中國」對於 總理，另有他的認識。他的觀點，也站在宗教觀的，如云：

國內雖然已經人心搖動，但想從有財有勢有聲望的家族中，或八股先生中，挑選出擔負改革大任的領袖，本來似乎辦不到。所以上蒼乃從卑微之

家，甄拔一位男兒，賦以非金錢所能購，或東西學問所能產出的才能。什麼才能呢？根據基督教義可以數字包括之，就是信，愛，望，一種堅定不移的信仰，信其所自信。中國從速改造的希望施及鄰人的慈愛。愛之一字真義，就是孫的外觀的性格。刻毒的思想，刻毒的言語，并非他的天性所能容。對環境他的敏銳的照顧，在他的之謂上帝，是非常顯著大公無我的精神，在現世人中，殊未多覯，是登山寶訓的一幅活表現，這都是這個非常人的才能之一部分，達到成功，吸收朋友們「攜帶金鋼箍」接近。不但中國如是，即好幾位認識孫逸仙的美國朋友，也有願貢獻他的精神、時間、生命，促成他的目的，不單只爲着他的素志，而且爲着他的本人。

綜合以上的研究，更可以深知道總理致力革命四十年，直接間接，所受基督教理的影響，至深且鉅。他的拯救中華民族，脫離異族的專制政府，建立民主的中華民國，使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恢復了獨立與自由，目的在使中國之自由平等。這種空前的偉大業績，比之猶太民衆英雄摩西的率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更加來得崇高偉大。我們探源溯本，知道這是和宗教信仰有密切關係。

總理本人，固然是基督教的一個活的信仰者，即他的原配盧慕貞夫人，和宋慶齡夫人及姊妹兄弟們，與其哲嗣媳婦們，無一不是基督教徒。總理在民十四逝世入殮的時候，是舉行基督教的儀式。他的結髮夫人盧氏後來答復香山商會的一封信，述說總理平生的末一段，有這樣的幾句：

……科父返天國，得聞離世前一日，自證『我本基督教徒，與魔鬼奮鬥四十餘年，爾等亦要如是奮鬥，更當信上帝』。此乃科兒手書所言，十分多謝天父，允氏所求，復賜科父信上帝之心，此乃氏至安慰者。（見王治心的中國基督教史綱）

旅英的華僑舉行總理追悼會時，當時康德黎還是健在，到會參加，演詞中有說：

孫先生革命的抱負，及由此抱負所產生的辛心苦行，百折不磨，大有耶穌救世的精神。

總理與基督教的關係，在本證與旁證，都說得很清楚的了。最後再把張之江的「證道一助」所說：「革命黨不是唯物的，所以我黨的黨綱，有絕對保障

信仰自由的條文。建國方略內，有心理的建設，三民主義中，有從事攻心的話，有注重問題的話，并有要恢復民族地位，須先把固有的道德，恢復起來的話（見民族主義）。況且先總理是個基督徒。在廣州曾對徐季龍君說他是個基督徒。既在北平臨終，對於某某等，亦未嘗否認，故身后用基督教儀禮。他的宗教信仰，至死不變的。……可見基督教義，不但和革命沒有絲毫的反對，簡直可以說是革命的原動力了」。這些話說的很合事實。

### 三、基督徒的贊助革命

基督教改正宗的教徒，因為教義的薰陶，與西教士的掩護，對於民主政治的認識，及從事排斥異族的滿清專制政府，較之其他來得深切，宣傳活動，也比之他人便利。故基督教徒的從事革命，與西教士的贊助革命的史事，在革命史中，也佔重要的位置。

總理在廣州習醫的時候，第一個反滿（當時還沒有用革命二字。陳少白曾對我說，那時是用「造反」或「反清」等名稱。及到乙未，第一次革命失敗

之后，到神戶時，纔用革命二字。）同志，是鄭士良，鄭氏是基督教徒，馮自由「革命逸史」的鄭士良事略有說：

初，負笈於油欄門，德國教會所設禮賢學校，遂皈依基督教。畢業后，入博濟醫院習醫，與孫總理、楊襄甫、廖德山等同硯。

「四大寇」中的陳少白，也是基督徒。

乙未，廣州重陽之役，即革命黨人第一次的起義，和基督教會的人們，極有關係。當時雙門底（後改永漢路，即今之漢民路），有聖教書樓，是教徒左斗山所籌設，王質甫爲司理。馮自由的「聖教書樓」有說：

總理初在廣州業醫，以同教之關係，假該樓爲診察所。（在同書中，關於戊戌前孫康二派之關係，亦有說，……「改名萬木草堂，與雙門底聖教書樓，相距甚邇，時孫總理初假聖教書樓懸壺行醫」，……）左篤信新學，……凡屬上海廣學會出版之西籍譯本……皆盡量寄售，實爲廣州惟一之新學書店。店內后進，爲基督教禮拜堂，每星期講道，由王質甫兼任之。左又於衛邊街租一大廈，名曰「大光觀書樓」，陳列古今中外圖書及

新舊約聖經，供人觀覽，延蘇復初主其事。左王皆先後爲興中會員。乙未，廣州重陽之役，楊衢雲在香港以長短鎗六百桿，偽裝膠泥，寄聖教書樓王質甫名收，爲海關破獲。左斗山因是被捕，得美領事保釋。先是粵督譚鍾麟因聞黨人多屬教徒，密令王道台存善會同西牧師香秉文到輪船碼頭截拿。王質甫得香牧師密通消息，步行赴韶關入江西走脫……

馮云香秉文，即北美長老會的香忒文牧師，其子香雅各，在廣東生長，三十年來，在廣州先後任培英中學教員，協和神學院教授，嶺南大學顧問等職，認識中國風俗習慣極深，和中國人感情素孚。思想新穎，對中國政治文化的改革，勸助很大。

乙未之役的黨人名冊和宣傳文字，都藏在聖教書樓後方的禮拜堂裏，及至事敗，即由左斗山投入井裏，逃避官廳的搜索，免給清吏得着「按圖索驥」的指名逮捕。

庚子（光緒廿六年，公元一八九零年）九月，史堅如在廣州謀炸兩廣總督德壽之役，參加的，有蘇焯南、吳義如、練達成、宋少東、毛文明等，均屬基



督徒。史氏曾在洛致書院（嶺南大學的前身）讀書，和西教士往來至密。他所用的炸藥，是存在五仙門的福音堂，重量有貳百磅。給史氏租屋做擔保的，是宣教士劉錦洲。事發史氏被捕，美教士尹士嘉牧師還到督署去營救，怎知到的稍遲，史氏已供認事實了。

上海的廣學會，是基督教編譯出版科學、政治、歷史、倫理、宗教的圖書刊物最大的團體。灌輸新知識極大。康有為梁啟超們的新知識，除了從上海製造局的譯本之外，就是廣學會的圖書了。廣學會的主事人李提摩太、林樂知、花之安、瑞思義、丁韞良、潘慎文、莫安仁、高葆真、梅滕更、慕維廉們的著作，在胡清光緒年間紹介西洋文化入中國。匡時拯俗，改革新政，無疑的他是。一枝先遣隊，也可以說是別動隊。只就甲午（光緒二十年）中日戰爭的一年，該會的「泰西新史攬要」出版，上海招商局的職員，合購了一百部，分贈他們的戚友，把西方的文化，灌注到內地去。其他如：萬國變法興衰記，大同學，救華危言，廣學興國策，保華全書，醒華博議，興華新義，足民策，富民策，富國真理等書，對於腐敗黑暗的滿清政治，是一面的照妖鏡，激動士大夫改革

政治的思想很大。「武昌革命真史」作者曹亞伯在自叙裏，曾說：

旋張（長善）示予一書，名曰，「格致探源」，乃上海廣學會所譯。予生長於極閉塞之興國州崇山中，見此新書，極其快意，欲借一讀，張故靳而不與。予強借，頓悟守舊之非，即入大冶縣福音堂爲信徒。於是家庭革命，社會革命之思想，日往復於胸中，不顧自身之一切，時與舊習慣相抗矣。

兩湖的日知會，他的創立和地址，全在基督教堂裏，主事的又是教會的牧師。曹亞伯在「武昌革命真史」敘述日知會之運動，關於湖南方面的有說：

長沙吉祥巷，聖公會，鑒於庚子之役，由於民智之蔽塞，乃創設日知會，收藏書報，僅供會衆流覽而已，初無與政聞也。歲癸卯，適黃牧師吉亭董其事，愚以國事日非，應亟謀政治之改革。商之黃牧師，擴充日知會，無論何教人，皆可來會縱覽。凡來觀者，必有人與接談，即痛陳內治之腐敗，外侮之由來，於是樂爲會員熱心贊助者不乏其人。大抵不計成敗，惟求日知會之發展足以促進之革新耳。

武昌方面則說：

聖公會之日知會，實係革命機關，表面則講道閱書報，因附設於聖公會也。故推胡蘭亭任會長，劉敬安副之。幹部有評議員，選舉馮特民、陸費達、李亞東、濮以正等任之。開幕之日，吳祿貞捐月薪五十元，以作開辦之費。……藍天蔚亦暗助不少。結合軍學兩界之重要會員，分途運動。……援引青年，廣結同志，宣傳陳天華所著之革命小冊子，「如猛回頭」，「警世鐘」諸書。漸次軍學兩界之有心革命者，均歸納於高家巷日知會，會務發達，一日千里。

總理的自傳，關於日知會，亦有敘述，如云：

而武昌則有劉家運接洽，約同同志之軍人在教會之日知會開會，到會者甚衆，聞新軍鎮統亦改裝潛入。

照此，日知會是兩湖革命黨的樞紐了。後來萍醴之役，劉家運給清吏馮啓鈞拿捕，美教士孟良佐會長（牧師）奔走營救，對於革命黨人，深表同情。漢口的聖保羅堂王理堂會長，循道會教士李親仁、吳德施主教等，都是熱忱贊助。

革命黨，逢着黨人的活動，掩護勸勸，不遺餘力。

兩湖的中西教士，贊助革命黨人，已如上述，同時也和上海的教士聯成一氣。上海聖彼得堂吳國光會長，於光緒廿八年春間，用紅牋大名柬紹介黃克強回湘和黃吉亭相見，名柬上所寫，是：

瑞祥仁兄：敝友黃興，號競武，係湖南省長沙府善化縣籍，數次到聖彼得堂守道，將要記名。此刻回府，望閣下收入登冊記名，爲妙。

從這幾句話，是有兩種看法，一是照字面說，黃克強是曾經研究基督教理，已有心得，將要記名奉教，特請黃吉亭註冊，算是預備教友。這是一層。還有一層，是運動革命，借託研究宗教來掩飾外間的視聽。但是無論怎樣，都可以證明教徒與革命的關係。到了光緒三十年甲辰（公元一九零四年）九月，黃克強、劉揆一、秦毓鎰們，聯絡哥老會大龍頭馬福益，在湖南起義。哥老會黨徒入會的有十萬人左右，決定十月十日，在胡清西太后七十壽辰，分頭在長沙、岳州、衡陽、寶慶、常德五處發難。怎知華興會有黨員朱某，言語不慎，誤洩其事於王先謙。王向巡撫陸元鼎告密，機密洩漏，黨人被捕的很多。這天

是九月十八日，黃克強秦毓鎰恰赴明德學堂胡元倓的宴會，賓主正把酒暢談之際，忽得報告，未終席即散。黃克強立刻逃匿在吉祥巷的聖公會內，寄寓相當時期，纔由黃吉亭曹亞伯張繼等設法掩護，得着安全脫險。第二年，同盟會在東京成立，特派駐日湖北分會會長余誠回國，會同劉家運在湖北活動，凡是日知會會員一律加盟入同盟會。對外還是用日知會名義。星期日，必借教會學校的文華書院，演說世界革命史事，兼及中國革命，聽衆比較的是軍學兩界佔多數，很受感動。丙午（一九零六年），總理因法國有意贊助中國革命，特派喬義生陪同法國武官歐極周漫遊長江各口岸，調查革命黨的實力。在鄂黨人借聖公會開會歡迎，演說革命，空氣緊張。給清吏張之洞張彪們偵得，於十一月十一日派兵圍聖公會，捕去劉家運、朱子龍、胡瑛、李亞東、殷子衡、吳貢三、季雨霖們多人，檢出名冊四大本，多屬軍學兩界分子，余誠、馮特民等倖得逃脫。從此日知會和同盟會鄂分會，工作停頓。劉家運朱子龍且病死獄中。胡瑛、季雨霖、李亞東、梁鍾漢等，被監數年，直到辛亥年秋間，武昌起義後，纔得恢復自由（參看馮自由的革命逸史「辛亥革命起義之革命團體」）。這

些都是教會人士和革命黨絡聯一致的實證。

日知會陳設陳天華的「警世鐘」，這一本書，內有勸教民「當以愛國爲主，教與國不同，教可以自由奉教，國是斷斷不能容別人侵奪的。歐洲各國，一國之中數教，毫不禁制，無論何教的人，都愛自己生長的國家」。這些話，可以反映當時一般人對於外來宗教的看法，陳天華是有所感觸而說的。

日知會在兩湖的革命運動中，主幹的人物，除了教會牧師胡蘭亭黃吉亭之外，在湖北方面，有：曹亞伯、劉家運、馮特民、張純一、吳貢三、陸費逵、朱子龍、李亞東、殷子衡、余日章、梁鍾漢等。湖南方面，有：黃克強、劉揆一、禹之謨、易本義、胡瑛、宋教仁、陳天華等，他們對於革命運動，盡過很大的功績。

章炳麟，因列名上海張園的國會，給清吏懸賞通緝，即託庇於基督教會設立的蘇州東吳大學。至旅居南洋歐美各地，屬基督徒的華僑，而努力革命工作的，那就車載斗量，不勝枚舉了。

廣東方面的教會人士，贊助革命的，比較別省的來得熱烈，除了乙未之役

所列舉的幾位之外，還有王煜初牧師，他是王寵惠的父親，乙未舉義失敗之夜，總理還是從容不迫赴王煜初家的宴會。其餘教會的革命同志，如黃旭昇、鍾榮光、張華生、謝己原、梁慕光、梁慕義、李植生、宋居仁、鄧蔭南、楊襄甫、羅伯許、徐甘棠、廖雲翔、黃文卿、李杞堂、林信賢、洪全福、宋玉臣、黃福、蕭勵初、朱德華、崔通約、和天主教徒胡心澄、胡心泉等。上海的同志宋躍如（宋子文的父親）也是監理會的宣教士，他們都是民國開國前的革命先鋒。

黨人借教堂或教會學校做革命機關的，在長沙武昌兩處的聖公會，武昌的文華書院，上海的聖彼得堂，廣州呢？有雙門底的長老會福音堂，四牌樓的長老會禮拜堂，下芳村的巴陵會福音堂，雙門底的聖教書樓，花地的培英書院，芳村的格致書院，仁濟大街的博濟醫院，順德縣城大良花基的長老會禮拜堂，和廣州油欄門的鴻興客棧（是天主教徒胡心泉所開設的）等，是彰明較著的黨人活動交通的處所，至其他祕密的機關，那就沒有一定的了。

民國成立以後，基督徒努力革命工作的，更加多了，我們從張之江的「證

道一助」所說「是年袁世凱稱帝，馮公（玉祥）連合蔡鐸，共同討袁，我奉命代表到成都，接洽革命倒袁的事。我見成都教會中的朋友，從事革命運動，都很熱烈。他們對於袁氏背叛民國，都是憤不可遏，比一般誠懇的多。」可見一斑。

在民國六年至十三年的幾年間，徐謙的提倡「基督教救國」的運動，他們的工作，非常努力和普遍，造成一種很偉大澎湃的思潮。姑無他的成果怎樣，但是這種運動，給予教會和有些漠視政治的教徒，是強心血針，奮興他們的思想，振導他們愛國家愛民族的觀念。這一點，是值得注視的。

#### 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對基督教

辛丑條約訂立以後，教會雖然得着安然無事，並且日見發展。然而他在胡清時代，還不能充量地在社會中取得相當的地位。因為清代曾有一百多年禁止傳教的，那時擁護孔孟的人，都斷然地排斥基督教是異端，士大夫也以奉教是可恥。到了民國成立，革命黨人，既多有基督徒，信教自由，又載在約法，所



以信教的人們，都不再自隱諱，而顯然表白於衆，教會和教會所屬的團體學校等，他們的業務與教育，也循序革新，適應社會的需要。可是在一帆風順邁進之中，却逢着罡風駭浪。結果，他們還是平安的渡過。這個波浪，就是反基督教運動和非基督教學生同盟了。

五四運動發動后，新思潮勃發，瀾漫全國，震撼青年們的腦筋。反宗教運動，也有發生了。少年中國學會通過了「有宗教信仰者不得入會」的議決案。新青年雜誌和其他報紙雜誌也登載討論宗教及基督教文字，盛極一時。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基督教與中國人」，議論比較公允，態度也最爲誠懇，他所認識的基督教，是：

我們今后對於基督教問題，不但要有覺悟，使他不再發生紛擾問題。而且要有甚深的覺悟，要把耶穌崇高的偉大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培養在我們的血裏，將我們從墮落在冷酷黑暗污濁坑中救起。

民十一的四月，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第十一次大會，在中國開會，會場是借北京清華大學的禮堂，參加的有三十二國，代表七百六十四人。他的徽章，

是「天下一家」。這一個空前的會集，引起了學生界的注目。在上海成立了「非基督教學生同盟會」，發出宣言和通電。北京一部分學生也組織了「非宗教大同盟」。因之反基督教的聲浪，更加澎脹。在上海又成立了「非基督教同盟」，各城市各學校多成立支部，定每年十二月二十二至二十七日，爲反基督教周，編印反對基督教運動小冊子，遊行示威運動，散發傳單，分隊演講，其甚的且到教堂擾亂秩序等舉動，一時全國教會，大受影響。直到民國十六年，國府在南京成立，政治上了軌道，纔告停止。

在這個反基督運動中有錢玄同等五人，站在學術界的方面，發表一篇宣言：我們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們不擁護任何宗教，也不贊成挑戰的反對任何宗教。我們認爲人們的信仰應該有絕對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載在約法。智識階級的人，應首先遵守，至少也不應首先破壞。我們因此對於現在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的運動，表示反對，特此宣言。錢玄同、沈兼士、沈士遠、馬裕藻、周作人。三月三十一日。

這是根據信教自由而反對非教同盟，意思就是說，強迫他人信某種宗教是違反信教自由，強迫他人不信某種宗教也是違反信教自由，非基督教同盟就是犯了後者的毛病。這的確給予非教的學生們一盤冷水。梁啟超於四月十六日，在「哲學社」公開演講，題目是「評非宗教同盟」。他替宗教下了一個定義，說一切信仰，都是宗教，證明非宗教不可能。他的結論：

信仰是神聖，信仰在一個人爲一個人的元氣，在一個社會爲一個社會的元氣。中國人現在最大的病根，就是沒有信仰；因爲沒有信仰，——或者假借信仰來做手段，所以復辟派首領打復辟派的首領，洪憲派首領和革命派首領可以聚攏在一齊幹事；所以和尚廟裏頭會供關帝供財神，呂祖濟公乩壇，日日有釋迦牟尼耶穌基督來降乩說法。像這樣的國民，說可以在世界上站得住，我實在不能不懷疑。我說：現在想給我們國民一種防腐劑，最要緊是確立信仰。信仰怎麼樣纔能確立呢？我再覆述前頭一句話：「只有情感能變易情感，理性絕對的不能變易情感。」

國人們的通病，梁氏這一番話，可說是一鍼見血。陳獨秀在非基督教同盟

出版之「我們爲什麼反對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裏「基督教與基督教會」，批評教義的缺點，而對於教會，教義分析明白，如說：

我們批評基督教，應該分基督教（即基督教義）與基督教會兩面觀察。

……在現在人智發達的社會裏，一切古代人智蒙昧社會所遺傳的宗教教義底缺點，自然都暴露出來了。所以，我們不必對於基督教義的缺點特別攻擊。至於基督教會自古及今所作的罪惡，真是堆積如山，說起來，令人不得不悲憤而且戰慄。……我始終總覺得基督教與基督教會，當分別觀察……」

錢玄同、梁啟超、陳獨秀們對於基督教理教會的觀點，還算公正，沒有什麼偏頗。惟在這個反宗教運動中，朱執信也發表了一篇「耶穌是什麼東西」，他是根據海凱爾「宇宙之謎」（馬君武譯）而批評耶穌的降生。又據幸得秋水的「基督抹殺論」說宗教教祖，大都有十二大弟子，十字架是生殖器的崇拜。且又本着倭鐸的哲學，說新理想主義者，要利用他來做手段，第二、是託爾斯太的虛無主義。他的結論，耶穌是口是心非，偏狹利己，善怒好復讎的一個偶像。朱

氏這些話，對與不對，我想凡是研究過基督教理的人，都能明白，用不着多說。最滑稽的，莫如汪兆銘那時身任廣東教育會長，發表文字反對基督教，給廣州市一個賣魚小販的基督徒和他筆戰了十多天。後來汪發覺了對方執筆者的地位，竟然懊悔自己的好事。然而已追悔莫及了。

這種非教風潮，從民十一起，一連幾年，都有騷動，在福建、浙江、湖南、江蘇、江西、湖北等地，常有捕捉宣教士，反縛戴紙帽，遊街示衆，諸多侮辱。教堂與教會學校也有被逼停辦，福州的協和大學，格致中學，且被反教分子放火燒去一部分。但這些騷擾，每經過一年，勢綏比較上年稍殺。在反教運動瀾漫各地，雙方文字互相駁斥，絮絮不休。民十四的冬天，孫科發表了一篇談話，其中有說：

這回非基風潮，恐有國民黨員從中主動，也未可知。但非教運動，斷不是國民黨的主張……政教分離，那件事，我們早已認爲民國建國大綱；宗教自由，載在約法，任何宗教，在法律下應受平等的保護。至若謂有等國民黨員，以個人名義來反對基督教，無異有等基督徒以個人名義來做賊，這

些都屬個人行動，與全體無關。很希望多些基督徒入國民黨，負一分責任。（見中國基督教史綱）

孫氏是 總理の公子，總理一家都是基督徒，臨終的時候，曾把夫人託付於同志說，「她是個基督徒，也是個同志，你們不要因她是基督徒，就歧視她。」（徐謙弔唁總理的話）合攏看來，都是非常公允的衷心的話。教會經過了這一次的颱風，的確有了急劇的轉變，一是，提倡而且實行「本色教會」，在可能範圍之內，多與西教會脫離。二是，教會學校歸華人主持，向主管機關申請立案。三是，覺悟要脫離傳教條約的保護。所以這次風潮，對於在華的基督教會，不特沒有什麼害處，反之，却使他們得了更大的收穫。最低限度可以促使中國基督徒覺悟到自身的信仰是否真確誠篤與責任，變更了西教士在中國教會的特權與地位。

## 五、結論

宗教與革命：爲什麼發生如此密切的聯繫或反響呢？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

問題。梁啟超所說「宗教是各人信仰的對象」，也曾分析爲下列的三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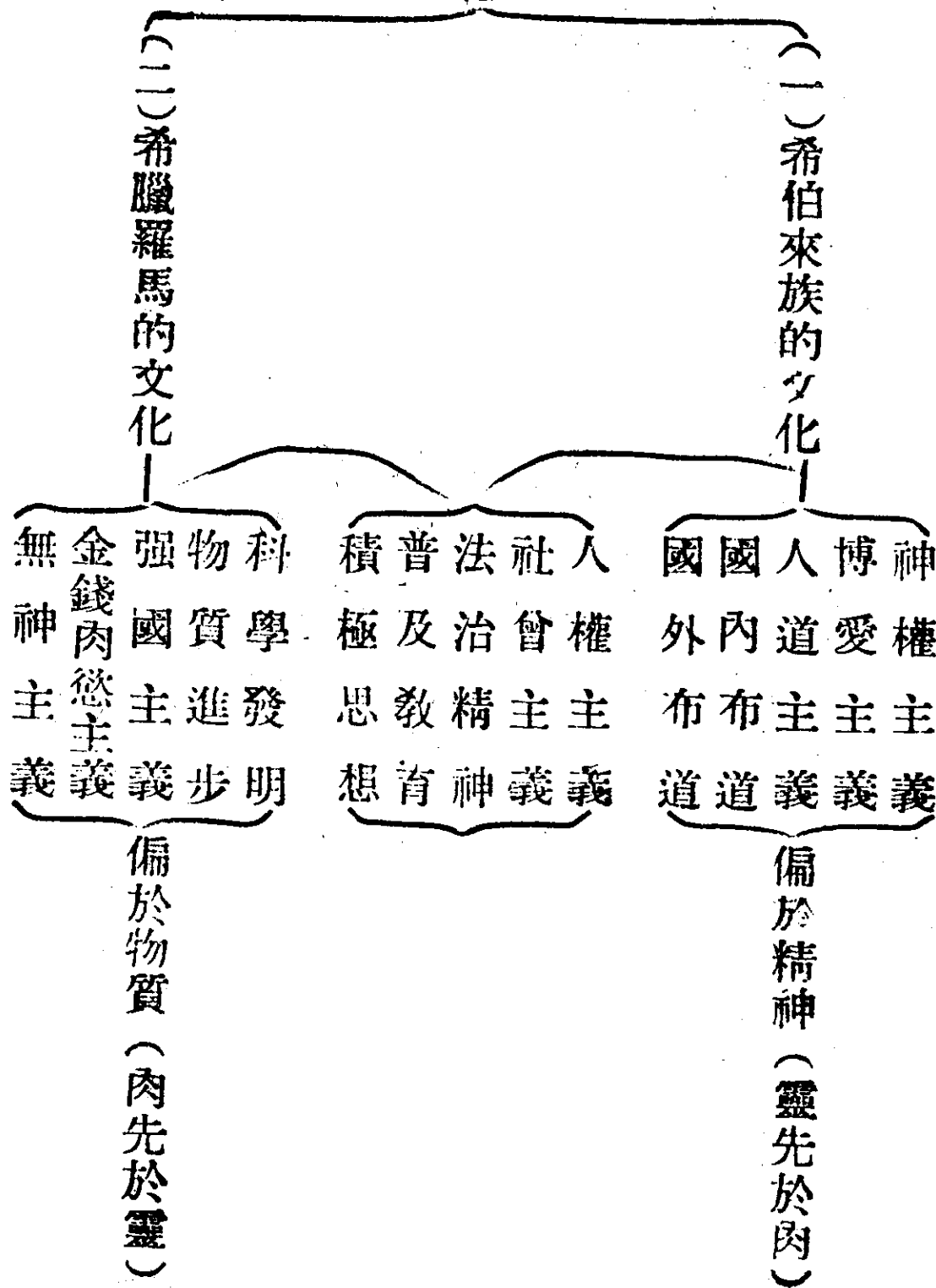
一、對象 對象有種種色色，或人或非人，或超人，或主義，或事情，只要爲某人信仰所寄，便是依人的信仰對象。

二、信仰 信仰有兩種特徵：第一、信仰是情感的產物，不是理性的產物。第二、信仰是目的，不是手段；只有爲信仰犧牲別的，斷不肯爲別的犧牲信仰。

三、各個人 信仰是一個一個人不同的，雖夫婦父子之間，也不能相喻。因爲不能相喻，所以不能相強。

這樣解釋，宗教的範圍，大略可見了。我們想知道革命黨人受基督教理影響的原因，就要研究西方的文化和中國人的通病，互相對照，便可以尋出他的根源來了。根據照流居士「耶穌眼裏的中華民族」所說，有如下列的兩表：

西方的文化





# 我們的國病

## (一) 人性病

自恃自滿 (欠禮)  
 自欺欺人 (欠義)  
 自私自利 (欠廉)  
 自暴自棄 (欠恥)

罪惡 中國和世界的心之軟弱

## (二) 民族病

守舊性重 (孔學及祭先的影響)  
 消極性深 (釋教的影響)  
 迷信心盛 (道教的影響)  
 愛國心淡 (祠堂和會館的影響)

錯誤

中國本身的  
身之軟弱

## (三) 時代病

亂 (舊紀綱破壞而新紀綱未成)  
 愚 (教育不普及)  
 貧 (科學不興物質不進)  
 弱 (健康缺乏自衛力微)

中國現有的特別性

兩相比較，可見我們民族不振的癥結，王治心在民國十五年發表「孫文主義與耶穌主義」，把民族民權民生的含義與耶穌所主張自由平等博愛，互相參證，列表於下：



西方宗教的傳入，他的反應力，接受力，融和力怎樣，也可知了。最後的話，還是「中國之命運」裏所說的透闢：

基督教教會，因為他有平等條約的憑藉，享有特殊的權利，而且不注意中國國民的民族精神，所以一部分人士視外國人傳教為文化侵略，致其疑慮，甚至加以仇視和反對。這是基督教會，受平等條約的所影響，以致教義受了莫大的損失。所以我嘗說，平等條約對於基督教會，只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就是這個道理。

工，已轉入新的階段，和以前是截然兩樣。然而革命黨和基督教在歷史上的關係，是光明的偉大的。希望自今而後，還是密切的聯繫下去。

丹林附言：本文所說的革命黨，是從太平天國反清，而至新文化運動的時期止。基督教，則包含教理，教會，中西教士和教徒而說。引用史料，多已寫明來源，以便參證。至文中所用人名，或稱銜，或稱名，或稱號，那就行文的便利而已。

## 評介「革命逸史」

馮自由自從民十七、十九年出版之「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中二編以後，繼續的在「逸經」「大風」兩定期刊物，按期寫述「革命逸史」，當中材料，與革命史有些不同。因為後者是側重個人傳記和軼事，比較的輕鬆雋永。加以革命史下編，爲着環境和時勢關係，出版期間，難以確定，故在下編抽出若干可以發表的事實，先爲披露，這是逸史寫作的動機。著者自十四歲即加入興中會，致力革命工作，四十九年，所經歷，所見聞，所搜羅的史料，較任何人爲豐富與廣博。加以民國初年，他任稽勳局長所得海內外革命史實也多。張繼在序裏曾說：「自由少承庭誥，躬參締創，並世耆賢勳風，大抵皆其共患難締縈紆之儔侶。早長稽勳局，周歷各行省，訪之身與各役諸勳舊，據事直錄，初無恩怨愛憎之私橫於其間。」這幾句話，可說是最恰當的佳評，我們不必再贅一辭的了。

馮氏本人也有「自題革命逸史」十首，今摘錄幾首，便知道著者本人的心

志與感慨了，詩云：

仲尼當陬春秋作，左丘失明國語成。我志未酬愧死友，寫將逸史寄平生。  
趙宣受惡稱賢相，崔杼防民號賊臣。千古是非公論在，景陽綱自畏何人！  
子房辟穀從黃石，少伯扁舟泛五湖。若使當年工述作，不勞遷固遠操觚。  
前代傳聞有異辭，卽今親見亦支離。何如締造艱難輩，各述行藏盡所知。  
元年忝掌稽勳局，晚歲重修革命編。自信董南能直筆，開基功業此書傳。  
數典忘先大有人，沐猴蒙馬更紛紛。一篇實錄皆身歷，啓導青年認國魂。  
只讀了這六首，也可以認識馮氏寫述逸史的苦心宏願。「一篇實錄皆身歷」，自然和「卽今親見亦支離」的不可同日而語。「開基功業此書傳」，可說是名實相符，并非自誇自贊的話。

這一本書，雖屬逸史，但其中包含的盡是革命史中的珍貴史料，如 總理的正式加入基督教會，從前有許多人都說是在檀香山求學時期，而這書却寫述是在香港，并把當時施洗禮的牧師喜嘉理所述 總理信教之追述，譯爲華文，來做證據。

日知會首要劉敬安，在總理自傳與劉揆一的黃興紀傳，馮氏的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三書中，均把劉敬安與劉家運混爲一人，於是黨內外編述史事的，也照着來敘述。直至民廿八年九月，由日知會老同志吳崑，始把劉敬安與劉家運非同一个人的證據，詳述出來，這又更正黨史的錯誤。還有總理於癸卯甲辰（一九零三至一九零四）第二次遊美，在革命史中，只說他被海關羈留一二日，後來得參與是次工作的伍于衍函告，始知在美海關被羈留於木屋的，竟有一星期之久。且當中經過事實，也多補充。關於這兩點，充分表現馮氏寫作的謙摛，全在事實爲本，絕不以個人道聽塗說來做根據了。

其中談諧幽默故事，敘述也不少，如盧少岐馬君武二人同時戀慕女醫生張竹君，胡漢民說是一驢馬爭獐，可說是謔而又虐。廣西鎮南關一役，因槍彈缺乏，只堅守八天而撤退。事後，山打根僑胞詢問鄧慕韓黨軍撤退的理由。鄧答是因龍州邊防，疫症大發，黨軍乃由越南延聘歐美十國名醫前往設法預防。十國名醫說時疫可怕，無法防治，只可撤軍等語。由是馮氏編作章回小說，用「鄧師爺十國請醫生」做回目。總理在東京寓所，有一天，和同志閒談田單

驅火牛破燕故事。田桐說，「田單在古代用火牛，吾謂今人可用水牛，若革命軍舉事，清軍有馬隊，而革命軍無之，吾們大可預先訓練水牛隊來臨陣，必可制勝」。章炳麟笑口吟吟的說，「乃祖用火牛，而後人更發明水牛戰術，可謂後先媲美」。在座的聞着，皆捧腹大笑，從此便說田桐是「水牛將軍」。謝英伯睡時的鼾聲，吼聲如震，致使巡街警察疑是屋裏有人打架，扣門查詢。有張某應聘到南洋當教員，缺乏常識，把升降機誤爲赴南洋的火輪船，後來在船上對於刀叉抽水馬桶用法，全不知曉，鬧出許多笑話。這都可入笑林廣記的資料，讀了令人發笑，作公餘茶后的談助。

湖北沔陽有土娼劉一，因和勸學所長往來很密，人就號她爲「沔陽監學」。此女幾經轉變，與黨人劉仲文相戀。武漢起義，劉任總監察，劉在就職之日，首先即委劉一爲總監察府監印官。這不特可入「二十年目覩怪現狀」裏，亦可說是「官場現形記」的續篇材料。至湖北黨人三盜金菩薩，那就想着化無用爲有用，純屬爲公，絕非爲私的工作，也可見當時黨人爲排滿活動的苦心孤詣。

書中所述一怪異事，即章炳麟陰司聽訟。章氏自民三被袁世凱幽禁北平龍

泉寺，因憤懣過度，積思成夢，幻覺被邀往地府攝理閻羅王判斷獄事。章氏自己中年曾作無神論，後竟信在地府中判審是非，未免矛盾，這可以證明他的思想心理都有變易了。

關於黨人的熱烈勇敢的活動，如鄒容、秋瑾、楊卓林、許雪秋、禹之謨、王和順、彭家珍、蔣大同、溫生財、楊篤生、陳天華，他們經過的事跡，都是可歌可泣的。康有爲的弟子十三太保與革命黨，知道當年革命黨與保皇黨的合作及分離而至政敵的經過，是研究革命史的應該明白的。

「三民主義」的一名詞，在二三十年來已普遍全國而至世界了。中國的空軍，在抗戰期間，更立下不少功績。然而知道「三民主義」的一名詞，創自什麼人？中國空軍，在什麼時候開始？恐怕有許多人還不知道，革命逸史可以告訴你。

革命逸史第二集和第一集不同之點，最顯著的，就是沒有插圖。在目下製圖，成本既高，且印在土紙上，也難清晰，故付闕如。還有其中記述女醫生張竹君，說她在庚子（一九零零年）畢業廣州多寶大街柔濟醫院附設的夏葛女醫

學堂。據我所知，有點出入。因爲夏葛女醫學堂，是在前清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纔創立，即使開辦時招收轉學生，但普通的四年級生是很難轉學，尤其是醫科，這是一點。還有一點，梁培基醫生，是在博濟畢業的，他曾告訴我，畢業後在母校助教，曾教過張竹君。前幾年，我在上海，有幾次和張醫生談天，她也說是在博濟出身。從幾點看來，張竹君畢業是博濟，不是夏葛。雖然這些瑣事，無關宏旨，不過偶然想到，便隨便談談而已。歸結一句，革命逸史，注重逸事，同時也注重史實，和道聽塗說，隨意鋪張，來博人一笑的，絕然不同，這一點我在紹介中，特別聲明的。



## 續談「革命逸史」

自我「評介革命逸史第二集」一文發表後，有留心革命史料的朋友，都問及我革命逸史第一集內容怎樣。爲了這，我就不憚煩地再來申述一下。

馮自由的革命逸史第一集文稿，是在上海逸經文史半月刊三十六期中所發表過整理而成。不過他的次序，是依據事實，時期，人物三者，分別先後，重行編排罷了。

著者在弁言裏，冠有七絕一首云：「白頭宮女談天寶，古董山人說晚明；今古興亡多少恨，狂歌當哭萬千聲。」

并說：「昔唐室宮女閒談開元天寶遺事，時人播爲詩歌。方今寇患，甚於安史，將材誰是李郭？作者不敏，亦等於白頭宮女云爾。」他寫這些話時，是在民國二十五年春間，是有感當時的事而發的，現在追述起來，也像白頭宮女說白頭宮女故事了。

篇首有他自序一篇，七千多字，申述他從事革命工作四十多年的經過，

不啻一篇馮氏的革命史，也可以說是他的革命自傳，而旁及和他有關係的人。

「革命」二字，現在一般人都作了口頭禪，但是革命黨人幾時纔用革命二字來做排滿的名詞，那就許多人不知道。在革命逸史第一段就開始敘述了。

本書雖屬逸史，但他的次序是順着而談的，從乙未（一八九五）重陽，廣州第一次舉義失敗，總理和陳少白鄭士良兩位亡命日本起，而至辛亥年武昌起義止，其中黨裏有許多珍聞逸事，可歌可泣，可笑可恨，奇談豔跡，莊諧雅俗，無所不包。在坊間敘述黨事的著作中，他是生面別開。闡幽顯微，固是著者的本意，而體例不求謹嚴，紀載不厭瑣細，既可逃避環境的束縛，也可補充正史的闕漏，也是著者的深心。所以逸史等於野史，又是一個主因。

陳恭祿在「中國近代史」說總理在廣州行醫，營業不甚發達。金兆豐在「清史大綱」說南京政府成立，即定五色旗爲國旗；都和革命史實不對。馮氏此書，均有詳細寫述，可以參攷。可惜那些作家不知道原委，隨便掇拾其他不正確的史實而成文，致與事實不符。

革命黨與康梁們，曾經有過一度協商合作，可是保皇黨的人們，別有企圖

，纔沒有成功。而其中經過，鉤心鬥角的事跡，讀了使人明白保皇黨背信違約的陰謀，實在刻毒。梁啓超的情史，也在書裏完全暴露出來，康有爲說梁是「荒淫無道」，究竟梁怎樣「荒淫」，有詩爲證。梁詩共有二十首，今錄五首如下：

眼中既已無男子，獨有青睞到小生；如此深恩安可負！當筵我幾欲卿卿。自愧茫茫虎穴身，忍將多難累紅裙？君看十萬頭顱價，遍地鉏耨欲噬人。一夫一妻世界會，我與瀏陽實創之；尊重公權制私愛，先將身作後人師。却羨權奇女丈夫，滿腔情緒與人殊；波瀾起落無痕迹，似此奇情古所無。含情慷慨別嬋娟，江上芙蓉各自憐；別有法門彌缺憾，杜陵兄妹亦因緣。（丹按：詩中所說瀏陽，是指譚嗣同。這些情詩的對象何蕙珍女士，長於英語，是常替梁充傳譯的。）

當中又有一段可笑的事，王寵惠在東京任國民報英文撰述時，是與秦力山同居一屋。王住樓上，秦住樓下。所僱日本下女，貌頗妖冶。愛王少年英俊，屢向之調戲，王以告秦，請爲相機制裁。某夜，日下女竟伺王熟睡，赤身俯就。王大駭，

連聲呼秦。秦說「我來，我來。」日下女纔狂奔而去，一時留東學界，傳爲笑話。又有敘述日教員偷竊皮蛋，日下女偷留學生牙粉塗臉，都是可發一笑的。

蘇曼殊的身世，各人所說不同，馮氏與曼殊早年同學，知之較詳，在「蘇曼殊之眞面目」一文，敘述許多特有的史料。

在中國日報徵聯「未離乳臭先排漢」，是朱執信所擬，指溥儀尙未脫離乳臭年齡，卽排斥漢人。結果，入選的幾聯，也很風趣有味，如「將到長毛又剪清」，「一洗髒污大革新」，「甚至牙科亦舉人」，「飽載腰纏尙剝民」，「既扯皮條又捉姦」，「不學頭尖莫作官」，「欲博頭銜遠出洋」，這些都是有感而作的，諷刺很深，且有些含着排滿意味。

此外關於革命史實，記載很多，如檀香山興中會，國旗歷史，支那亡國紀念會，中國日報，拒俄義勇隊，軍國民教育會，中國教育會，廣州新軍起義，三月二十九廣州革命，武昌起義之革命團體，以及初期革命先進的行誼軼聞，無不蒐羅發表。書中還有非常珍貴挿圖七十多幅，圖文并重。這一點，似較第二集爲特色。

最末還有幾句話，就是我們看到了書中所載民十三冬，章炳麟等十二人發表的護黨救國公函，思今念往，無限感慨，知道他們當時實有先見之明。這又給研究中國當代史的不可忽略的資料。

第一集與第二集，雖沒有連環性，但是看了第一集應該再看第二集，或是看了第二集，也要看第一集。那麼，所知道黨裏的逸史更加豐富了。

## 對金著「清史大綱」的黨史研究

余在「總理在港習醫校名的考證」文裏，曾說到坊間關於革命史實的敘述，多有錯誤。此話既非「吹毛求疵」，也不是一無的放矢，其實我們如果留心一點去研究，便可以發覺一般歷史的許多錯誤。即使近世史與現代史，年代和現在相隔不遠，史實應該比較的正確了，可是他的錯誤，還是很多。即如金兆豐的「清史大綱」，錯誤之點也不少。金氏爲史學專家，曾在清史館實錄館協修史事，而他在這書裏的敘述，有些也屬顛倒事實。今摘錄此書第十六章，清季之狀況，三、清室遜位及民國肇興所述「清末革命」的一段如下：

「先是中朝因政治之不良，內亂時聞，外侮日亟，各處屢起變亂，勃發而不能遏。廣東孫文乃創設興中會。在廣州謀起事，事洩，走澳門，因赴南洋羣島，復組成革命同盟會，未幾，即有史堅如，謀刺粵督德壽之事，時光緒二十四年也。堅如埋火藥於署旁，轟擊之，而外援弗至，事遂敗。唐才常起義武昌，發難輕率，徒孤壯志。自是桐城吳樾，又謀炸五大臣於天津。山陰徐錫麟，又槍

斃恩銘於安慶，江都熊成基，又謀舉事於安徽，長沙黃興，又圖舉義於雲南河口。汪精衛、張榕、黃復生等，復謀炸攝政王載灃於北京。此仆彼興，并不稍止。中朝不知改良政治，爲根本上之解決。第循例嚴飭逮捕，以防復起。迨至宣統三年，溫生財等又槍殺孚琦鳳山。陳敬嶽等又謀刺李準，趙聲等復在廣州謀發難，辛亥春之攻廣州，即是秋起義武昌之張本，以軍隊不附從，一致挫敗。凡死難者叢葬之黃花崗，至七十有二人，時稱爲黃花崗諸烈士……」

照金氏如此敘述，錯誤和倫次不順之點，有如左述：

一、「清史大綱」是在民國十六七年所完成，『各處屢起變亂，勃發而不能遏』兩句話，似是站在清室方面說話，最低限度，也有語病。

二、『在廣州謀起事，事洩，走澳門，因赴南洋羣島，復組成革命同盟會』，與事實不符。因爲光緒二十一年乙未，興中會黨人在廣州第一次舉義失敗之後，總理是和陳少白鄭士良由香港到日本橫濱，并非『走澳門，因赴南洋羣島』。不久，是轉往檀香山，又由美赴英，跟着發生倫敦被難。

三、史堅如謀炸德壽，是在光緒二十六年庚子的九月五日，不是『光緒二

十四年』。

四、唐才常起義地點，是在漢口，不是武昌，且時期是在光緒二十六年的七月，比之史堅如謀炸粵督德壽，早了一個多月，依次序記述，應該在史堅如之前。

五、熊成基舉義於安徽，是在宣統元年己酉，黃興舉義於雲南河口，是在光緒三十四戊申，兩件事，他恰恰調錯先後。

六、『溫生財等又槍殺孚琦鳳山』一句也不對，溫生財槍殺孚琦，是在宣統三年辛亥的春間，李沛基之炸鳳山，是在辛亥年的秋間，怎能只用一個「等」字，輕輕的把李沛基略去了。又把春季秋季聯成一起，而中間却插入陳敬嶽謀刺李準，趙聲等在廣州發難呢？

七、吳樾、徐錫麟、熊成基、黃興四人，都叙明縣籍。其他如：史堅如、唐才常、張榕、黃復生、溫生財、陳敬嶽、趙聲等則付闕如。總理的名字，則冠以省籍，而不用縣籍，又不知何故了。

八、廣州起事，史堅如謀炸德壽，唐才常起義，吳樾謀炸五大臣，徐錫麟槍



殺恩銘、熊成基、黃興的舉事，黃復生等炸載灃，趙聲等的發難，都有地名叙入，而『溫生財等又槍殺岑琦鳳山』（依照原句）陳敬嶽謀刺奎準，却又不列入發生事故的地名，使讀者莫名其妙。

九、所叙的史事，除了兩處寫明年期之外，其他都沒有寫明，不知何故？而且有一處雖有年期，也屬錯誤的。

十、文裏所說『革命同盟會』，上句是『因赴南洋羣島』，照句法說來，似乎同盟會只在南洋羣島組成，也有點費解。

只就所引述三百多字的叙述，其中的遺誤，大略談談，已是如此，其他各次起義，也沒有寫入。全書的錯誤怎樣，不關本題，不必贅說了。

金氏在『民國肇興』裏所寫的，也有研究的地方，如云：

「議和之際，適同盟會首領孫文，已由海外回國，由十七省代表，公舉爲臨時大總統，就職南京。改用陽曆，中華民國元年元旦，即宣統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也。定國旗爲五色旗。隨舉黎元洪爲臨時副總統，組織內閣，是爲南京臨時政府初立之概略……」

『定國旗爲五色旗』，和事實也有些不符合：在當日雖然有人提議用五色旗爲國旗，總理不表同意，覆書論之，有云：

「本大總統對於此問題，以爲未可遽付頒行。蓋現時民國各省，已用之旗，大別有三，武漢首義，則用內外十八省之徽誌；蘇浙則用五色之徽誌，今用其一，必廢其二，所用者必較此爲優良，非有絕大充分之理由，不能爲折衷定論。故本大總統不欲遽定之於此時，而俟滿虜既亡，民選國會成立之後，付之國民公決。若決定於此時，則五色旗遂足爲較最良之徽誌否，殆未敢言。」

（一）清國舊例 漢軍以五色爲一二品大官之旗，今黜滿黃之國旗而用官旗，未免失體。（二）其用意爲五大民族，然其分配代色，取義不確，如以黃代滿之類。（三）既言五族平等，而上下排列，仍有階級。

夫國旗之頒用，所重有三：（一）旗之歷史，（二）旗之取義，（三）旗之美觀。武漢之旗，以之爲全國之首義，尙矣；蘇、浙之旗，克復南京。而青天白日之旗，則爲漢族共和黨人之用於各方面。憶十餘年，自乙未以來陸皓東身殉此旗。他如黃崗，防城，鎮南關，河口；最近如民國前二年，廣東新軍之反

正，倪映典等流血。前一年，廣東省城之起義，七十二人之流血，皆以此旗；南洋，美洲各埠華僑同情於共和者，亦已用多年。外人公認爲民國國旗。至於取義，則武漢多有極正大之主張，而青天白日，取意宏美。中國爲遠東大國，日出於東爲恆星之最者。且青天白日，示光明正照自由平等之義，著於赤幟，亦爲三色；其主張之理由尙多。但本總統爲非於此時決定，則可勿詳論，因而知武漢所主張者，亦有完滿之解說。究之革命用兵之際，國旗統一，尙非所急，如美國亦幾經更改，而後定現所行用之旗章。」

馮自由在「中華民國國旗之歷史」（原文在逸經發表）所說辛亥革命軍旗幟，各地不同。他說五色旗的由來，是「爲上海江蘇軍政府之五色旗，乃宋教仁，陳其美所提議」，而在「參議院折衷制定國旗之經過」中則說：

『參議院既遷北京，爲國旗方式問題，嘗發生劇烈之爭議，最後乃採納折衷派意見，議決以滬軍都督府所用紅、黃、藍、白、黑五色旗，足以代表漢、滿、蒙、回、藏五族，最爲普遍，確定爲中華民國國旗。……』

據此，可知定五色旗爲國旗，是參議院北遷後所有議決，並不是南京政府

初立時所定，至爲明顯。於此順帶摘錄馮氏追述國旗史料兩則，來做參證；

一、民元，南京政府成立時，發生國旗問題。總理乃於總統府辦公室內，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新圖，旗中紅色之上橫添白線若干，每一線即代表一行省。總統府職員及賓客多見之。惟此新旗式，尙備而不用，總理始終未向政府提出之。

二、民十二年，總理在粵重組大元帥府……適是年全國學生會在廣州召集大會，請總理於開會日蒞場指導。行禮時，總理見堂上懸五色旗，竟不爲禮。演說間，乃說明青天白日旗與五色旗之異同，及在革命史上之價值。衆始了解。民十三，總理乘中山艦北上，道經香港，艦上懸青天白日旗。英吏遣人相告曰：如改懸五色旗，當以禮接，……總理毅然不恤。

總理對於五色旗，素不注重，金氏所說南京政府『定國旗爲五色旗』的話，似乎有點不對。

## 對高小教科書「七十二烈士」批評

昨於采其處，看到中華出版的「新編高小國語讀本」第四冊，第十六課「七十二烈士」內容所述，和當時事實有點不同。雖然教科書的編者爲着學生容易領會起見，不妨將史實略加渲染，但是不能違背事實，免致以訛傳訛，也是編書的應該注意之點吧。

從他這一課書所說，這一次舉義，完全是黃興一人領導，而且又是黃興所率領隊伍，專事襲擊兩廣總督署，便算了事。全課文裏，提出黃氏凡六次，而其他的姓名，則絕未一見。如：「黃克強先生在廣州，帶領了敢死隊」；「黃先生像發狂一般的」；「黃先生被裹在這裏」；「所向無敵的黃先生」；「黃先生殺出了重圍」；「正在搜索黃先生的餘黨」等等，對於黃興，是特別的提出，而抹煞其他重要幹部人物。

這一次起義的統籌部，黃興爲部長，趙聲爲副部長。又分爲：調度、交通、儲備、編制、祕書、出納、調查、總務等課，由姚雨平、趙聲、胡毅、陳

炯明、胡漢民、李海雲、羅熾揚、洪承點等分任。選鋒主幹有：黃興、趙聲、徐維揚、陳炯明、黃俠毅等分任主任。當初議決分十路發難，其人選爲黃興、趙聲、徐維揚、莫紀彭、陳炯明、胡毅、姚雨平、黃俠毅、梁超、李文甫、張六村、洪承點、羅仲霍等；後因事改爲四路，總司令趙聲，副司令黃興。四路地點的重定，是黃興攻兩廣督署；姚雨平攻小北門，佔飛來廟並延防營新軍進城；陳炯明攻巡警教練所；胡毅守大南門等，分頭發難。這些分配及舉義實情，鄒魯所編著「廣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裏面，說的很詳細。

還有幾點和事實不符的，就是課文所說黃興和黨人們，把「來福槍、馬槍、手槍，都撒在一旁，槍刺在人叢中也嫌累贅，只用匕首，在火把中閃閃鏗鏘的亂刺。」又說：「他握着刀飛舞，上下左右，刀鋒起處，砍着不死便傷。」這雖是形容黨人和黃興的勇敢。但據參加是役的人說，他們的手槍是不離手的，拿着匕首或刀來殺敵，實在不多，怎能把他形容全體呢？而從課文看，則是寫明「於是他們的隊伍，……只用匕首在火把光中……亂刺」那就不對了。課文又說：「明天早上，被擒的敢死隊，都在校場上被殺了。」也不對。烈士中林

覺民就被繫了數日纔就義，饒輔廷且延至四月八日纔成仁，可見不是第二天即處決的。因爲這次黨員被捕的有四十三人（見張鳴岐電奏清廷的文），照例均須審訊一過，清吏在驚魂剛定，頭緒紛煩，因此，事實上也不能在「明天早上」就完全「被殺了」。

關於是役的主要人，黃興於民國元年二月，在南京「辛亥三月廿九廣州革命先烈追悼會」演說詞中有說：『至軍事上之計劃，興與趙伯先生任之。……趙伯先生爲總指揮，事後，外間傳言興爲總指揮者，誤也。……興率十餘人，由側門入署，餘大部份，四川喻培倫先生率之，駐門外防禦。……興立大堂柱旁，雙手各持手槍還擊，斃衛兵數人，餘皆鼠竄。』又莫紀彭的「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血戰筆記」開首即說：『辛亥三月二十八晚二漏許，余叩先鋒隊長陳炯明宅，進謁副司令黃興而問之曰……』綜觀黃莫兩位所述，均知是役總指揮（司令）是趙聲，黃是副的。課文「陣亡者屍骸，都搬運出去了，喊聲依然震動長夜，火把往來照耀，正在搜索黃先生和餘黨。」所謂「陣亡」和「搬運」，是指清軍呢？抑說黨人呢？實在含糊不明白，事實上當時恐怕也沒有立

即搬運屍骸。

最末，還有此役事後由趙聲、黃興、胡漢民三人署名致書馮自由及域多利致公堂；黃興、胡漢民聯同署名致書加拿大同志等，亦可證明此役的主腦人物，不只一人了。

由本證旁證所得，「七十二烈士」一課，從事實考訂，有許多是不符史實。這一冊教科書在「民國廿八年六月五四版」，銷流可說普遍，今特提出，希望編者、校者、審定者注意修正，纔免習非成是啊。



## 讀陳恭祿盧紹稷所述黨史後

陳恭祿所寫「中國近代史」及「中國近百年史」兩書，材料還算豐富，研究近代史的，多把他視做良好的參考書籍。不過當中材料，有些是靠不住的，試舉一例作證。如在十三篇「改革與革命」內興中會節所說：

孫文，生於一八六六年。父爲基督教徒。兄營業於檀香山，及長，嘗往遊焉。肄業於廣州教會設立之博濟醫學校，後聞香港新立醫學專科，設備完備。渡港就學；一八九二年，卒業，爲該校第一名畢業生。初懸壺於澳門，廣州……廣州愚民，不信西醫，營業不甚發達。

這一段話，錯誤極大。第一點所說「父爲基督教徒」一句，不知作者何所據而云然。因爲研究孫氏家世的人，都找不出 總理的父親達成公是屬基督教徒。而且 總理的哥哥壽眉，因 總理在檀香山研究基督教理，深恐 總理入教，而強迫 總理回國。這一點也可以證明他的同胞兄不願意自己的胞弟信教，故遣 總理返鄉。至後來 總理在香港由喜嘉理牧師施水禮入教，那是後來的

事；而他的父親決不是基督教徒。

第二點，總理在廣州習醫，是在博濟醫院而不是博濟醫學校。

第三點，總理在香港習醫，是在「香港西醫書院」，不是「醫學專科」。

（參看「總理在港習醫校名的考證」，便知其詳。）

第四點，所說「廣州愚民不信西醫，營業不甚發達」幾句話，和事實也不符。「廣州愚民」一句，在修辭學上說，已有語病。今把這些記載與馮自由在「革命逸史」裏所說比對便知。

#### 總理之醫術

……次年，中西藥局遷於廣州，總理遂藉醫術以納交於官紳之門，爲革命之運動。清吏以其名高學博，無疑之者。

#### 孫總理行醫廣告

……旋復設東西醫房於廣州洗基，存心濟世，贈藥施醫，所業較澳門尤爲繁榮，乃添聘尹文楷助理醫務。

從上面兩段所說，所謂「名高學博」，必定是醫務很發展，所以名纔高。而「

所業較澳門尤爲繁榮」，更足以證明他的業務是發達，所以要「添聘尹文楷助理醫務」。還有在光緒十九年十二月廣州中西日報載武沁鳴謝「總理醫術啓事裏，有說：「孫逸仙先生，學宗孔孟，業紹岐黃，合盧扁而擅專門，內治與外施並美；統中西而探奧旨，鍼砭並刀割兼長。其生平醫術精純，業經大紳諸公，合詞頌稱，登諸嶺南諸報矣。……」於此也可以證明「總理的醫務，并不是不發達。否則「大紳諸公」，決不會「合詞稱頌」，「登諸嶺南諸報」的。

陳恭祿的「中國近百年史」裏「孫文略傳」有云：「二十一歲，始習西醫，入博濟醫校；次年，入西醫書院」。這書所載，和中國近代史也有出入。一說博濟醫學校，一說博濟醫校；一說醫學專科，一說西醫書院，稱謂完全不同。醫學校與醫校只有繁簡之分，還沒有不對之處，不過嚴格說來，博濟只有稱醫院，絕沒有稱過醫學校的，這是事實。至於在港習醫所說的西醫書院，本來較對，可惜漏去香港二字。因爲在「總理習醫畢業的執照上，寫明是「香港西醫書院」。還有這書令人看了不清楚的地方，就是「始習西醫」一句之後，入

字之下，漏去廣州二字：次年入字之下，漏去香港二字：使人看了莫名其妙，不知道「博濟」和「西醫書院」，究竟在甚麼地方，這不能不說是忽略的叙述。

盧紹稷的「中國近百年史」中「孫中山先生和革命運動」段內說：「先生性嗜醫，二十一歲時，入廣州博濟醫學校，從英人康德黎學醫。」博濟醫學校的名稱已是不對的了，康德黎也不是博濟醫院的教授，而是香港西醫書院的教習。這是凡屬稍稍研究過總理行誼的人，都能明白的。不知道盧氏根據甚麼，來說總理在博濟習醫是從康德黎學習的。

幾十年間的歷史，已經有了如此的錯誤，其他如中古史、上古史，不盡不實，張冠李戴的史事，自然更多了，怎樣令人置信而不懷疑呢？

丹林附言：關於總理的父親是基督教徒一說，只有康德黎所寫的「孫逸仙與新中國」書裏談及，可是這個記載，是不正確的。如果總理的父親是屬基督教徒，那就總理在檀島時研究教理，他的哥哥壽眉決不至因總理研道而強迫他回國，是恐怕他奉教的。總理回到故鄉以後，和陸皓東毀壞北帝

廟偶像，也不至要受父親的責備，甚至被迫到廟裏去認錯的一段反信仰的事了。從這兩點史實，都可以證明 總理的父親達成公不是基督教徒的了。

## 研究中國革命史的我見

讀了「黨義研究」第四卷第一號張健甫所寫的「略談研究中國革命史的要點」，我就有些感想，現在拉雜的談談。

拿破崙說：「歷史非他，一推謊話罷了。」若果我們相信這句話是真的，那我們就不必再相信歷史了；反之，這句話若是靠不住的，那我們就要找他的真實性，研究他的謊，謊又在甚麼地方；淘沙見金，必得正確的史實。

王充論衡說：「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沈；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孫奮傳說：「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那麼，我們對於歷史，便又不得不潛心研究了。雖然有人說：二十四史是一部「鬼簿錄」，歷史書是不足掛齒的謊話，根據古墓發掘是無聊；把這些東西丟在毛坑裏，也不爲過。……說這些話的人，簡直是不知道歷史價值的重要性，更其是不知道歷史和人生密切的關聯性。

但是我們又不要過信歷史，尤其是上古史三皇五帝的歷史，靠得住嗎？摩

西五經的神話又是真的嗎？老子、墨子、李白，已經有人說他們不是中國人了。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我們要本着懷疑的態度，虛心去尋求他的正確性；除了本證之外，更要多找旁證。這樣分析、綜合、歸納起來，纔可以下結論，纔不受古今人的欺騙。

卽如拿中國革命史來說吧，只就國民革命來講，從前清光緒十一年（民國紀元前二十七年，公元一八八五年）總理立志傾覆清廷時起，而至現在，還不到六十年；坊間對於黨史的圖書，雖不致於汗牛充棟，然亦屈指難數了。但是，我們如果把這些圖書，潛心的研究校勘一下，可以說沒有一部是絕對沒有錯誤的，只有錯誤的成分多與少的區別罷了。五十多年的史料，想要他得到完善正確的，已經如是之難；其他如現代史、近代史、中古史、上古史、史前事蹟，不是更難靠得住嗎？

歷史之所以缺乏真實性，固然由於有些寫歷史的，沒有下過深切的工夫，東抄西襲，以訛傳訛，結果，習非成是。卽如總理在香港習醫，是在「香港西醫書院」，坊間書籍，百分之九十九說他是在「雅麗氏（士）醫院（校）」。

總理的信奉基督教，受洗入教會，是在香港的公理會禮拜堂；而許多書籍，却說他是在檀香山讀書時入教。這些，便是明證。還有些是因為環境關係，諸多顧忌：爲張三隱諱，替李四鋪張，受秦七之箝制，報黃九之私仇。種種的原因，於是顛倒事實，不能據事直書了。有些又以宗派不同，入主出奴，是丹非素，淆亂黑白。也有採訪不周詳，取材不審慎，急於成書，掛一漏萬，草草塞資。也有材料採自外國，譯名術語，不求其真，只用「或者是」和「差不多」來做事實根據。間亦有因思想信仰的不同，而把事實抹殺。如某甲所寫的總理傳記，洋洋數萬言，但他竟故意把孫夫人不寫入書裏去。拉雜寫來，歷史如果有了以上所說的毛病之一，已經難得正確，而且要是精密去探討，還可以再找許多不忠實，不完備的罅隙的呢。

司馬遷說得好，「述往事，思來者。」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時期，我們要努力，就應該把革命史先來分頭整理，把他成爲一部比較的詳備的革命史。最近得友人函告，知道鄒魯已把他前所編著的「中國國民黨史稿」，從事覆修，把許多新得的材料加增入去，而把錯誤的地方更正。這樣一來，相



信在不久的期間，當可得見一部比較詳備的中國國民黨史稿了。

我有些意見，與錢實甫相同，即是無論坊間有若干黨史的圖書，我們也要不斷的向各方面搜集關於黨史的珍聞遺事，不論長篇，不論片段，或是本身經歷，或是得之傳聞，都要盡量的普遍的徵集記述。這種材料，彙集起來，便是組成歷史的細胞；或做參考資料，或供引證史實，或補前人所記的不足，或爲引導研究者的因子。這種工作，在目前實在亟需，而不容遲緩。萬一過了些時，前輩零落，更難着手了。

我還有一點偏見，或者可以說是我個人的癖好。甚麼呢？與其苦心孤詣去探索上古時代的史料，不如轉向近代史，較爲有味。因爲當中許多有關係的人物，自己熟識，最低限度，彼此時代相隔不大遠，材料比較易覓，不致茫無頭緒。因此，我在二十年來，對於近代史，特別嗜好。自然，黨史也在其中。讀了張氏的論文後，一時興到，隨便談談。不知張錢兩位以爲如何？

前文寫就，即在粵北乘車西行入蜀，在湘桂途中，偶有所憶，再說幾句。研究中國革命史，有把台灣朱一貴的中興會（康熙六十年，公元一七二二），

林爽文的天地會（乾隆五十一年，公元一七八六），湖北、安徽、河南、湖南等省劉松、聶傑人、齊王氏們的白蓮教（嘉慶元年，公元一七九五），河北、山東、山西、河南各省林清、李文成等人的天理教（嘉慶十八年，公元一八一三），都歸入革命史之內；有從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道光三十年，公元一八五零）起，這是沒有一定的。但現在談中國革命史的，多數是從興中會起；而普通的又多由興中會，而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等相聯接，而把自立會、光復會、日知會、華興會、共進會、同仇會、東京青年會、支那亡國紀念會等忽略，最多也不過略說幾句。雖然，如支那亡國紀念會是屬臨時的集合，但是其他如自立會、華興會、光復會等，却有他的具體組織，有主張，有實際行動，應該分別的詳細去敘述，不能夠把他忽略的，或者視為附庸。在同盟會未成立之前，各革命團體，分頭活動，和滿清搏鬥的光明偉大歷史，是很值得研究中國革命史的一個加以精詳的平衡研究，纔免陷入偏枯單純的途徑。偶然想到，再寫幾句。三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寫於柳州旅次。

## 廣學會與革命運動

基督教會英美教士在上海主辦的廣學會，他出版之圖書，對於中國的推行新政，無論直接間接，助助很大。只就和革命黨人的思想影響，也有他的貢獻了。馮自由在「記上海志士與革命運動」文裏第一段，就是說到「廣學會及大同報」，他說：

上海爲我國內外之交通孔道，自海禁開後，各國教士絡繹來中土宣傳基督教義，羣以上海租界爲樞紐。英美二國人士李提摩太，林樂知，李佳白等特創設廣學會及大同學會文化組織，專繙譯基督經典及歐美史理科學等一切關於文化之書籍。如「泰西新史攬要」，「普法戰史」，「格致彙編」之類，無慮數百種。國人之談新學者，莫不奉爲津梁。廣州雙門底之聖教書樓，即以販賣廣學會出版書報爲營業，孫總理及康有爲之倡導維新，大都得力於是。及申午戰後，士大夫漸知變法之急務，此項譯本，尤風行一時。故自西歐之文化東漸而言，廣學會及大同學會繙譯之功，實爲不朽

……

馮氏在「聖教書樓」文裏也有說：

總理初在廣州業醫，以同教之關係，假該樓爲診察所。……凡屬上海廣學會出版之西籍譯本，皆盡量寄售，實爲廣州惟一之新學書店。……

廣學會成立緣起，先來一談，他開辦的動機，是因爲蘇格蘭的格蘭斯哥，有幾位基督教徒，組織聖教書會，準備印刷聖經及編印佈道圖書。在機器鉛字參攷圖書等，都已購備了，因着意見分歧，便中途解散。全部的印刷機器，經公衆議決，轉贈給在上海傳教的韋廉臣。韋氏得了這批印刷機，就聯合同道，組織廣學會，做基督教在華文字布道工作。取名廣學會的原因，是含有廣播學術的意義。那一年，是在公元一八八七年（前清光緒十三年），他的工作，是譯著宗教、科學、政治、歷史及其他培德滄智的書籍，啓發人民知識，改良中國社會，溝通中西情感，灌輸中西新文化。和其他教士與教會書局爲傳教而傳教的不同。當時主事的深感中國應該舉辦新政，方能有新希望，可惜多數的知識分子，對於西方的政治科學，還是異常隔膜，爲着補救這個缺憾起見，特先

創辦定期刊物，做宣傳的工具。「萬國公報」，就在公元一八八九年（光緒十五年）由美教士林樂知主編出版了。他是周刊，每逢星期六出版一次。內容除選載京報及國內外大事記之外，兼及政治科學。深得當時的士大夫歡迎。而且文體是打破歷來古文駢文，和八股的章句義法，信筆直書，充量的運用新名詞，引證世界新歷史，別創一種風格。主論是以中國切身科學爲前提，文字又淺顯流暢。凡是讀着的人，都深深地感到興味濃厚，而受感動，油然而有了改革中國治政的想念與決心。

關於中國富強的專著，如「救華卮言」，「醒華博議」，「興華新義」，「保華全書」，「富民策」，「富國真理」，「足民策」，「廣學興國策」等數十種，都是針對中國應該從速改革政治，纔能够強國裕民的計劃方案。

這些圖書怎樣促醒導引有志之士的思想呢，摘錄「武昌革命真史」作者曹亞伯在自敘裏的所說，也可以例其餘了，曹說：

旋張（長善）示予一書，名曰「格致探源」，乃上海廣學會所譯。予生長於極閉塞之興國州崇山中，見此新書，極其樂意。欲借一讀，張故靳而不

與。予強借，頓悟守舊之非，卽入大冶縣福音堂爲信徒。於是家庭革命，社會革命之思想，日往復於胸中，不顧自身一切。時與舊習慣相抗矣。

從這些事實來看，廣學會對於當年革命黨知識的啓發，是相當有關係的。總理上書李鴻章，條陳新政，這一封長函的全文，也就只在「萬國公報」發表。這可以知道廣學會對於新政的倡導，同時也可以知道總理心目中的廣學會「萬國公報」可以發表他的救國主張的唯一刊物。

廣學會的主持人李提摩太及其編譯部的幹部人物，林樂知、花之安、李思倫、白、丁韞良、慕維廉、梅滕更、莫安仁、高葆真、季理斐、李佳白、寶樂安、山雅各、福開森等，都是先後很努力工作的。李提摩太著作極多，今把他所寫「論中國易於富强」文裏所說，便可以見到一斑，如云：

……所惜官憲因循於上，學塾玩泄於下，狃於積習，埋沒人材於帖括之中，不能發奮爲雄耳。如果振作有爲，洵有事半功倍者。噫，自海禁既開，時局互異，歐洲諸國日以開疆闢土爲事，從前既佔美澳兩洲，嗣又分據非洲以爲外府；亞洲之緬甸、安南以及琉球，皆我（中國）藩服，寸疆尺土，

不容輕易以與人者也。而今則安南已黥吞於法矣，緬甸又吞食於英矣，琉球且宗社丘墟兼併於日本矣。今之時勢，豈獨可安常蹈故而不知變計也耶？誠能精以練兵，富以養民，課農商以爲根本。此外開鐵路以通商惠工，立郵政以便民利國，年中運費之所出所省，不知凡幾，郵資之所溢，又不知凡幾。由此開各礦以盡地利，設西塾以育人才，將見物產豐盈，民俗富有，而國勢亦蒸蒸日上，當駕五洲以上之，豈第并駕齊驅已哉！

李提摩太們是英國人，他們的立論，自然不敢露骨地揭布推翻滿清政府。而他論中國易於富強，却引出安南緬甸琉球等被外族侵凌割据，絃外之音，却給國人一個有力的暗示。加以「萬國公報」和其他圖書，立論都是振興中華，舉辦新政，如美國史，法國革命史。便是一個提倡民主的生力軍了。因之他在直接間接上，給予國人的革命思想的啓發，實有很大的助力。

### 三、二九的二三事

總理在「孫文學說」裏「有志竟成」章，對於三月廿九之役有說：「於是乃有辛亥三月二十九廣州之舉。是役也，集各省革命黨之精英，與彼虜爲最後之一搏。事雖不成，而黃花岡七十二烈士轟轟烈烈之概，已震動全球，而國內革命之時勢，實以之造成矣。」是的，三月廿九之役以後，只過了五個月，便是武漢起義，則此役意義的重要也可知了。

關於此役的史事，三十多年，說的也不少了，今只追述些較有趣聞逸事，使我們知道革命是非常的事業，也是艱鉅的工作，尤其是隨機應變爲了主義，是不顧一切的。

當時滿吏嚴密的防範黨人的活動，於黨人絕不因此而有些畏懼，在廣州城內外遍設機關，有些是假託做小商店的，有些是做住家的，住家的主婦是由女同志冒充家眷。可是女同志少，男同志多，於是有些女同志一身而兼三兩處的主婦，以掩飾偵探的耳目。搬運軍火，則假託娶親，挑送禮物，逃避偵緝的注



意。有些軍火冒充顏料，用鐵桶木箱等來裝運。也有偽飾伙夫，把槍彈藏在菜蔬或餅食盒裏，借買菜與送禮爲名，分送到各機關去。亦有把軍械藏在鐵床梳裝櫃或盤花等，運到偽裝的醫院去。果然一帆風順，所運軍火，都能够到達目的地。

當出發的時候，黨人多是脚着黑面樹膠鞋，用白毛巾纏在臂上做記號。小東營五號，是黃克強辦事的機關，在那天的下午四時餘，黃氏召集同志慷慨誓師的時候，朱執信本有其他任務，恰值趕到，身上穿了長衫，不及脫掉，即把長衫的下截撕去，成了短衫，加入隊伍，一同出發。這種堅決勇毅精神，確是黨人本色。

還有譚人鳳，長髯拂拂，年紀已五十多歲了，從香港趕到，見黃克強束裝已妥，正在分發槍彈，請黃休息片刻，報告港方同志意見，想着改期一天。黃即頓足答譚，「老先生，不要多事，來擾亂軍心。」譚知時機已逼，不可遷延，馬上整裝加入，向黃要手槍。黃婉轉的對他說，「先生年紀已老，後方事還要人辦，這是決死隊，望你不必加入。」譚發怒悻悻地說，「難道你們敢死，我

獨怕死嗎？」黃不得已，即給他手槍兩枝，譚接槍的時候作播弄狀，不知怎樣的誤觸槍機，砰然響了，一彈從屋壁穿去。黃即把譚的槍取回，即說，「譚鬍子不行，不要搗亂，誤了大事。」譚那時纔把槍交還。這又證明譚的年紀雖老，而雄心勃勃，力不從心，這是無法的罷了。

喻培倫率隊攻襲駐觀音山的巡防營，恰值巡防營兵大增，喻退到高陽里元盛米店借米包做炮壘，同志十多人，力禦巡兵四百多人，惡戰三小時，殺死清兵數十人，巡兵畏死不敢前，放火燒米店，在千鈞一髮之際，喻逃出被捕。同志某，知無法脫身，用炸彈來自焚，作了壯烈的犧牲。

未發難之前，喻培倫爲了炸彈，忙碌了三日三夜沒有安眠的去配造。而當出發攻兩廣總督署時，喻的身上負了炸彈一大束，左手持號筒，右手拿手槍，瞬間盡染灰土，容貌威猛，好像要盡殺清吏纔洩心頭之恨似的。

黃克強率隊攻入總督署時，斃衛兵數人，旋行至東轅門外，與李準衛隊遭遇戰，黃的手指和脚部受彈傷。輾轉到珠江河畔喚艇渡河南，言語不通，又忘記了溪峽的機關門牌，僅記得假託胡姓娶親的。黑夜裏見有硃聯在門口的即叩

門而入，同志多不在，僕婦不准他入去，說了些時，纔放他入。上樓杳無一人，只見一人直立，初看像是勒死的，上前細看，纔知小婢瞌睡。第三晚夜船，改穿灰布長衫，由徐宗漢女士伴他到港。他因一指將斷未斷，非常痛楚，入雅麗氏醫院施用手術，徐即用妻的名義簽字，黃徐的結合，從此而起了。

其他的黨人脫險，如但懋辛是伏在廁所裏三天之後，自首得脫，嚴驥匿在鴉片烟館兩天，改裝挑夫逃逸。劉梅卿到山貨店買繩子，交易后向店主說，我是附近某店夥伴，今軍警滿途，請借燈籠一用，否則途中恐有不測。店主即給他寫有店名燈籠。劉行到小北門，繫繩樹上拋過城外，見着守城卒吸煙談天，他即施放炸彈，隨着綠繩而逃。黨人早知巡警教練所同志很多，且可靠，故在事敗之後，很多跑到教練所去。所長夏壽華見着，事急智生，即盡將教練所學生制服取來，向到着的黨人說，「你們還不快些穿好軍服去出巡嗎？」黨人聽見，立即領悟而改裝，扮作巡警學生出巡，分別出險了。

當時黨人大多數是沒有辮子的，第二天，軍警見着無辮子的市民便拿，於是一般無辮子的青年，都不敢出門。那時我是在花地的培英學堂讀書，已經剪

辦半年，只得與其他剪辮的同學躲在校裏。好在只有三數天便取銷捉拿無辮子市民的命令，然已失了幾天的自由了。

## 卅二年前巨浪中的泡沫

廣州三月二十九之役，革命黨雖然遭受鉅大的損失，——各省精英殉難的七十二人——然黨人志不少懈。經此一役之後，革命聲浪，更加震盪全國的耳鼓。黨人們再接再厲轉而謀在武漢舉事。不到半年間，武昌新軍工程第八營左隊熊秉坤首先發難，用「同心協力」四字做口號。號砲一響，竊踞了中國二百六十七年的胡清專制政府的命運，也跟着崩潰。當時起義所有的軍械怎樣呢？民十三年，總理在黃埔軍官學校開學的訓詞有說：

「武昌起義，結果是成功。推到當時的情形，是怎麼樣呢？當在武昌漢口的革命黨，總共還不足三百人，真正革命黨不過幾十人，所有的槍，都沒有子彈，臨時到處搜索，只得到兩盤子彈，一共不過五十粒，革命黨分到了五十粒子彈，便在城內的工程營中發難。城外的砲兵營，立時響應，……革命黨只用幾十個人去打兩萬多人，可說是用一個人去打五百個人……」

這種苦幹精神，是古今中外各國兵法中所沒有的，只有革命中，纔有這個

創例。我們現在趁着雙十節，申述辛亥革命中幾段有趣味或者是外間不大知道的史事來談談。

黃克強是怎樣到漢口去

武昌起義，黨中的幹部要人，都不在場，弄得羣龍無首的狀態，於是有人注意到新軍協統黎元洪來。當着黨人們到黎的住所邀他出來，黎那時不在自己的寓所，是避到一個屬員的家去，終於給黨人們尋着，逼他出任都督，否則槍斃，來安定軍心。黎不得已勉強答應。那時黃克強由香港到上海，但滿吏的奸細四布，行動不敢過于冒險。恰值張竹君女醫師率領赤十字救傷隊，由上海出發漢口，和黃氏事先商妥，喬裝隊員。徐宗漢女士也偽裝護士，隨同出發。果然溯江而上，都得瞞過。在夏曆九月初七日，安抵漢口，全軍將士聞着，都大感振奮。在此補述黃氏在黨中的威名，當民十二年十二月，總理歡迎各將領演說詞中，曾有說及，如云：

「再者諸君都曉得黃克強的威名，是以欽廉革命起的。他在欽廉革命，是

用什麼武器呢？那個時候，我們在安南，到處和他買槍，今日買三五枝沙維治，明日買幾枝曼里霞，東湊西湊，然後纔得了雜槍二百多枝，每枝所配子彈，最多也不過二百發，他帶了這點武器到欽廉，便和龍濟光、陸榮廷、打了幾個月仗，後來雖然失敗，但是他奮鬥的精神很大，實在令人佩服，所以他的威名大振……」

當黃氏未到漢口時，劉家廟、大智門陣地相繼失陷，漢口也不守了。黃氏到後，率隊渡江，與清軍馮國璋血戰四晝夜。當時黃氏是用革命黨資格來號召各軍，督師無名，雖各方都受他指揮，但發施號令，是沒有地位，那時大家纔主張推舉他做戰時總司令，以專責成。在九月十三日，黎和黃并轡到閱馬廠，好像劉邦拜韓信故事，登台拜黃氏爲戰時總司令。黃氏即日組織機關，和清軍相持將一月，各省乘機先後起義，人心所向，虜運告終。

### 張季直因固執而辭職

南京政府成立，南通張季直（謇）出任實業總長。這位「狀元公」，平日主觀

很强，當他第一次晉謁總理時，他自告奮勇要辦鹽務，他自陳對鹽務有精詳的研究心得。總理答他革命完成的時候，鹽不抽稅，以利民食。他聽着便不高興。等到政府因借債小事，他即藉詞提出辭職，說了許多怨懟的話。雖然總理親筆去信和胡漢民又寫信給他說明個中原委，他還是悻悻的固執而不諒解。這位「狀元公」的脾氣，無怪有人說他是「南通土皇帝」。就在他逝世後，胡適之評他是「失敗的英雄」，顧名思義，也可以推想他的個性和思想了。

不過他在清室退位的時候，也盡過一點努力，外間所知道的說優待清室條件，是他和趙鳳昌主稿，名義上是如此，事實上這篇東西和清帝退位詔，都是諸宗元（西湖的蘇曼殊墓碑記，也是諸所撰的。）起草，即張季直吳昌碩二人晚年的詩文，也有許多是諸氏代筆的。說到優待清室條件的文稿，又要聯想到葉恭綽來了。

### 辛亥革命時的葉恭綽

葉恭綽在交通系中，是龍（龍建章）虎（葉字譽虎）二將之一。他三長交



通，一長財政，一長鐵道，爲人精幹而有計劃，博覽羣書。個子不高，因終年絕葷，面帶微黃，但寫字說話，都很有精神。當優待清室條件草稿到北京的時，清室隆裕后對於「第八款，原有之禁衛軍歸中華民國陸軍部編制」一條，表示不滿意，恐怕將來禁衛軍解散，發生意外。爲了這條字句，弄得滿朝大臣，都無法提供意見。等待了兩天，梁士詒向葉氏談及，葉說這是容易之事，就在原條文下，加上「額數俸餉，仍如其舊」幾個字提出會議，大家贊同，電徵南方意見，得覆同意。於是優待條件，雙方訂立。爲了這一條文，已耽誤了清室退位遲了四五天了。

袁世凱藉口北方兵變不肯南下就任臨時大總統，於是在北京就職，照例是要向參議院宣誓，他的誓詞：

民國建設，造端百凡待治，世凱深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滌除專制之瑕疵。謹守憲法，依國民之願望，斬達國家於安全強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樂利。凡茲志願，率履勿渝。一俟召集國會，選定第一期大總統，世凱即行告退。謹掬誠悃，誓告同胞。

這篇誓詞，是由葉氏所撰，一字沒有更改。怎知信誓旦旦的袁世凱，後來食言而肥，竟然背誓叛國而稱帝，真非當年葉氏所料及得到的了。

### 胡漢民布衣任都督

廣東的宣佈獨立，前後兩次，第一次，是在九月初八日，九大善堂，七十二行商各團體等在愛育善堂集議，共同主張承認革命軍政府，全城歡動，齊樹旗幟，張燈鳴炮慶祝。同時總督張鳴岐接到上海的來電，有「京陷帝奔」四字，知道大勢已去，無法挽救。後來發覺這電是假偽的，即圖最後掙扎，派人四出扯去旗燈，出示禁止，因之人心騷動，謠言四起。各屬民軍，紛紛起事，諮議局乃順從民意，議決立即宣布獨立，與清廷脫離關係，還舉張鳴岐爲都督，龍濟光爲副都督，定十九日實行。張龍知道環境已非，難以立足，星夜分別逃遁。於是各團體再舉胡漢民爲都督，未到任前，由蔣尊簋代理。

胡漢民，原名衍鴻，前清時曾中舉人。我說他布衣任都督，並不是說他沒有功名出身布衣，而是說他就任都督之日，身上所穿的是布質衣服，不是絲織

品，也不是毛織品。他從香港到廣州就職，照一般常理，他可以選購幾套新式西裝衣服。可是他還是不減本色，保持純樸的黨人生活，穿了平日的布衣，就來接任大都督職事。當時這種革命黨純樸的精神，是可以佩服的。

### 斑駁迷離的團體

各省反正以後，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的，莫如大小團體的靛立，分子複雜，土豪劣紳，貪官地痞們，都靠他做掩護。於是一般腐（惡）化分子，搖身一變而成爲愛國志士。靠此交結官場，抵擋民衆的反對，且利用社團做工具，希望望在縣、省、國議會選舉的時候，可以奪取政權。由此一來，社團之多，真如過江之鯽。只就上海一地而說，也有八十多個，廣州有一百十多個，雖不絕後，也算空前。那時辦團體的職員，胸前襟章，掛着十個八個，緞綢的也有，洋布的也有，銅銀的也有，五光十色，隨風飛揚。因爲有些出風頭的投機分子，一身而兼十多個團體，什麼會長，社長，理事，董事，幹事，主任等職，聚於一身。東也開會演說，西也開會通電，忙不開交。最奇怪的，有些社團且

備有一塊長方形木板，寫了「請衆鼓掌」四字，準備顯要們到會演講時，演到某一個段落，宣布員把這塊木板向着聽衆一搖，台下掌聲如雷，跟着發響了。這種強迫鼓掌的舉動，不知是誰作俑，真是豈有此理。

社團的加入，手續簡便，只填一張入會書，繳納兩三元會費，即發給襟章一個。因之諸色人等胸前掛有襟章的，觸目皆是。好像身上沒有襟章，是不時髦，不愛國，甚至反對共和似的。我親見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太婆，拖着一個五歲左右的孩童，身上都掛了襟章去開會。由此類推，辦團體的搜括手段無微不至，投機分子好虛榮的人們，布滿各階層。

不過這個怪現象，只有三四個月光景，便如秋天梧桐樹葉，隨風飄落了，不然的話，社會受害更深，影響人們的思想很大啊。

餘音

南京政府成立，分設九部，每部有總長次長各一人，現在還健在的，有外交總長王寵惠，內務次長居正，交通次長于右任，教育次長景耀月等。各省都

督現存的，有山西閻錫山，安徽柏文蔚，江西李烈鈞等幾位。北京第一屆內閣人員，目下存在的，只有陸徵祥，王寵惠，王正廷，施肇基等幾位而已。如果能够請他們追述些當年的史事，必定更多珍奇的逸事。

曹亞伯，在民國十六年，因有感觸，寫了一部「武昌革命真史」，敘述兩湖革命的經過，怎知出版未久，即給吳×漢呈報當局，說他只是鋪張日知會的績功，而抹煞其他革命團體的勛勞。結果，全書禁止發行，出版的中華書局，虧損很大。而曹氏也於民廿六年冬間逝世了。現在這部書，坪石的中山大學圖書館參考室，和我的滬寓紅樹室，各還藏有一部，當作珍本看待了。卅二年雙十節前夜寫於重慶上清寺畔。

## 辛亥革命的側面故事

辛亥年秋，武漢起義，推倒滿清，建立民國，至今已三十多年了，把當年目擊的瑣事談談，也可以供給編列野史的一種資料吧。

一、外強中乾的炸彈 當時民軍起義，各兵士多手提白布手巾所包的一個牛奶罐式樣的東西，鄭重其事般拈着。外間的人都說他炸彈，軍隊裏的人，也自認這是炸彈。其實呢，一百分之九十九是偽裝的，只是一個香烟（牛奶）罐子藏些砂泥而已。那時我參加康軍的隊，感覺這樣偽裝，太過兒戲，就條陳主管的設法去找圓形的大型電燈泡，偽裝炸彈。因為萬一有了事件，一個電燈泡拋在地上，砰然一聲，震動人們的耳鼓，利用他是真空，且有玻璃碎片飛開，較之沙泥罐頭，實勝一籌。果然找到了幾百個。有一天試驗，在郊外拋放兩個，聲震山谷，遠近傳聞，都說康軍的炸彈，實在厲害。怎知也是假的，而是我所弄的玄虛的呢。

二、千奇百怪的襟章 反正之時，政治機關也好，軍隊也好，政黨也好，

團體也好，都是急時抱佛脚的，把白洋布裁剪成長約五寸闊約二寸半來做襟章，寫了機關名義，佩者姓名職務。再鈐上一個印章便是。絕不同今日有分軍政學三種式樣的銅質徽章。過了十多天，有些感到白布不好看，有些辦團體的也想出新花樣來歛錢，於是絲的綢緞紗各種質地，紅黃藍白紫綠各色都有了。還有在上面繡了兩支旗子，五色繽紛，異常奪目。用會員納費的等級，來定襟章顏色與製作的精粗。因此一來，機關的襟章，也有跟着官階等級而定他的質料色素了。

三、草叢離披的頭髮 民軍起義，第一件與民更始的，就是男子一律要剪去辮子。爲了這，除了少數早已剪辮，沒有辮的底子形式之外，其他臨時剪辮的，頭上四周光光，中間露出一二寸長的辮根，頭髮披散，如秋天亂草。也有保守辮子，不肯剪去，把辮子捲在頂上，戴帽遮着來做偽裝。也有迷信的，事先選擇吉日，拜祭祖先，然後剪除。更有聯合多人同時剪去，燃燒爆竹，舉行公譙來慶祝的。式式形形，無奇不有。清軍入關，強逼明人剃頭留辮，當時有許多人不肯剪辮，而做道士。截至現在，還有保留頭髮不肯剪辮的，可說是異

常頑固，死而不變的人物了。

四、參差複雜的旗幟 各省民軍舉事，所用旗幟，絕不一律，已有專書敘述，今不再贅。而當時的民衆，也紛紛的懸旗表示更新，有用青天白日旗，有用九星旗，有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但旗的長短闊窄，沒有一定，旗的質料也多不同。且多加掛一支白布旗，內寫「慶祝五族共和」，「民國萬歲」，「獨立萬歲」，「還我自由」，「脫離胡虜專制」等字樣。惟當時還沒有「擁護」，「打倒」，「實現」等名詞，然而大小街上，旗幟招展，紅的白的藍的，隨風飄揚，煞是奇觀了。



## 史堅如口供的紅痕

史堅如烈士的殉國，是在前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公元一九零零年）的九月。那年黨人們有過幾次的舉動，第一、是在上年的冬天，畢永年領着兩湖的哥老會首領楊鴻鈞、李雲彪、辜天祐、辜鴻恩、張堯卿等數十人到香港，陳少白介紹他們和廣東、香港的洪門會首要相會，大家志同道合，加入興中會，一致公舉總理爲總會長。第二、總理應李鴻章函約，由橫濱率中外同志到港，協謀廣東獨立，但李猶疑不決，故沒有結果。第三、鄭士良奉總理命在惠州起義，因軍實不繼，敗散。第四、是史堅如謀炸兩廣總督德壽，被逮殉難。第五、楊衢雲在香港給粵督派人暗殺身死。還有唐才常在漢口舉義，事洩被逮身死，秦力山在安徽大通響應也失敗了。這一年，革命運動，在粵港鄂三地，可說是熱烈的活動的了。

史堅如烈士被捕後，美教士尹士嘉牧師因他曾在基督教會學校格致書院（嶺南大學前身）讀書，天姿聰慧，好學不倦，特前往保釋。怎知未到之前，

史烈士已供認一切，絕無半點隱諱，表示大丈夫敢作敢爲的光明態度。這一張供詞，是寫明「光緒二十六年九月十三日」。後來辛亥光復，供詞原稿，由毛文明在南海縣檔案中尋出，轉交高劍父。劍父以這張供詞，是由縣署書記筆錄，雖有史的指模和埋炸藥布置的地圖，但當時爲着環境關係，筆記的自然有些不盡不實和掩飾的話雜入。然而這種珍貴史實，又不忍把他湮沒不彰。於是製版發表「真相畫報」之前，因利乘便，隨手就把紅油墨潑在供詞上，使一部分不妥的句語，給油墨所掩沒。外間不知原委的，估量是史烈士的血跡所渲染，那時猜錯的了。這一段事實的經過，是當事者高劍父對我談的，特把他揭布出來。

## 民初悍吏陳景華

民國元二年之交，廣東有悍吏陳景華，他的施政方針，正如他死后墓銘所說，「強項之令，猛以濟寬」的八個字，蓋棺論定，實在恰當。

陳氏，字陸達，香山人，是前清的舉人出身，曾任廣西桂平縣知縣，恰值粵督岑春煊招撫劇盜陸阿發，陳氏知陸盜野性難馴，設法置陸於法。岑責陳不聽命令，擅自殺戮投降盜魁，下令撤職查辦。陳身為縣令，變作階下囚，捕他的因屬同寅，待他很好，估不到他在深夜間，私自逃脫。明晨，他的牀口，還放着一雙鞋，蚊帳下垂，怎知他已鴻飛冥冥，遠走香港。轉赴暹羅，充當報館主筆，加入革命運動，努力宣傳排滿工作了。

這樣一來，他的轉變，是由滿吏處置不得其法的結果，其實他做縣令時，嚴廉幹練，是屬能吏的。岑春煊任粵督，懲辦貪污，固是敢作敢爲，但有時操之過急，意氣用事，有些事都辦理失當，不能不說是「公子脾氣」。當時岑有混號「癩三」，顧名思義，可知他的性情了。

陳於民元前二年返香港，在韋寶珊的行裏當買辦，同時對於革命工作也很努力。當時同盟會南方支部的通訊處，就是借用陳的行裏郵局信箱代收郵件的。劉思復謀炸李準不成，被判歸原籍香山監禁，也由陳氏設法疏通而得釋放。辛亥年秋，廣東光復，陳氏出任警察廳長，革故鼎新的期間，百端待理，把廢敗黑暗的清政澈底推翻，而施行理想的新政。加以各地民軍麇集，祕密黨會的分子，公開活動，民衆團體新成立的，如雨後春筍，不下一二百，名目紛歧，各標宗旨。整個廣東省城，像一所糝漆未乾的房子，偶然有些不當心，便弄得一場糊塗，不可收拾。陳氏在這個混勢時會登場，維持地方公安，不用說，是一個苦差。然而靠着他的天稟才幹與特殊職權，把這個非常時期的省會，辦理得井井有條，地方能够平靜，百廢興舉，確是革命黨人獨有的才幹。現在雖然相隔了三十年，他的政績，還是給開明的市民們所感念的。

陳氏處事，事多躬親，要是他的精神時間所許可的事，必定自行判行辦理，不肯假手他人。甚至公文也多自己主稿，而布告之類，開首即敘述事實，不用「爲布告事」等套語，文字顯淺，讀的易於明白。有一次，他出布告，開

首即說，「景華以殺人著，夫人皆知，無俟多說」。如此措辭，雖不絕后，亦算空前了。

警察逮捕犯人，他要集中由警廳審辦，多數是由他親自鞫訊，如果犯人以上堂受審，逢着他怒目申飭的，此人多可薄懲釋放，恢復自由；反之，如果他是苦笑點頭的，此人必判槍決。按之警律，警廳沒有殺犯權，但在當時是非常時代，都督府給他特權，犯法的不必呈准，即可斷然處置，便宜行事，只須事後呈報備案可了。故在當時有許多鼠竊狗偷的地痞，或是扒手剪綹的慣匪，秘密社會的暴動分子，恃勢凌弱的暴徒們，給他饗以「蓮子羹」（粵諺，被槍斃爲喫蓮子羹）的，不可勝數。在有一個時期，槍決犯人，行刑前，給犯人一枝強盜牌香烟。因此，強盜牌香煙，一時無人過問，大家以吸此煙是不祥的徵兆。當時下層社會，有一個秘密組織，名叫「百二友」，黨徒穿着白鞋綠襪做記號，招搖過市，殺人越貨，無惡不作。有一天，黨徒聯祭黃花崗。陳派員僞裝攝影師，替他們拍照，說是永留紀念。腦筋簡單的黨徒，不知緣由，列隊合照。怎知這張照片，就是后來警廳「按圖索驥」與對照殺犯的最好材料。不到

幾十天，橫行市面的「百二友」，已先后同歸於盡了。

陳氏每天除了在警廳辦公或是開會的時間，要是有餘暇，他好便服出外查訪，或到分區署去，或到公共場所，或巡查崗警勤惰，或詢市民對警政的觀感。不帶衛士，往來自由。因之署長警長們做事，刻刻留心，不敢有些馬虎，敷衍溺職。故那時的警政，因他賞罰分明，公正廉潔，在全國中是比較有朝氣的善政。

廣州在前清的時候，市街多設有木閘，設置更夫巡邏，有些地方，每到黃昏，便把街閘關閉，只留一柱的容積，暫供往來的側身出入，等到晚上九時，則非屬本街內的商戶店員，更夫是多方推擋，不予通過，且把閘門緊閉加鎖了。陳氏感覺此種陋習，不特妨礙交通，有事故發生，如火災捕匪，都遭受阻隔。而且省會警察林立，偵緝四布，還有商民自行設閘，僱夫守衛，實在反映警察不能够維持公安的表示，給予主政的重大侮辱。於是下令全城內外街閘，限於三日內自行僱工拆卸，過期不拆，即由警察強迫執行，除將材料充公，并將該街值理究辦。商民守舊成性，初則反抗，請願收回成命，后知不允所請，

只得遵辦。然而商民們的心理，實不諒解當局的苦心。

陳氏又感到市內廟宇充斥，毫無用處，爲了化無用爲有用，應該改做公共場所，福利市民。商民恐怕廟宇從此給官廳沒收，便把廟宇改爲街坊集議所，門額改塗孔子廟，希期捧出孔仲尼招牌，來抵擋警察廳的命令。怎知陳氏得着情報，各廟宇雖然改爲孔子廟，而廟裏偶像，還是以前的一樣巍然陳設。他就一聲不響，突然嚴令各區署派警把各孔廟內的非孔子偶像，悉數的搬到九曜坊教育司署門前空場，搭架陳列，男的女的，紅臉的關羽，黑臉的玄壇，歸併在一起，煞是奇觀。

有一次，有某團體開成立會，主事的不向警廳呈報開會日期，逕向都督府請求，并請令知警廳屆時派警維持會場秩序。陳奉到公事，不特不照辦，而且制止這個團體集會，說他不應該不直接向警廳依法申請，反而越級向都督轉令辦理，實在藐視警廳，目無直接主管機關的特權。某團體主事者以開會通知，早已送發，報紙廣告，又經登出，一切籌備就緒，遽然流會，實在丟臉，派員向都督府疏通。當局知陳氏素性，未予允准，只得囑他改期，逕向警廳陳請。

后來，陳氏竟批復要他們在凌晨五時半開會，六時半散會，這是惡作劇的處置。因爲時值隆冬，五時半還沒有天亮，且朔風凜冽，砭人膚骨的呢。

廣州在反正以后，即禁絕公娼，過了些時，社會喧傳弛禁，一般承餉商民，多方探聽運動，因託陳氏的堂弟出面，想着承辦花捐。這位堂弟久知陳的脾氣，借故婉言的探詞。怎知他已識穿了來意，便破口大罵：太不識相，我們家裏的人，世間幾許的正當職業不去幹，而要去喝淫水，做龜公，真是頭等忘八的下流行爲。義正辭嚴，那時這位堂弟，只恨地下沒有洞子，否則馬上鑽入去，來掩飾他羞慚滿臉的尷尬面孔了。

廣東也曾禁止白銀出口，每人離粵，只可攜帶五十元的規定。陳氏每逢星期六，多乘輪船到香港去休息，星期一早船返省。有某輪船，每次對他附搭，招呼妥當，帳房中人，和他也很習熟。怎知有一次，警察在這船的帳房，查出逾額的毫銀。船上司帳的自恃和廳長相熟，這一天又屬週末，陳氏恰已登輪，準備往港。司帳的竟向陳求請免予置議，保全面子。陳執法如山，絕不徇情，當堂命令警察帶廳照章處罰，倘若多事再瀆，嚴行查辦。司帳的聞着，無話可



說，只得遵辦。陳氏的公私分明，不顧情面，往往如此。

陳氏主持粵省警政，將有兩年，他的功績，還有一件，至今的人們還能追思樂道的，即他創辦女子教育院。事因有一天，警察帶回一個被主人打傷的婢女，名叫麥喜。陳氏見着，立即變他平日赫赫威儀，動了惻隱念頭，傳問一過，即命警醫調治，給以衣食。好言撫慰，無所不至。一面通知各善堂值理。籌辦女子教育院，來安插拯救無數被壓迫的婦女。怎知開會時，竟遭所謂善長仁翁的冷嘲熱諷。陳受了刺激，憤恨交并，決意自行辦理，就擇定花地因事被封的黃大仙祠做院址，尅日組織就緒，聘請教職員開辦。同時通令所屬，如有發見或自行投到被壓迫虐待的婢女，妾侍，童媳，尼姑，幼妓等，一律送院收容，分班教育習藝。幾個月之間，即收有數百人。出地獄而登天堂的婦女們，重見天日，得受教育，實在夢想不到。但娶妾蓄婢的富人們，莫不說他是苛政。有些報紙，也諸多惡評。可是事實勝於雄辯，外國報紙刊物，一致頌揚。廣州運動會成績，教育院學生又得了幾個錦標。西關開辦幼稚園，該院派生前往實習，幼稚生中竟有一小童，是該生當日爲婢時的主人「少爺」。該生受了教

育，充任保姆。有一次送小童返家，舊日主人，不敢叫她婢名，而稱她爲先生。院中主事的知道有公開招請各界參觀之必要，期望有心社會事業的人士，共同負責合作，擴大辦理這福利事業。新聞記者參觀之后，交相稱譽，一反從前誤會和抨擊態度，推許陳氏是萬家生佛，被壓逼婦女的慈航寶筏。

陳氏的創辦此院，一意孤行，掃除環境一切險阻艱苦。當他起草緣起時，開首卽說，「中國女子，苦人也，初而育之，教則缺如，女子而至爲婢，則并育且無，何有於教，人權剝落，儕於非人，……」看他這幾句話，便知道他要拯救那些弱質無援的女子了。當他撰寫時，與徐院長談話，口講手寫，眉飛色舞，十多分鐘寫了幾百字，完稿卽跟着說，「生平有此一舉，死也沒有遺憾了！」怎知他的慘死，是和辦理教育院真有關係的呢。天之夢夢，人之憤憤，還有什麼可說。

二次革命失敗，黨人執政的，盡數離職遠去，廣東執政的黨人，只有他不肯離粵。第一，他感覺自己年來做事，都是替地方維持公安，正直無私。第二，他因教育院接辦的人，還沒有妥洽，不忍使數百已受年餘教育的婦女，無所歸

宿。正在和基督教會女教士磋商接辦中，死神也緊緊的跟着他。天道難知，人心叵測，便在民國二年的中秋晚上，給粵督龍濟光非法槍決了。

原來二次革命失敗之后，舊勢力蠶起，一般土豪、奸商、買辦、劣紳之流，爲着陳氏的施政，給他們不利，妄跑婢逃，心實不甘。今有機可乘，豈肯放過。於是羣向袁世凱獻媚造謠，集矢誣陳氏。袁爲誅鋤異己，討好紳商，密電龍濟光就近嚴辦。龍接電后，假借賞月爲名，請陳氏到督軍府歡叙。陳不虞其他，毅然前去，寒暄幾句，龍即出示袁電給陳看。陳知事已到此，申辯也無濟於事，只叫給他白蘭地酒一瓶。飲畢，龍嗾使衛隊，如電辦理。第二天公布，社會譁然，惟在軍閥淫威之下，道路以目，敢怒而不敢言。而教育院的數百女生聞着，如喪考妣的悲痛，絕食哀悼，撕被單，做孝服，設位弔祭，守禮盡哀。繼任的潑婦院長，無法訓導，不久，便將各生解散，除由原主人領回重做妾婢之外，其他無人承領的，則按年歲大小與面貌嫵妍而公開買賣。因之自傷身世的，竟有跳樓自殺，不肯再入牢籠。把清白的婦女，當作雞狗般論價出沽，這是軍閥的秕政，也是人類的恥辱。

陳氏死后，家人爲之購棺收殮。詎料廣州全市的棺材店，一律拒絕出售。

陳氏家屬不得已轉向沙面洋商選購西式壽器來用。原來陳氏執政時，爲了統計市民死亡率，和防範奸人假託運棺走私或運軍火，圖謀不軌，於是令飭全市棺木店，如有出售棺木，必須登記死者姓名，年歲，籍貫，寓所，及病症，死因等，按週彙報，俾有查考。那些壽器店老闆，感到麻煩，視做苛政，聯合罷市反抗。陳氏做事，素來澈底執行，絕無轉圜餘地，立即布告限令全市壽器店，兩日內復業，以利市民，不然，即作抗命論，永遠不准復業，由警廳另從別地購運公賣。棺商知道無法違抗，大家纔遵辦。有此一段惡感，等到陳氏殉國，棺商便看做報復的最好機會，因此就發生拒售棺木的事。然而棺商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致陳氏遺骸運到香港的時候，再買上好棺木，把西式棺放在裏面，好像有棺有槨般，安葬在香港咖啡園墳場，立碑造像，供后人們憑弔。

陳氏死年，還不到五十歲，如果有機會給他執政多幾年，造福社會，相信真是不少。可惜軍閥暴戾，紳商腐惡，不知好歹。致使他不得其死，實在可哀可歎。至於陳氏本人對於施政，他也知道有時操之過激，違背那些守舊遲鈍不

事進取的人們心理。但是「處亂世用重典」，是不得已的手段，無可避免的過程，他適當其衝，就做了耶穌第二，上十字架了。記得潘達微組織新劇，排演「聲聲淚」話劇，請他題詞，他寫了「天地不仁」四字給潘，自己的署款，姓名之上，先寫「世界罪人」四字，聯成爲「世界罪人陳景華」，看他的題詞署款，便可以見他憤世嫉俗，把改造社會爲己任了。

陳在廣州，主持警政，將有兩年，省會警察廳長，在二十多年前，一般人都視做「肥缺」，可是他身后蕭條，喪葬費用，是靠人壽保險費來開銷的，可見他平日的廉潔。他的別署是叫「無恙」，他的如夫人是叫「莫愁」，怎知無恙而有恙，莫愁而有愁，也非他倆意料的所及。然而在他本人說，已經是成功的。果然，在他死后十多年，一般舊部僚屬，集資替他在廣州修築紀念物。那麼，人生終有一死，爲了主義而犧牲成仁，浩氣長存，千秋萬世，共同瞻仰的。陳氏雖死，又何曾死呢？民賊如袁世凱龍濟光之流，纔是死有餘辜的呢。

蘇曼殊蓄意槍殺康有爲

這是沒有多少人知道的一回事。

民國十八年，陳少白到上海，住了幾個月。有一天，我們談天，無意中談到蘇曼殊出家做和尚的故事。他說得很詳細，他說：當胡清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公元一九零三年），某日，忽有二十歲左右的一位青年，拿着馮自由的介紹信到香港中國日報來見我，這一位青年，就是蘇子穀。我就留他住在報館裏。和他談話，訥訥不能出諸口，很謙愿似的。問他何故由日歸國。則說俄國進兵東三省，逼迫清廷簽訂新約，留日學生組織青年會，實行民族主義，起來抗俄運動。同時組織拒俄義勇隊，從事實際工作，留日學生多數贊成參加，正在蓬勃進行期間，給滿清駐日公使所干涉而停頓，因此便回粵等語。子穀在報館住了幾個月，除吃飯時略和同席的微微點頭之外，很少和人家談話。其他的人見他這樣孤僻，對他也少理會。有一天，忽有一人到報館來訪他，自稱是他的父親名傑生的。子穀聞着，竟避匿不見面。少白乃勸他跟從父親返鄉，他也

不聽。原來他的父親聞着子穀返港，特來接他回里，并替他完婚，因家長早已在鄉間代他聘婦了。

過了不久，子穀忽向少白借用手槍，問他原委，他說要去槍殺康有爲。原來湖南湖北哥老會首領金龍山堂龍頭楊鴻鈞，騰龍山堂龍頭李雲彪，前因唐才常勤王軍事失約接濟，流落香港，貧病交迫，知道康有爲向華僑籌有鉅款，回港居住，大肆揮霍，交結英吏，於是到康寓，請求接濟。怎知康有爲不特不接見，反而嗾使守門的印差強把楊李驅逐。楊李心甚憤恨，把事情經過，告訴少白，少白給他們一些款去療養醫傷。再過幾時，楊等重到康寓理論，也給英兵印差無理毆傷。大動公憤，理論到華民政務司處。結果，康氏因此事也要離港，這是後話了。

在康有爲詩集裏，有一詩題，是：「居香港英輔政司駱乞通華文能論中國事頻來慰問請茶會索詩港督卜君存問殷殷派警士廿人保衛夫人贈畫感謝并呈」，這時恐怕就是楊李索款時期之前，看他詩題所叙，驕矜自滿的誇耀，也反映出康那時的自視是無上寵遇了。

但當楊李被康寓門警毆傷受辱的消息，傳入子穀的耳鼓後。這位沉默寡言萬事不理的蘇子穀，忽然義憤填膺，要去槍殺康有爲，替國家社會清除奸惡，爲革命志士舒一口氣。少白勸他不要這樣妄動，因爲手槍是有槍照，絕對不能借給他人。要是有一事故發生，領照的和擔保領照的，都要負直接責任，故無論如何，不能夠借用。至於康有爲的悖謬，只好另想辦法去對付他。而且香港地方狹小，警探四布，如果發生暗殺案件，兇手也難逃脫。子穀聞着，纔半晌無話，最後長歎一聲，來結束了這一段借槍談話。

由此看來，子穀激於義憤，槍殺康有爲，雖然沒有成爲事實，然而他的鋤奸心志，也可以見到了。

少白跟着并順談到子穀出家做和尚的經過。有一天，子穀不別而行，大家都以爲他失蹤了，因爲他在香港幾個月，很少出外，每天只有看看報紙來消遣，港九道路，他是不清楚的。大家不見了他，都替他迷路擔心。怎知過了數月，他穿了僧服，外罩坎肩，回到報館，精神疲倦異常，訴說落髮出家的經過。他離開香港，即過九龍，步行到東江的惠州某地的古剎。這間小寺，破爛荒



涼不堪，距離鄉村很遠，沒有寺產，師兄弟二人，每天要輪值到附近一二十里的市村去募化，又要斬柴挑水，纔能够度日。要是天公不造美，連日下雨，那就隨時有斷炊的危險。瓜菜還可以自行種植點，糧食則無地可以耕耘，因此生活異常艱苦，實在捱不下去。於是乘着師父師兄出外募化，就攜取了已故師兄的度牒和小洋兩角逃出，沿途問路，步行了四天，纔得回港。自離開寺門後，至今沒有喫過一口粥一啖飯。口渴腹饑時，只在路邊取點水喫。現在腹如雷鳴，望快些給我食物吧。

少白知道他餓了數天，不便即給他飯菜，恐他不能勝食，馬上派人去買點稀飯回來給他喫。過了四五個鐘頭，沐浴更衣休息一下之後，纔一同晚膳。

子穀出家回港後，又告訴他的法號是曼殊。過了不久，離港去了，一去無蹤，隻字也不見到。過了三四年，郵局寄來印刷品，拆開來看，是他在雜誌報紙上發表的譯著和詩文，文字流暢，富於情感，天才濬發，品格極高，和寓居香港的期間，判若兩人了。

這些話，聽來也有十多年了，掠影流光，也不完全記憶得到，有些是模

糊了，然而當日所談蘇曼殊的故事，大體還能記得些，把他追述出來，如以上的所記。

## 四大寇中之陳少白

新會陳少白，與總理、楊鶴齡，尤列四人，同屬初期革命同志「四大寇」之一。氏本名聞韶，字葵（一作夔）石。提倡革命，因避滿虜耳目，易名白，字少白。身長玉立，丰姿俊美，票性聰穎，才思敏捷，詩文歌賦，琴棋書畫，無不精通。當他與總理在香港西醫書院同學的時候，曾和總理拜盟爲兄弟，總理生平對同志稱吾弟的，只有少白一人罷了。他的年紀，比總理少了四歲。

少白是嶺南大學的前身「格致書院」入校的第一人。原來基督教的北美長老會哈巴牧師在美國籌募鉅款來華，想着籌辦一所高等學堂，本定在上海設立。少白的父親子橋聽着這個消息，於是聯合粵籍紳耆多人，聯名致函教會的主事者，請哈巴把學堂在廣東設立，因此格致書院在廣州城西開辦。一八八八年成立，少白遵從父命，入校讀書。在民國六年，少白曾把他的家書，加註原由，送給嶺南大學，永存紀念。

少白生平服膺他的鄉先輩陳白沙（獻章），他的易名白，別署少白，就是一個例證。他曾題新會南門的楹聯，「嶺南理學無雙士，封內山川第一城」，便可以見他景行維賢的心志。他每次替他的姪輩寫條幅，多錄陳白沙的遺教，如「忘我而我大，不能求勝物，而物不能撓。富貴貧賤，威武而無以動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於外物，不累於耳目，不累於造次顛沛，鸞飛魚躍，天機在我，知此者謂之善學，不知此者，雖了無益也。」他的思想怎樣，也可知了。本來他是開國元勛，但是他在廣東反正之後，只出任過一次外交司長，便即謝絕政治生涯，從事航業，組織粵航公司，為收回航權的第一聲。民十，曾一度任總統府顧問，其他則沒有再事參加政治活動了。惟對故鄉外海新建設事業，如開闢鄉道，禁烟拒賭，建設市場；開辦念夢學舍，來紀念他的父親子橋和季父夢南，這些都可以表示他對於鄉村的建設。記得他和友人的詩有云：「卅年湖海老風塵，且憊前因且造因。有願還須入地獄，成功何必在吾身。時求引證思談佛，自課工夫不為人。休管悠悠善迎合，獨留面目本來真。」淡薄名利，不想做官的思想，活躍於行間字裏。雖然革命黨人對於破壞之後，而

忽略一設，本來是放棄責任，但是士各有志，明白自己的才幹能力，而另向別一種事業來努力，也未始不是分工合作的辦法。

革命黨約有宣傳定期刊物，要算公元一八九九年，少白奉總理命在香港籌辦中國日報爲起點。他的命名的由來，是取「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的意義。這一家報館，他的使命，不只是宣傳排滿，做革命黨的喉舌，而且是南方革命黨策劃的總機關。不獨同情革命的人所愛讀，即反革命的滿清軍政當局也愛讀，可見得他的重要性了。少白對於文字宣傳，固然很努力，同時又組織振天聲劇社，提倡民族主義，第一次演出的「熊飛將軍」劇本，是他所編寫的，內容是描寫宋遺民東莞熊飛起兵抗元，轉戰榴花橋的故事。

民國十八年，總理奉安首都，他親自入京參加，他到上海的時候，住在東亞旅社，我們常常談天。有一天，他把作好輓總理聯給我看，聯云：「失敗云乎哉？行道期百年，唾棄小就，力赴大同，雖在顛沛中，彌留中，未嘗少懈。」流風今未已！入世垂世載，驅策羣雄，招徠多士，爲問真知己，真同調，究屬阿誰？」我說：「這副聯不獨情文并至，而且身分的當，恰如其人。」

只有孫先生當之無愧，其他任何人不合用。還有如陳先生與孫先生的關係相知，纔配說得個中深切的話。」隨着我們談到蘇曼殊的出家，他詳細的告訴我，曼殊出家及欲槍殺康有爲之經過。

少白當年從事革命運動，和史堅如烈士之妹憬然三姑道合志同，極爲纏綿情愛。三姑曾在廣州博濟醫院習醫，對於同學異常謙摯。有一次，天寒上課，因爲講室沒有生火，改在手術室授課。怎知手術室椅桌不多，同學有爭座位的，三姑卽把自己的座位讓出，坐在地上，用手帕墊着作筆記，她的度量如此。史堅如殉國，她極感傷，身體從此衰弱，因用冷水調牛乳吃，中着虎烈拉菌毒而逝世，年僅二十二歲。遺骸葬在廣州東郊三望崗的教會墳場。少白深痛三姑的歷助革命，壯志未酬，遽然去世，又念及既已訂婚，未及合卺而鴛鴦分離，在公在私，都有無限悲愴。於是親撰墓銘勒碑，永留紀念，詞云：一雄心脈脈，寒碑三尺。後死鬚眉，爾塋爾宅。國人欲復，哲人不歸，吾族所悲，異族所期。玉已含山，海難爲水。蹇蹇此躬，悠悠知己。天蒼兮地黃，春露兮秋霜。胡虜兮未滅，何以慰吾之國殤。生於一八八一年辛巳，終於一九零二年壬寅，

共享年二十二」。哀感頑豔，情辭悱惻，至今讀了，使人不禁有兒女英雄的感慨。

少白在初期革命運動中，曾經和康有爲梁啓超們幾次的商洽，想要把革命黨和保皇黨合作，他在自著的「興中會革命史要」裏，敘述得很詳細。

寫至此，偶憶馮自由的「革命逸史」敘述「陳少白之詞章」裏有說，據少白所談，在乙未前讀書時期，一日自香港赴廣州，同舟有鼻懸眼鏡而蓄鬚之長衫客，自稱李杜復生，謂當向客前題詩獻技，一顯身手。於是蹀躞衆中，哦聲不絕。旋得句云：「萍水相逢未有期」，良久不能廢續。衆敦促之，則作色謂詩以思慮久而愈工，非不通文墨者所能置喙。少白至是不能復忍，乃起而言曰：「先生佳句，久不廢續，容小弟代爲續貂，可乎？」於是吟曰，「憐渠顧鬚學吟詩」，乃指其鬚曰，「鬚鬚八字成官樣」，復指其長衣曰，「三尺咁長光棍皮」。（廣州土語之咁，卽這樣之義。又粵人恆嘲長衣爲光棍皮。）長衫客羞慚無地，連聲「小子荒唐」不已，舉座爲之大笑。從這一段逸事看來，少白的才思敏捷，和幽默諷刺，兼而有之，也可見一斑了。

少白擅口才，和人談論，每鞭辟近裏。文字寫來，也警闢透澈，興中會初期缺乏寫作人才，所有宣傳文字，多出少白手筆。光緒末年，兩廣總督岑春煊宣佈把粵漢鐵路收歸官辦。粵路股東一致反對，岑捕黎國康下獄，惹起大風潮。香港方面的股東，組織團體向滿廷反抗，名爲「粵路股東維護路權會」，這會的文字和計劃，多由少白主持。少白的筆墨與設施，深得港紳陳席儒楊西巖等所佩服，故特聘少白任這會的顧問。中國日報本來好挑剔滿吏的虐政，用來鼓動社會反對清會，有此特殊機會，作口誅筆伐最好的題目，怎肯放過。於是此次的護路運動，結果很佳。少白的策劃，功績也不少。不過港紳等當日曾許輔助中國日報，但是報館到了缺乏經濟的時候，則食言而肥了。這是港紳過橋抽板的詭計，不必多說了。這些經過，革命逸史裏面，評論很詳，可以參考。

少白於民卅三病歿北平，享年六十五歲。



## 亦禪亦俠的潘達微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黨人失敗，收拾七十二烈士屍骸，合葬於黃花岡的，是潘達微。潘氏在虜燄方張，危疑震撼之際，從容不迫，收拾黨人遺骸，設法安葬，當時保皇黨的機關報——國是報，特地把這事揭發，想着掀起波瀾。潘氏知這事難以瞞隱，便在平民報上披露經過，標題是：「諮議局前新鬼錄，黃花岡上黨人碑」。本來黃花岡舊名紅花岡（與今之另一紅花岡不同），又名臭岡；潘氏以「黃花」二字較「紅花」來得渾厚，故改用黃花岡，遂成定名。

潘氏在廣東反正之初，同志舊友，多已登場作新官兒，他却從事新劇運動，想在社會教育工作方面，有所效勞。即和同志們組織劇社，排演「聲聲淚」話劇，反映社會的暗影，諷刺深刻。陳景華特寫「天地不仁」四字贈給他。過些時，他任廣州孤兒院長，「幼吾幼」來盡他的心志。二次革命，黨人都離粵，他也亡命上海，充某富人園丁，逃避龍濟光的緝捕。他爲發洩內心的苦悶，在

民八的時候，編印「天荒」畫報，圖文并重，質與量都可說是出版界的空前刊物，章太炎、廖平子、王秋湄、梁冰絃、孫仲瑛、柳亞子、黃晦聞、劉三、龐樹柏、太虛、黃賓虹、姚茫父等，均有著作。他在序文裏曾說：「余性嗜哀，度復艱難，居恆邑邑，鎮日不寧，調脂抹粉之餘，無非在悲哀之境。似醉非狂，度日如年。是歲，苔香（丹按：苔香即王秋湄）顧我，小樓春雨，相對黯然，同是恨人，誰能遣此！語及故舊，益用悽其。吾生如是，吾友亦如是，爲之嗚咽不已……」看他這幾句話，便知他那時的心境了。

他爲着體驗社會的病態生活，曾有一次喬裝叫化子，遠行數縣市，過他沿門託鉢的生涯。人間世的酸苦辣鹹的味兒，他嘗透了。他感到人生無常，萬有空華，便潛心佛學，走到九華山的叢林裏去皈依釋迦牟尼，過他的居士生活。

爲着振興實業，提倡國貨，他有好幾年間在南洋兄弟煙草公司服務，擔任設計和美術工作。後來又却不過同志的相邀，一度出任廣州市的公益局長，曾條陳振災、善後、剿匪三策。當局沒有採納，又因爲性情不近於行政，只是曇

花一現，便又辭職，專心致志他的藝術了。

他生平嗜好的藝術，是攝影和國畫。他的攝影作品，在世界攝影展覽會，曾經得到國際的獎勵。

繪畫呢，筆法清逸拔俗，畫如其人。記得民國十七年秋間，他到上海，將要離滬返香港的前一天，王秋湄約了幾位朋友替他祖餞。他這一天高興極了，連畫了六七張畫，我得了三張。一張是「歲寒」，寫松竹梅三友，後來潘氏逝世，柳亞子題詩於上，詩句是：「畫師騎鶴出紅塵，畫筆長留太古春。莫話黃花岡上事，幾人能保歲寒身？」是有感而發的話。一張是和易大菴合作的「青山紅樹」。大菴即席題詩云：「天涯何處無紅樹，辛苦家江不忍歸。帆影空濛渺無際，灘聲憔悴病誰依。燕支要寫離人淚，繭紙寧甘居士詩。幸侍冷公尊者坐，一鉤一筆愛如絲。」（詩中所說冷公，是指達微。達微別署冷殘，又字景吾，號鐵蒼。）并跋云：「冷公將南歸，秋齋畫約，丹林屬題此幀，乃與合以。離懷如海，不覺在言」等語，還有一幀，墨筆的「秋山霽雨」。惲南田所說：「歛浮氣，待思靜專，然後落筆，方能洗脫塵俗，發新趣也。」他的作品，就

如南田所說的一樣，真是胸無塵滓，閒逸有生氣。故得着的，無不珍同拱璧。

他在民十八的秋天逝世，他本來有肺病，到了這年，更加厲害了。延到秋間，藥石無靈，竟然撒手塵寰。臨終之前，還寫病梅一張，和用血畫觀音像，這可說是他的絕筆了。在梅幅上，題有七絕四首，是他最終之作。詩云：

一、殘年底裏感酸辛，雪壓霜欺老病身。料得江南春不再，落花凝淚傍慈雲。  
二、花落花開寂寞春，調羹往事恥重論。榮枯閱後真無味，悔向塵中此問津。  
三、天涯掩淚病難支，心血都成畫上脂。莫問羅浮春夢事，至今重說尙迷離。  
四、玉笛無聲五月過，一花一葉奈愁何？淒涼欲證前身月，證到前身又怎麼？

在字裏行間，充分表露出了他洞澈生死的要旨來，「詩言志」，可見得他的修養了。

潘氏的老友孫仲瑛，在潘氏歸道山之後，曾有感悼語，我們看了，也可以知道潘氏「亦禪亦俠」的行誼。孫云：「余交達微，垂三十年，每於出入生死患難顛沛流離之頃，而迹逾密，情愈結。當吾二人少年嶽奇磊落，憂國若癡之情緒，往往託於荒涼怪誕，哀傷幽怨之作以出之。蓋達微善畫，予好爲詩，彼有

所畫，予則題其上；或予詩先成，而彼畫之。畫就，二人相視大笑，拍案叫絕，人目爲狂，不顧也。達微嘗作「月下游魂圖」，託於女鬼乩筆。予效女兒書跋於其端，荒山游魂，幽怨獨絕，觀者神飛肉顫，初不知吾二人故弄此狡獪也。達微精通禪理，課誦至勤；中歲後披剃受戒律，邀遊名山大川，畫乃大進。上追荆關董巨，下亦不失爲清湘石谿；以四王易流甜俗，不足學也。予屢索畫，達微輒漫應之，嘗謂予曰：『非有佳構，不足以酬老友；雖然，必有以贈子。』建國十八年春，予客白門，達微忽以書來。發書，無隻字，僅畫二幀：一仿范華原，一仿八大，各極其至。逾兩月，而達微坐化於赤柱山。訃至，予驚且歎曰：『嗚呼！一畫之微，達微亦不肯背信有如是乎？』……」潘氏的品節志行，從仲瑛的話裏，可以知道一般了。

丹林按：「月下游魂圖」，曾印在「天荒畫報」中。「赤柱山」，爲香港的別名。

## 總理的一位師友楊襄甫

番禺楊襄甫（榮鎰），他和 總理的知交，是在師友之間。中國日報在香港開辦之後，許多黨人或同情排滿運動的人，都好到中國日報聊天，談論時事，楊氏也是座上客之一。楊氏兄弟們，都是研究舊學很有根柢的，同時又走一條慕的一途。楊氏加入基督教，說來也有一段因緣，他本是開當店抽大煙的，對於中國舊學而有精深修養。有好幾次，有人向他宣傳基督教，都給他根據中國的古代哲學，駁得傳教士啞口無言。怎知有一天，他在廣州的街上走路，忽然暴雨驟至，就順便走入一間福音堂避雨，那時恰值遇着區鳳墀（即 總理在倫敦被難，寫長信給他的一位，是 總理的漢文教師。）無意中即和他談起教理來，由此互相研討，不久，便加入教會。戒除鴉片，把一切原有事工丟棄，專心致志於傳教工作。他的認識 總理，也就由區氏的紹介而來。

楊氏雖然和革命黨人往來，而他本身沒有實際的從事革命，但直接間接間，却輔助革命工作不少。當着前清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年），興中

會首次起義，廣州之役失敗，總理和陳少白，楊衢雲，鄭士良們，相繼出亡。當離開香港之前，楊氏和左斗山特爲寫信紹介總理於三藩市中西日報總理伍盤照。請伍氏念同教之誼，鼎力照拂。可是這次總理是先到日本的橫濱，再轉檀香山，沒有到三藩市，故這封信沒有用到。等到癸卯（一九零三年）的冬間，總理由檀香山乘船抵三藩市，關員登輪查驗旅客護照，見着孫逸仙名字，說是中國亂黨，應暫留船上聽候訊問。不久，即羈留碼頭的木屋，和外間斷絕交通。這個原因，是保皇黨員的反革命行動，希期靠此向滿會邀功。

總理因居木屋幾天，經移民局訊問結果，竟被判令出境，候船回檀香山。

總理忽在無意之間，見着同鄉某甲所看的中西日報，有總理伍盤照等字。便聯想到前幾年楊氏和左斗山的紹介信來，還存在行篋中。馬上設法託人按址送遞。伍氏接讀是楊襄甫左斗山的親筆信件，立即向各方活動，結果，總理得以安全入境，自由行動。故楊氏對於革命功績，有如此的關係。後來，民國元年，總理交卸臨時大總統職務，返到廣東，廣州市各宗派教會聯合舉行歡迎大會，在仁濟大街的禮拜堂（這間禮拜堂，是在博濟醫院毗鄰，總理在博濟醫院學

習醫科時，是常到的教堂。開會，這一個空前盛大的集會，當主席的就是楊氏。因爲在那時，教會中人，和總理比較的稔熟，而且又屬德望崇隆的，首推楊襄甫牧師，故此楊被推爲主席。

過了些時，楊氏的門生陳振先任農林總長，特請他北上任參事。因爲他平日對於治河很有研究，治河和農林業有關係，故他暫辭教會的職務，北上任職。袁世凱知道他是基督教的老學者，幾次約他談論教道。可惜袁氏別有見解，雖然楊氏幾次的忠誠勸導，言者諄諄，聽者還是藐藐，枉費了他一番的說教。幾個月後，他感到北方官僚氣氛的污濁，也就不耐煩於苟全，便辭職回粵，還是在倫敦會（後來改稱中華基督教會）宗的禮拜堂充當牧師。

景教（基督教的前名）在唐朝，已傳入中國，當時是叫做景教，陝西出土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他在光緒二十一年，就著作了一本「景教碑文紀事考證」，考訂得很精詳。

他對於諸子和理學都有心得，甚至三教九流，醫卜星相，也很精通。他在通志學校，協和神學院等擔任比較宗教學，中國哲學史，天文學等，引經據典，



說得頭頭是道，尤其是對於老子、墨子、莊子等，心得較深。對於佛學，道家兩門，和基督教比較他的得失，更令一般神學生有深切的認識。有時授課，許多西籍的牧師，也來旁聽。因為他是不泥古，不薄今，不迷信，不盲從，事事要從理智做骨幹，屏棄主觀的傳統的思想。從他研究的，莫不心領神會，澈底了解。

有些人見他的起居服用，有點紳耆派頭，就說他「官派」。是的，他每逢出外，必定坐轎子（那時廣州的馬路未開闢）長衫馬褂，帽啦，鞋啦，他弄得整潔非常，在普通人看來，是特殊階級。他自己也不否認，因為他晚年不愛步行，步行對於時間也不經濟，故出入必乘轎子代步。

他的演講，極能動聽，但是非有專科的程度，有時聽了不容易領會。因為他好引用古書，或外國的哲理等。他說，演講一小時，事先要準備十小時的資料，分析，比較，綜合，就要化費不少光陰。每逢請他講演，最快的要在兩星期前預約，否則，他是絕對不答應的。

他在中年時，好學不倦，上海江南製造局和廣學會出版的圖書，他都瀏覽

過。卽後來，文明、商務、中華等書局出版的哲學、科學等書，他也選買來讀，是一個手不釋卷的好學老人。

他有潔癖，寓所中一切器具圖書字畫，莫不安置得井井有條，一塵不染。他的教導子女，在慈愛之中有嚴厲，卽如喫飯的筷子、湯匙、小碟、飯碗的安放，以及拿筷子的方式，敬客的禮儀，入席離席，飲茶斟酒等，無一不在家常便飯中實習。要是有些不對，初次勸告糾正，第二次再犯則斥罵，第三次呢，卽命中止喫飯，以示懲戒，絕不姑寬的。

他不愛上館子，要是請親友喫飯，必在家裏請客。他的夫人烹調牛肉，是有祕法，美味適口，故必有炒牛肉一盤。有一次，他請總理喫飯，也是有炒牛肉一味。總理喫過之後，贊賞不置。說是生平在歐美高等餐室，喫過牛肉不少，都沒能和他比擬。楊太太的烹調牛肉方法，也可知了。

## 四川黨人吳山的生平

談到四川的初期革命黨人，我們不要忘却了一位吳山。吳山從事排滿、倒袁、護法、北伐、排日的幾役，盡過很多力量。他的姓名，已經從他在民國廿五年逝世之後，和他的肉體一樣沉銷，不復在人間世顯現了。一個革命志士死後湮沒不彰，是十分惋惜的。爲了這，就讓我來申叙一下，盡了個人的責任，聊慰故友在天之靈吧。

吳氏，是四川江津縣的中白沙人，原名平之。少有大志，在鄉中讀書，不滿足他的求知慾望，順江東下，投入張之洞辦的兩湖書院讀書。後來感覺這間書院，雖屬標榜新教育，而一般學生還是脫不了借保清忠君的幌子來做獵取富貴的階梯。於是轉到上海，選購廣學會及製造局所出的新書，回到故鄉，潛心研究。一面聯絡志士，從事排滿工作。爲了參加革命，在清末曾給滿吏抄家懸捕。好在他事先得了消息，星夜逃脫，跑到甘肅去，暗中活動革命工作，可惜因環境關係，收效很微，

民國成立，他到故都，從事新聞事業，眼見袁世凱的獨裁專制，排斥民黨，就在報上大肆攻擊，引起國人的注意，而給袁氏的爪牙視做眼中釘，威逼利誘的夾攻，他不得不走了。到了東三省，辦理稅務，但是感覺太無聊，祕密回天津，幹倒袁運動。又給袁的鷹犬偵得，發動軍警到他寓所圍捕。他在四面包圍之中，從容不迫，假裝來賓，由前門大踏步而出。他的胞弟承之同住一室，就代替他做了階下囚。被監禁了兩年，得了精神恍惚的神經錯亂症。後來出獄，跟着他名爲做事，實則由他就近照料生活而已。

吳氏由天津逃到東京去，一面參加革命工作，一面入明治大學法科讀書，借此機會以求深造，準備返國時服務國家之用。那時和他最接近的是謝持。袁氏的帝制傾覆，他回北京，和吳敬恆們辦理勤工儉學會和留法預備學校等，同時也辦出版事業。護法之役，他南下廣州，任大元帥府秘書。徐謙任司法部長，他任司長，不久，署次長，代理部務。軍政府改組，總理返上海，委派徐謙代表出席七總裁的政務會議。不久，徐氏北上，任天津北京的益世報主筆，次長謝持也離開廣州，由他代表總理出席政務會議。在廣州的幾年，國內政

治、軍事、黨務等，變幻得極劇烈。國外呢，第一次歐戰結束，蘇聯新興，等，都影響人們的思想很大。他在公餘，常應各團體的邀請，演講國際問題，遠東問題，力斥日本就是遠東的第二德國，提醒國人的注意。這些演辭，是由他的書記筆錄，吳氏託我替他編纂訂正，和海軍陸戰隊總司令鈕永建的演說詞，合印一厚冊，叫做『救國的根本問題』，分送國內外各機關團體及有關係的人物。出版不久，駐廣州的日本領事奉東京命令向軍政府抗議，說這本演講詞，破壞中日的邦交，侮辱日本天皇，應即道歉毀去，否則發生其他事故，應由軍政府負責，並保留交涉一切權益等語。怎知道日本領事送來公文交涉的第三天，軍政府也因政治變動而變動了。後事如何，不得其詳。

軍政府在粵，有游離分子和北政府勾結起來，一部分國會議員便決定到四川集會，一部分政治的人轉到雲南去，想在川滇間，另組織新機構來反抗北方的毀法羣醜。吳氏便到昆明，他認識唐繼堯是從那時起。爲了種種關係，川滇都不能合作，獨樹護法大旗，便各奔前程，分途奮鬥。他在廣州和上海，先後著述『俄憲說略』，『中國委員制政府組織大綱』，『大同人約』三書。這三本

書，在今日的研究政治的人看來，似乎是「四不像」的作品。因為他的政治知識和思想，有點和現代化國家的實際脫軌，但在當時他已盡了他頂大的努力去嘗試發揮，給國人架好一條橋板，跟着去研究改良而至實行，如後來所行的委員制，就是一個例子。

他儘管是不厭求詳的解釋蘇聯的憲法，鼓吹委員制政府，提倡烏托邦般大同世界。可是他本人的思想行事，恰恰和他的著作相反。因此在民國九年春間，蘇聯共產黨派威經斯基和楊明齋（山東人）到華，籌組共產黨。在上海曾和他商談，請他出來擔任籌備工作。他馬上拒絕，且向他們兩人教訓一番呢。後來到了民國十六年，跨黨分子在上海把持市黨部的時候，他却被市黨部把「腐化分子」的帽子加在他的頭上。等到清黨之後，他的黨籍，纔得恢復。

他六十年的人生生活，多數是流蕩式，做事比較長久而生活較安定的，要算從民國十年冬間起至廿三年，在上海辦理中華全國道路建設協會的時期了。這個道路協會，本來在民十秋間，王正廷在上海和旅滬的英美人士發起的。初時負責主持的是一個美國留滬的新聞記者索克斯。後來王氏感到改良中國道

路，而由外籍的人去辦理，實在玷辱國體，貽笑國際。因思吳氏在滬做腐公，平日做事也很負責，所以特請他擔任總幹事職務。經過雙方暢談之下，他便出來主持，一連做了十多年。今日國內各省公路，四通八達，飲水思源，我們不能够忘掉十多二十年前道路協會廣事提倡促進的工作。自然，吳氏和幾位幹部人物所耗的精神心血；是不少的啊。

吳氏不獨在文字上宣傳路政，且在民國十七年至十八年，出任西北和河南省道辦事處處長，從事主持實際的修路工作。鑿通兩谷關，便利行車，他認為這是平生最得意稱心的建設呢。雖然有人譏評他爲什麼不繞道而定要破壞古跡，他是不管的。

在上海辦理道路協會的時候，有兩件事值得一提而不能忽略的，一、是他努力熱心地幫助旅滬的高麗人，尤其是和韓國政府有關係的志士，要是他們有給日領干涉、逮捕、驅逐等事件發生，他必定各方奔走去營救，使他們脫險獲得自由；如果入籍中國的，他便做保證人；如果有志願學習陸軍或航空，他必紹介到昆明去；生活困難的，他就四處張羅的來接濟。因此韓國志士和他往來很親

密。二、是「九一八」瀋陽事件發生，東北義勇軍紛紛投袂而起，他在上海，和朱慶瀾、殷汝驪、許冀公、陸丹林、薛篤弼、黃琬等十多人，籌組華僑救國經濟委員會，從事籌募，接濟東北各路的義勇軍。成立數月，先後募得三十多萬元和糧秣被服無算，盡了國民的職責。辦公的地址，就在道路協會。

他在道路協會任職的時候，除了直接間接幫助本黨同志策劃革命工作和輔翊韓國同志排日之外，至於其他政治工作，尤其是北方政府的人員，除了團體的公事之外，私人間絕無交際，只是專心致志在提倡公路。即民國十六年，北伐軍克復江南，鈕永建任江蘇省政府主席，事前革命軍沒有到江浙的時候，他已參加機要的了，等到南京底定，鈕氏請他到京，他不要名義，站在同志地位，幫忙了一個多月，便回上海，繼續他的道路協會工作。後來有些朋友勸他從政，他也婉言推辭。

他晚年的思想，有點轉變，他於民國七八年間，在廣州軍政府司法部任職時期，因研究基督教理有得，即在中華聖公會受水禮加入教會，聖名「旨成」，是取義耶穌教訓門徒的祈禱文「爾國臨格，爾旨得成」的意義。徐謙在廣州上海



等地提倡「基督教國會」，他和鈕永建都是幹部人物。鈕永建駐軍黃埔，每週舉行播道會，他也常常的去宣教，即在廣州附近的縣市教堂，他也不辭長途跋涉的去布道。但是在他晚年，思想復古，只看曾國藩家書。性情固執，精力日衰，無法擔任繁劇工作。因此，弄得內外交逼，不得不辭職而到江蘇的茅山休養。在農村裏熱忱地從事著作，把以前眼見耳聞日本高麗和我國東三省的實況，來做寫作材料，比之道聽塗說自然真切得多。可惜這數萬字的文稿，只公開發表了三分之一，其他餘稿，因他一死，便不知丟到何處去了。

他從事革命工作三十年，素來不標榜自己的功績，且縮食減衣的熱心幫助同志。他的同鄉某甲，近年貴為部長，但在十幾年前流落上海，還向他借貸過五十元，有借無還。又有某乙借他的金錶去當，聲明五日內贖還。據我所知，這兩人都滿不在乎的自己走入糊塗帳裏去了。平心而論，吳氏思想，缺乏一貫，無可諱言，但他對國家，對民族的熱誠愛護，反侵略，反強權的正義感，那就硜硜自守，至死不變。這一點，是革命黨人應有的人格與骨氣。

他逝世時，享年六十一歲。女公子坤平，畢業中山大學醫科，公子永襄，

畢業復旦大學商科，次女坤瀛也在中山護士學校畢業。續婚徐澄，生一子，名永孝，聞還在上海居住。

當他逝世之後，上海有幾個團體，聯合替他舉行追悼會時，我曾寫了一聯悼他，文云：

往事記從前，東沙路上，黃浦灘邊，廿載相知承獎掖。

思公行自念，茅麓場中，吳家巷畔，一朝永訣總欷歔。

此聯是寫實之作。我和他相交，是在廣州市東沙路軍政府和在上海同事若干時。他死在丹陽縣申振綱主辦的茅麓農場，安葬在上海市西郊吳家巷的上海公墓。

## 蘇報案鄒容的收屍者劉三

劉三，原名季平，別署江南劉三，是江蘇上海縣的華涇鄉人。前清光緒年間，留學日本，入成城學堂，習武備的騎科。歸國之後，執教鞭於浙江陸軍學堂，陳其采王鯤徙等都是他的門生。光緒廿九年，新教育各地翹立，他和他的堂兄劉東海和費公直、秦毓鎰等，在他的故里，創辦麗澤學社，校址即在他的住宅，是養成革命基本人才爲主旨。是年六月，上海蘇報案件發生，不久，鄒容在獄中病死，收屍的，就是劉三。劉氏把鄒烈士遺骸，暗運回到自己的家鄉，埋葬黃葉樓旁。辛亥起義，漢族重光，政府追贈鄒烈士爲大將軍，修墓表旌，永垂千秋。章炳麟所撰鄒大將軍墓志銘裏，稱許劉三是義士。這個尊稱，是根據龔自珍「送劉三詩」所說：「劉三今義士，愧殺讀書人。風雲銜杯罷，關山拭劍行。英年須閱歷，俠骨豈沉淪。亦有恩仇託，期君共一身。」引古說今，可說是推崇備至了。民國十二年，于右任氏在陝西三原解除靖國軍總司令職事，返抵上海的時候，有一天，約同李根源，章士釗，張繼，馬君武們到

華涇弔祭鄒烈士。同時劉把墓志銘的拓本，分贈同志，來做紀念，我也珍藏着  
一分。

劉三寫字做詩，都很有功夫，他的書法，篆隸行三種，寫得很好，尤其是所臨的石門頌，獨擅一時。在北京大學任教授時，他的潤例，是和沈尹默合訂的。金梁曾託我代求他的隸書對聯，後來金也篆書「文章今子政，書法古晨翁」十字聯句來答謝他。他的大女公子劉緝，家學淵源，也工書法，寫的是石門銘體，可惜不幸短命逝世了。

他好飲酒，酒量不亞於劉伶。據他說，也曾飲過二十三斤酒，而沒有一些醉容。他除了生病之外，每天吃飯，都必飲酒。不過他的飲酒，和普通人有些不同，他是要自己用藥材所浸的纔飲，市上所賣的酒，除了拔蘭地外，很少入口。即便外出赴宴，他也用小瓶子自備藥酒。在家飲到酒酣興會淋漓的時候，便使唱崑曲，或者吟詩來消遣。他的夫人青浦陸繁霜（靈素）也善崑曲，唱夫婦隨，極人間的樂事。

他和蘇曼殊的友情極相好，「曼殊全集」所載的尺牘，有許多信是曼殊寫

給他的。而且曼殊因金錢用盡，常向他挪借。曼殊的詩，如「劉三舊是多情種，浪跡煙波又一年。」又如「多謝劉三問消息，尙留微命託詩僧。」劉三贈曼殊的詩，如「餉君黃酒胡麻飯，貽我白門秋柳圖。總是有情拋不了，袈裟贏得淚痕麤。」便可以知道他倆的交情了。曼殊曾替他畫過幾張畫，如黃葉樓圖、文姬圖、白門秋柳圖等便是。他的黃葉樓旁，種了許多楓樹，他替我題紅樹室圖的詩，末二句有云：「我亦種楓好顏色，定中藉爾慰悽寥。」而在民國八年，于右任氏從三原寄題紅樹室圖詩，開首即說：「江南黃葉近何如，長許人間早卜居。」就是聯想到他。

他在故都的北京大學，上海的浦東中學，持志學院，國民大學，復旦大學等，先後擔任教席，循循善誘，誨人不倦。民十六，北伐軍克復江南，他和陳去病們主持江蘇省通志館。過了些時，監察院設立，他任籌備員，正式成立時，他即任監察委員，一直而到民國廿八年逝世時纔止。死后，國府明令褒揚他的功績。

他的性情，恬靜沉默，不大好講話，但是遇着知己，那就娓娓的談天。頭

髮留得很長。好看電影，好看報紙，即使描寫社會病態的小型報，也愛瀏覽，說是病態社會的人生反映。

他平生詩文，存稿很多。逝世之後，全部遺稿，由他的夫人陸繁霜寄給柳亞子整理。當時我在香港，曾全部看過，洽商準備在香港付印。民三十年冬，太平洋戰事發生後，這本遺稿，安全與否，那就不大清楚了。希望還有副本存在他的家中，不致摧滅燬棄，那就好了。

## 楊雲史阻止兇手行刺總理

常熟楊雲史（圻），人多知他是才子，是詩人。張蔭桓說他的詩，是「獨步江東」，康有為評他的詩，是「絕代江山」，而其他的人們也多說他是吳佩孚的祕書長，極得吳氏的信任而已。但是，錢基博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上便評他「彈冠新朝，猥託攀髯之痛；委身量藩，特負阿諛之詞。進退失據，殊有足爲詩史之玷者焉。」這些話雖屬批判深刻，但不免有黨同伐異是丹非素的嫌疑了。又有些人說他是公子哥兒的生活，中年以後，還脫不了名士風流的習態。如在漢口時與陳美美的一段情史，已膾炙人口，當時的詩，「近來意氣銷沉盡，只畫梅花與美人」，頹廢思想，在字裏行間活躍。這些評語，只是一方面話，都不能夠代表他的一生。他於前清光宣之間，在星嘉坡任副領事時，也曾做過一件爲吾黨的總理維護備至。說深切一點，可以說是脫離總理危險的主動人。事情是這樣子的。那時候總理在星嘉坡從事排滿的運動，清廷就密令兩廣總督派遣兇手到星，伺機行刺。這個兇手抵步後，先去拜訪楊雲史，并因

總理廬所與領事署毗鄰，兇手就住在領署，準備隨時乘機下手。詎料這個陰謀，給楊察覺，感到這樣危險事故，一旦發作，固然中國政治上失了一個領導改革者。即退一步說，對於本身在居留政府下容納兇手，更有不便。於是他就約了兇手在密室曉諭一番。最後幾句話，便是萬一事故發生，你也無法逃脫，我也不能夠卸除唆使縱容知情等罪名。況且孫某，與你無冤無仇，又何必幹此損人而不利己的事呢？若果爲了報銷起見，你即在此另謀工作不必返國，我也可以安插你在我經營的果園做事。這一番話，兇手細想之下，俛首無詞，以爲當領事的都不贊成，爲什麼要去幹那殺人的行爲呢？因此，也就立刻停止了行刺總理的行動了。事後，楊并暗中通知田桐轉知總理，出入當心，免給奸徒行兇。但其自己因屬清廷官吏，職責關係，始終沒有和總理會過一面。這一段軼事，他在香港時親口告訴我。七七事件發生後，他從北平移居香港，他的生活費，都由中央指定人員按月送給他的，直至到他去世後爲止。這雖然是屬特殊救濟費，但他對於黨國盡過功勞，也該有相當的酬報吧。



## 革命的教育家鍾榮光

在中國現代史上，有幾位畢生盡瘁教育事業的，在湖南有明德學校的胡元倬，在廣東有嶺南大學的鍾榮光，在河北有南開大學的張伯苓，這三位所成就的事工，在中國新教育史上佔有相當位置。胡鍾兩位，先後去世，張氏還健在。現在讓我來談談鍾榮光博士生平的概略。

我們談到嶺南大學幾十年的進展史（由格致書院而至嶺南大學），就不能不談到他的保姆鍾榮光了。鍾氏別號惺可，廣東中（香）山縣人，青年時期，在邑內已有才子之稱。前清科舉未停止時，廿九歲曾考中舉人。在封建時代，「孝廉」的身分，已屬特殊階級，即使不求上進，在鄉間也可以充當紳耆的了。但是他自從卅四歲信仰基督教之後，一切思想行動，便和那時士大夫的不同。他的奉教是在公元一八八九年（光緒十五年己丑），替他施水禮加入倫敦會宗（後易名中華基督教會）教堂的，是王煜初牧師（王寵惠的父親）。他人教後，馬上實行三事：一、把中式舉人的執照燒毀，表示從今以後，專修天

爵，放棄人爵，絕不靠「功名」獵取一官半職。二、他實行一夫一婦制，和妾侍鄧主依脫離夫妻關係，供給她學習醫科。三、把婢女鍾愛基釋放，送她入校讀書。這些都可以表示他自己得了新生命，使在家庭中被壓迫的婦女也得到自由。在五十年前，他能如此做法，不能不說他有深遠的眼光，是革故鼎新打破舊社會陋習的實行家了。

他投身革命運動，算來也很早，他在三十一歲，剪髮，加入興中會。在乙未之役後，他在廣州任博聞報的編輯，鼓吹排滿，言論異常激烈。過了些時，便在嶺南學校（那時是叫格致書院）服務，由國文教習而至大學校長，歷時四十多年。嶺南由教會的普通中學而進至由華人接辦（由民國十六年起）的私立大學，其間的進展、計劃、經營、和幾度出國籌款，他的心血力量，貢獻最多。凡是談到嶺大的人，定必聯想到這位保姆。

辛亥秋間，廣東光復，他出任教育司長，對於全省教育，有深遠的規劃，適應新時代的要求。當時一般執政者，都是老同志，所以他在施政上雖然遭受舊派不諒解，但尙能推行順遂。他和警察廳長陳景華很合作。有一次，陳氏把

廣州市內各街的閘門拆除，以便利交通。又把市內的廟宇改爲公共團體的辦事所。商民反對，把廟額改塗孔子廟，想捧出孔夫子來抵擋警察廳長。陳氏得着情報，立即派遣警士，把假託孔子廟內的諸色偶像，完全搬運出來，得鍾氏合作，放在教育司署門前空地。搭架分級擺設，好像八百羅漢的陳列所。使那些守舊迷信的商民，啼笑皆非。

民二，二次革命失敗，他到美國去，入哥倫比亞大學，力求深造，研究教育，那時他已四十九歲了。

鍾氏與總理是世交，本身又是一個改革社會的急先鋒。獻身嶺南學校以後，中途出來兼任教育或政治工作的有四次。如民元的廣東教育司長，民十五任國民政府教育行政會委員，僑務局長，抗戰開始，任國民參政員。但他對於嶺大絕不放棄責任，因爲他把嶺大看做自己的終身事業，不肯因爲參加政治而有點鬆懈或卸責。直到民國廿六年，他因健康關係纔退休，但對校務還是常常的提示董理。

他的待人接物，畢生本着一個愛字，尤其是「無差等之愛」。但對於罪惡，

則絕對不妥協。在他加入教會和入黨以後，即時戒絕煙酒，即有時在外應酬，見着戚友帶有或招喚不正當的婦女同席時，他即托辭離席而去，不管當時的主人是什麼地位。同時他也叮囑他的太太女兒們，赴宴時謝絕和「姨太太」們同席。這些在表面看來，似屬瑣屑，但也可以證明他和罪惡搏鬥的一般。他律已非常謹嚴，公私分明，正如新會陳白沙所說「毫釐嘗壤」，絕沒有一些苟且。他在嶺大數十年，經手款項，總有千萬元以上。但他私人所用的一張信紙，一枚郵票，或者一個書釘，大頭針之類，也不向學校取用。當着民國十年左右，廣州舉辦市政，買賣地皮，風靡一時，他絕不隨俗做投機事業。嶺南大學在廣州河南康樂村，擴充校園數次，毗連的土地，地價相繼增漲。他絕沒有預買若干地畝來牟利。這也可以表達他的高尙志向，不沾沾於貪便宜圖小利了。

他於民國四年，在美洲和鍾芬庭女士續婚，打破數千年普通社會所謂「同姓不婚」的古訓，當時遭受許多守舊的人反對，他却毅然置之不理。他感覺對的事，本着革命精神，想到即做，毫不畏懼退怯而中止。後來此風一開，嶺大學生也有好幾雙同姓締婚，鍾氏曾寫對聯祝賀他的學生云：「家庭大革命，學

## 校小英雄。」

他雖是科舉出身，而寫作文章，却主張用淺近文言，使讀者易於了解，反對古典的餽釘文字，說是違背情理，毫無實用。行路時，必直腰挺胸，精神奕奕。出外必帶手杖戴帽，彬彬有禮，雖七十九歲高齡，還如壯年一樣。在校時，每天和學生一同晨操，每天寫日記，數十年如一日。從這微小之點，可見他做事的有恆，深足爲青年立身處世的楷模。

他在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七日，病歿於香港養和醫院。入殮時，我曾參加致悼。聞得他的病，入醫院調治，已經日有起色，如果好好地靜心療養，當可復原。可是爲了香港戰事，飛機重炮，十幾天日夜不歇地轟擊。他的住所（在藍塘道）和療病的養和醫院，都和跑馬地毗連，附近下彈不少，醫院也被擊毀一部分。他愛國心切，熱血沸騰，處在炮彈的震擊中，市民遭難驚惶失措中。常常慢罵發動戰爭的，終有一天自食其果。事後，國府明令褒揚，嶺大醫學院同學籌建「榮光紀念醫院」，校董會又組織「鍾榮光先生事蹟編纂委員會」，從事彙編他生平行誼及著述。鍾氏高風廣被。定必永垂不朽，又豈只在於嶺南（廣

義的）一隅之地而已。

末了，我們看看他的自輓聯，可以表達他的一生信仰，聯云：

三十年科舉沉迷，自從知罪悔改以來，革過命，無黨助，作過官，無政績，留過學，無文憑，才力總後人，惟一事工，盡瘁嶺南至死。

兩半球舟車習慣，但以任務完成安樂，不私財，有日用，不養子，有徒衆，不求名，有記述，靈魂乃真我，幾多磨練，歸榮基督永生。

又他常替人寫對的聯語，也可以知道他的社會觀和人生觀。聯云：

須知天倫中有真樂，

勿謂世界上無好人。

## 琴書自娛的李仙根

卅二年六月中旬，我到柳州少住，在報紙上看着李仙根在渝逝世的消息，思今念往，不禁有點悽然。

李仙根，名蟠，中山人。早年曾習陸軍，古人有投筆從戎的，而他却棄武修文；雖然奔走革命，從事政治運動，但只是在文的方面工作。對於書籍古董，尤其是廣東歷代先賢的文物，更好搜買珍藏。記得民國二十九年春間，在香港的中國文化協進會舉辦廣東文物展覽會的時候，他用「李氏秋波琴館」的名義，出品有四十三種，自宋迄今，無不具備。他收藏雖然豐富，可是在廣州市和中山縣淪陷之後，已失去十分之八了。文展會開會八天，他天天必到會場欣賞，可見得他對於發揚民族精神的文獻愛戀程度了。

從他感賦文展會的詩，不特可以知道他的感想，且可知道他出品的家藏秋波琴數百年嬾遞的故事。詩云：「懸夢昇平世既遙，故家喬木日蕭條；楚庭風雅垂垂絕，南海珠塵黯黯銷。人事漸隨時勢換，古魂銷向異方招。尋常一物關

興廢，我抱秋琴閱四朝。」并跋云：「秋波古琴鐫『戛玉鳴金』四字，相傳爲楊誠齋故物，但不可考。後爲勝朝益藩藏，初歸小欖盧氏（盧本潛，天啓進士，先後掌諫垣，奉命策對益植兩藩，著桐封集），再歸先太祖釗山公拾月山房。公精音律，秋波琴爲公常御，傳家三世。至道咸間，爲邑勢家強奪以去。先伯祖蔭田公有『秋波嘆』一紀之。先嚴達廬郡丞公，更有遺言，以先人手澤，宜子孫永寶也。至二十四年乙亥，始從邑紳繆鳳羣鄭重璧還，蓋以流落近百年，易數主，琴音亦久失矣。」看他記述琴的史話，秋波琴流播世間，固已明白，即仙根本人是書香世家，也可以見了。

說到「二十四年乙亥，……鄭重璧還」，當中也有一段因緣的。仙根曾兩任香山縣長，一任粵漢鐵路局長，抗戰後，國民參政會成立，卽任參政員。而這琴的傳播，據傳盧本潛的女婿，就是仙根遠祖李釗山。釗山妙解音律，盧遣女出閣時，就把這琴作粧奩。釗山之子菊水有詩名，香山縣志有傳。歷數代至蔭田，在清咸豐初年，因田產給強族所侵，得同鄉何某的斡旋，纔得平反，想予厚報，謝不肯受；只請借琴玩玩，從此久假不歸。蔭田礙着情面，沒有索



還，於是作「秋波歎」詩來抒寫慨歎。臨死，遺囑家人，後世子孫務必設法把琴取回，九泉下纔沒有遺憾。仙根的父親達廬思琴心切，着人用木製成琴形，挂在廳牆，表示不忘。及到逝世，也是遺囑仙根兄弟務必設法找覓原琴。民國九年，仙根任香山縣長，何氏已衰落，秋波琴也兩易主人了。得的是小轅繆鳳羣，於是派人和他接洽，請歸原琴，多少酬費，都不計算，沒有結果。十四年，仙根再任香山縣長，重申前議，繆仍不允。二十一年，仙根任西南政務委員，繆氏請仙根提拔他的兒子。仙根提及歸琴，繆面允而不實行。二十四年，仙根任粵漢鐵路局長，繆氏那時入道，所住道院，恰值違法，被當局封閉。繆往求仙根疏通，纔得無事。繆異常感激，即把秋波琴送給仙根做酬謝。仙根問他買價是六十兩，原數給他。他不肯受，仙根送回他玉杯一隻。綜計秋波琴由南宋以來，幾經滄桑，數易藏主，纔歸還李氏。仙根因之異常珍寶。前年冬天，香港淪於日寇，此物又不知在於何處了。（鄧爾雅所藏的綠綺台琴，黃詠雱所藏的天蠶琴，當年均曾在文展會陳列，這兩個唐代遺物，今亦不知安全否？）

仙根工書法，詩也好做，興到時，一天可以寫作幾十首。好在茶居會客，記得他在民國二十八九年間，住在香港禮頓山道的時候，每天早上，風雨無阻，必到鵝頸橋畔的香海茶樓品茗。這家茶館，是下級工商界敍集之所，異常嘈雜，地方也不清潔，他卻處之泰然。他每天早上，在那裏和朋友們談天說地，上下古今，滔滔不絕。他談鋒很健，周旋於各茶客間，一口氣談話兩三小時，也不感到一些疲倦。說到興高采烈時，聲震四座，不知道的，估不到他是久歷政途而且是能詩能書的。於此，即可以看到他是適其所適的了。

他有一「楚庭書風」七絕詩五十一首，吟詠廣東能書法的先賢，自宋代李文溪（昂英）至近代，夾叙夾議的評述。古代的不必談了，今摘錄他評論和革命有關的或屬民族英雄的幾位如下：

晦聞黃節，大有唐人寫經神氣，曾語余云：「我詩不足傳，我書閒淡頗自意。」其然豈其然乎？

總理孫先生，自謂生平未嘗習書，譚組安云：「其書不但似東坡，而往往有唐人寫經筆意，正直雍和如其人，真天廩聰明；凡夫雖學而不能也。」余奉

傳久，尤敬識之。

展堂胡公，功業彪炳，不掩其詩書之名，合褚米成一家，清挺峻拔；晚寫曹全，集字爲詩如己出，真絕詣也。

直勉林先生，爲余書所學云：「初與李烈士文甫同習永興大令，喜學窠大字。及參與革命，更習漢隸，尤喜石門、禮器、張遷、校官、鄘閣諸石刻。」蓋南帖北碑，無不揣摩，以生硬瘦勁爲主。每遭遇艱險，書法必一進。天不與年，造詣祇此，良可惋惜。

史堅如烈士，天姿明敏，字娟秀，不類其人。

湘勤古先生，少習曹娥，晚師吳郡，亦學史晨，規行矩步。

澤如鄧公，不諱少時失學，晚年專學其本家石如篆隸行草，甚得其解。

秩庸伍公。書極沉實。子梯雲，亦能書。

佛成蕭公，詩書畫不學而能，且通梵文，人少知之。

少川唐公，在李合肥幕久，故字頗似山谷。

仲元鄧公，從軍久，三十後極力學書，亦有成就。

陳公少白，楊公鶴齡，書均有法度。仲愷廖公，執信朱公，學有根柢，天姿聰敏，於學無所不窺。朱公寫吳郡，猶是家學淵源，早成馨逸。

劉永福淵亭，民族英雄也。寫虎字獨立。丘仲闕仙根割台灣之役，心事獨苦。黃公度稱其爲一生知己，詩稱雄健，書併蘇黃，餘事相同，氣類可知已。中山南門月山下，有石高十餘丈，大約五尺許，傳成化間平倭都督張通，以戟鉤「迎陽」二大字，字亦尋丈，氣勢雄厚。宋末東莞義士熊飛將軍興兵勤王，戰死榴花塔銀塘山上，有石鐫「榴花銀塘」四字，字七尺許，縣志載爲熊飛書，且評有「亂而復整」語。……崖山奇石，鐫「宋張宏範滅宋於此」八字。「海鏡」榜書，在澳門媽閣廟，傳翁山書。

這些，都是仙根評述黨國賢豪和民族英雄書法的話。而他本人對於自己的寫字淵源，也有自白。如云：「吾家自惺齋公蒼城鐸響後，勉村、釗山、菊水、伯廉公，俱能書，且書必晉唐，隸法以孔廟諸刻爲法。先嚴達廬公少年仍師祖法，晚年自號行素，獨愛懷素書。書啓往來，人多寶之。余承庭訓，漸能點畫；自惟姿鈍，久習而無成。先勾園論書詩云：『邇賢競僞體，姿媚趨流

俗；神通貴瘦硬，心正必端肅。意會手不隨，庶幾遠甜熟。」祖庭良楷。不敢違也。」看他的自述，便知道他的寫字，一脈相傳的了。

民國三十年元旦之夜，簡又文宴請文友於九龍賓園，同席的有楊雲史、楊千里、柳亞子、鄭佩宜、仇儼、許地山、周俟松、仇儼、李仙根、黃般若、陳斯馨，我也叨陪末座。圍爐看畫談詩，賓主盡歡。第二天中午，仙根即書漢隸一聯贈我，是集屈大均壽陳恭尹詩句：「無憂惟作述，有道即功勳。」推許過甚，實不敢當。然而這副對聯，也和其他文物，在港變時一同失散了。回首當年文酒之會，渺不可追，雲史、地山、仙根，先後逝世，其他諸友，也遷播無定，死生契闊，真有不勝今昔之感。

## 懷悼報人廖平子

昨訪馮自由談天，馮氏忽接到曲江來的電報，是廖平子於九月十九日逝世的噩耗。大家聞着，都有無限悽然之感。廖氏，是初期革命努力於宣傳排滿工作的報人，老成凋謝，吾黨英才，又弱一個。撫今念往，不禁有無限的感悼。況且他晚年的獨立崎行，更加使我們深深的佩仰。今者客死他鄉，身后蕭條，爲公爲私，似有申述他的生平行誼的必要。獨是客中追憶，未能及於萬一，有負故人，深感歉懣罷了。

廖氏，廣東順德人，早年和盧信伍憲子三人，稱爲順德三傑。他原名任堅，別署平子，又號平菴、蘋菴。香港中國日報的開辦，他擔任副刊（當時叫諧部）文字寫作，關於小說、劇本、歌謳等文字，是他的所長，不管什麼題目，內容却含有民族性和排滿思想在內，給一般讀者所愛讀。後來，潘達微主辦平民畫報，鄧慕韓警亞兄弟主辦的平民報，他和陳樹人都是撰述的台柱。用輕鬆雋永之筆調，導引社會革命思潮，至今談到香港廣州在清末從事文字排滿工作

的，多知道有廖平子當年的熱忱與努力。

他在報館從事撰述的期間，有時感覺自身的學識不够充實，還沒能够暢所欲言。於是負笈東京，更求深造，同時對於黨務，也努力工作。留東兩年左右，回國照常擔任報館的編撰。果然，士別三日，刮目相看，撰寫文章，更加鞭辟近裏，一篇登出，讀者爭相傳誦，較前熱烈了。

潘達微任廣州孤兒院長，他佐理院務，便把報館寫作停頓，專心辦理慈幼事業，同時潛心繪事。在工作餘暇，瀏覽自然景象，來做繪畫材料。孤兒院是在花地，半村半市，半水半陸的廣州市郊，他卜居於此，時和舟子、漁夫、花婦（花地以出產時花著名），村老們，閒話桑麻，談天說地，這時他的生活，比較的安詳與舒適，他的人生觀也有點轉變。他寫了一篇「西溪閒話」，用袁中郎的筆調，寫得輕靈極了。使人讀了，都嚮願到農村去，享受世外桃源的生活，屏棄塵囂污濁的城市。這一篇稿，是在「天荒」畫報發表的。

「七七」抗戰軍興，他感到我國飛機的缺乏，他大發宏願，寫畫把潤金所得積滿萬元，貢獻國家，作為個人獻滑翔機的一點微忱，盡書生藝事報國的責

任。這種熱願，在藝術界中，是富於愛國家禦外侮的一個。

民國廿七年冬間，倭兵侵入廣州，廣州附近各縣，先後淪陷，他熱血沸騰，放下筆桿，潛回故鄉，發動鄉民，組織游擊隊，出沒無常，使敵僞疲於奔命。敵僞給他堵截暗襲而傷亡的，前前后后總有千餘人。後來，因為沒有接濟，且時歷數月，大家感到非久持之計，纔解散隊伍，各奔前程，另從他方面做抗建工作。他本人呢，寄寓澳門，伏居斗室之中，貧病交迫，但還不減他的雄心壯志。却自辦「淹留」及「天風」雜誌，來做宣傳工具。這一次的所辦雜誌，是開刊物的新紀元。怎樣呢，就是每一冊雜誌每一張畫每一首詩，都是由他親自用筆來寫出（絕不是印刷的），這不是別開生面的嗎。他明知這樣做法，是費時費事；他却耐煩地去幹，他的公子年紀只有十歲左右，也跟同合作。這在抗戰期間，值得提說的一件事。

前幾個月，他從澳門回國，寄寓曲江郊外的仲元中學，還是手寫「予心」詩集，分贈同好。粵省府主席知道他是黨中先進，派員送他旅費千元，他却之不受。在澳門的數年間，天天捱苦，無隔日糧，他處之泰然。絕不向親友告貸分



文，只靠賣書賣文來度日，筆瓢屢空，晏如也。衣服鞋襪，更談不到怎樣的修飾了。惟有對於老友同志們，常有書信往來。他的高標人格，獨立思想，艱苦生活，愛國熱腸，無論遭遇什麼環境，都沒有動搖與變易的，可見得他平日的素養。民國廿九、三十年間，我在香港因公每月必往澳門一兩次。有一次，因為感到和他隔別了十多年，就約他談天，順便請他喫飯，一頓積慆。在飯館點菜時，他硬要由他去點，只選了兩盤最便宜的菜，清湯一盃，白飯幾盞，其他不准再點。否則，他聲明是要逃席，說是不够朋友纔勉強朋友做老饕，他無論如何是要反對的。從這兩事看來，他的取與認真和樸素生活，是安之若素。「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確是大丈夫氣概，也是報人應有的人格。

他近年因營養不足，心力交困，外感內傷，死在曲江。在他奮鬥一生，到了死時，還是清潔，一塵不染，在他本人，來去清白，固也無憾了。但在我們對之，便有無限的悲悼。一個刻苦耐勞，奮鬥數十年，忠於主義國家民族的舊同志，一旦溘逝，在當局的應該如何表揚死者，激勵生者呢。

卅二年九月廿四日寫記

右文寫就，關於平子手寫的雜誌，也順便一說。只就他在民國三十二年三月十六日出版的「予心」第一期來看，已是赤裸裸表示他回國後從事抗敵衛國的艱鉅心志了。「予心」是用毛邊紙，裁成三十二開本大小，連封面及挿圖，共有十三頁。封面「予心」二字是篆書，并寫明「抗戰詩史」，他鈐了「蘋盒」別署的硃章。第二頁，是他所作的墨筆山水畫，題有「山色人千里，笳聲月一樓」詩句；以後各頁，就是他所寫自己所作的詩史，都是與抗戰有關的。他為什麼要取名「予心」呢，他在序文裏說得非常詳細了，文云：「倭奴陷吾鄉時，曾與戰，因器械懸殊，而敗走馬交，草「淹留」四十期，「天風」十四期，皆以詩歌爲抗戰工具。鎗放下，筆可操也。今歸矣，山居寂寂，而精神不忘戰場，遂乃再草此集。屈靈均云：「雖體解其猶未變，豈予心之可懲！」此意也。杜子美云：「無人信高潔，誰爲表予心！」亦此意也。蓋再接再而又再勵，以毋負此生也。是爲序。」

這短短的一百多字，言婉而哀，且含有剛強不屈的氣概。文裏所說的「淹

留」，「天風」，都是他在澳門時所手寫的抗戰雜誌，「敗走馬交」一語，就是說他和敵僞戰後，而退居澳門。馬交，是澳門的別稱。「予心」，是他歸國後繼續「淹留」，「天風」而寫作的刊物，故他寫明「蘋盒個人寫作本」數字，又蓋了「予心」的圖章，可見得他鄭重之至。文字，是表示自己負責的。

「予心」雜誌的詩，真是詩史，當中所記述的，全是他個人所見所聞所經歷的事，使人讀了，不啻身歷其境，可歌可泣，可悲痛，可憤慨的事。也如周身通了電流，受了震動似的。他的文字顯淺流暢，容易領會，全是寫實白描有代性的作品，故讀了感人很深。

茲把他摘錄幾首，一方面可以知道他的作品的一斑，他方面也可以反映出敵僞的暴行。

## 歸國

壬午八月秋，廖子返家國。雖無佳意境，却有好顏色。兩友送我行，恐我難喘息。或憂寇未已，沿途施鬼蜮；機簧入魔手，一彈擬胸肋。或恐家未復，

羣衆無衣食，驟添醬醋茶，比屋求不得。况此霜氣森，風起閭閻里。單衣蒙霧露，倍感蟲唧唧；不如留須臾，免使神魂惻。含情對客言，此語實揣測。應思血氣在，未有甘羈勒。五年困夷境，實感胡兒逼；朝遭碧眼瞋，暮受紅頭抑。知余值倖難，出語尖酸極。謂當歸保護，不然盡誅殛。不自知纖小，遽欲伸羽翼。令人氣愈結，令人愁愈織。奈無肘下劍，誅此西方魃。只恨形勢殊，田旱甘螟螣。迄今機已熟，滯留難頃刻，歸哉復歸哉，歸途我尙憶。

五年羈旅夢，瞬息遇三喪。我弟與我妻，權葬道路旁。更有庶母棺，未得空墳場。未歸魂已斷，歸後彌悲傷。所經閭與閭，什九無衣裳。草頭搜已盡，所賸唯枯桑。桑葉實難餐，多齧肌爲黃。鄰童聞叩戶，怖極偷眼張。疑我已非人，何得返門牆！高聲呼我妹，我妹正傾箱。冀覓幾尺布，換取半日糧。忽聞人叫喚，拭目出簷房。原來乃阿兄，兄何欠健康？言時聲已咽，舉步益徬徨。故園無別物，樹木盡凋枯。還窺閣上書，屋漏痕糊模。不敢出門行，虎狼塞前途。刺取一時影，遂爲千日俘。十里無雞聲，百里聞鬼呼。此境與此態，寧不神爲渝。

無力爲秉燭，骨肉冥然坐。歸來亦偶然，寧得幾時哥。微聞崎嶇山，餘脈不會墮。只因民氣盛，亦遂多瓜果。邛須復邛須，故友多招我。

悽音苦調，寫出離亂人內心的痛苦和環境的惡劣，而澳門葡人的歧視，淪陷區民衆的生活慘苦，也在行間字裏活躍了。還有他的「偷渡」四首，寫述沿途的艱險，等於鬼門關畔的悽厲黑闇，也值得一述的。

### 偷渡

吾母在世時，最畏甘竹灘。謂此波浪兇，心膽不勝寒。每當寒食節，省墓心彌殫。戒我母倉卒，涉足輕急湍。豈意離亂餘，犯此霜霧溥。日間何足道，午夜更蹣跚。扁舟泛鳬鳥，兩岸村落殘。桑麻摧已盡，舉目皆符荏。同舟不許笑，亦不許汎瀾。恐被倭寇聽，彈發神魂癢。我遂如木雞，啞口各相看。

不聞人語聲，但聞擊楫響。忽見樹林內，黑影時三兩。謂汝從何來？送死亦冤枉。舟人殊健者，自答非奴養。不英雄不來，不豪傑不往。不必道姓名，綽號知同黨。彼此已默會，船遂急開放。旁人但咋舌，久復還凝想。

兩岸何所有，頽牆見星星，不知是燼餘，抑或鬼火熒。灘左見龍橋，省墓昔常經。橋畔無別物，樵木新舊停。怪鳥時弄影，啄盡人血腥。寒風偶吹面，天際益冥冥。

炮聲來斷續，生命輕如蓬。舍舟行旱路，禍至天無功。月黑躡山隈，寸步慘不通。現當潦水餘，積淤多毒蟲。刺膚膚欲裂，一陪信慙慙。誰爲覓吾舟？倉皇四顧中。

沙坪復沙坪，汝是自由區，汝是金銀窟，汝是烽火途。性命拚拋殘，乃敢涉江湖。江湖無此險，亦復無此迂。千秋與萬世，留得一聲吁。

我們看了這幾首詩，便知道「予心」內容的一般。還有「沙坪玩月」，「玉橋」，「小駐玉橋鄉雁陣驚寒日斜輒見爲客行第一快意處」，「大沙夜泊」，「喚渡」，「下茅」，「江谷市樓獨酌」等詩，在「玉橋」詩裏描寫那些運貨水客的情狀，如「賺盡千金與萬金，估客依然仰天臥。千金萬金何足論，兩膊猶是雪霜痕。」真是一針見血的寫實話。「予心」出到第五期，他便染病逝世了。

## 感悼革命元老李紀堂

今午走訪馮自由叙談，恰值中央黨部交際科送到李紀堂逝世的通知。我們正在談論革命史稿的材料，談鋒忽然轉到李紀堂的歷史來了。爲了表彰志士起見，特攝錄李氏生平革命史蹟，使後人有所瞻仰，稍盡後死者的責任吧。

說到在民國開國前確是毀家紓難捐助革命運動最多金錢的人，在比較中，李紀堂算是首屈一指。除了他，找不着有第二個人比他捐輸更多的了。有數目可稽的，要在一百萬元左右。這個數目，在三十多年前，是一個很可觀的數目，不是一個小數啊。

他在民國三十年，纔由香港到重慶來。在十月六日晨間，病歿武漢療養院重慶分院，病症是「高血壓心臟病」。他前年來渝的原因，是因爲民廿九住在香港時，有人傳說他有特殊行動。他聽着很不高興。怎知這種謠言，愈來愈兇，使他精神上大受刺激。爲着表明心跡，保存革命黨人應有的光明態度，他不辭舟車的勞頓，到重慶來，共赴國難，就任僑務委員會的委員職事。這種

光明磊落的態度，確是革命黨人應有的抱負與精神，是值得欽佩的。

李氏本名柏，廣東新會人。他的父親李陞，是香港著名的富商，兄弟八人，他居第三。李陞逝世，兄弟各得家產百餘萬元。香港一般富商子弟，多屬驕奢浪漫，事事委之僕役，獨有他對家中瑣事，親自整理。且擅鎗法，獵獸射鳥，百發百中。早年應徵香港義勇隊，充任隊長。不久，任日本郵船公司香港分行華經理。恰值乙未（一八九五年）重陽，廣東黨人第一次舉義失敗，總理與陳少白鄭士良三人乘日郵船東渡日本。李氏在辦公室聞着，欽慕 總理的偉志，特自上船晉謁，表示傾佩。未幾，他的父親去世，他分得遺產百餘萬元，結交志士，揮金如土，後得謝纘泰介紹，與楊衢雲等常談時事，同情排滿運動，由楊氏主盟加入興中會，從事實際的革命工作。在丙申六月，總理策劃惠州軍事，由日本過港，召集黨中幹部人員，舉行會議，陳少白楊衢雲領導李氏上船拜訪。總理歡慰異常，知其傾心革命，壯志可嘉，即派他任駐港管理財務員。八月，惠州三洲田的義師敗退，李氏對於此役所費已不少，加以中國日報經費的拮据，常靠他挹注。他也感到這是黨人應盡的職責，熱忱異常。



因之，總理自惠州之役敗挫后，遊歷歐美各地鼓吹革命，不必顧及南部革命工作的經費的，實靠李氏支撐的力較多。在壬寅（一九零二年），黨人乘總督陶模離開廣州，謝纘泰的父親日初，因和洪秀全的從侄洪全福，李紀堂，梁慕光們共謀，定於陰曆除夕在廣州起兵反清，不幸事敗，梁慕義們八人殉難，此役所需全部費用五十多萬元，都由李氏一人負擔，實在壯舉。事前并推定容闓爲臨時大總統，怎知事機不密，給奸細偵悉，廣州城機關，多被破獲，因之全局失敗。當時總理在越南河內，事前絕未接到報告。少白則覺得李氏們如此行動，絕未與興中會幹部取得聯絡，雖屬獨立經營，熱忱勇毅有餘，但脫不了帝王思想，實在不智。事後，廣州嶺海報主筆胡衍鶚，借題發揮，痛詆革命排滿是大逆不道。中國日報則據理斥駁，雙方筆戰月餘，造成革命黨與反革命派論戰，也屬中國日報因擁護主義與敵報搏鬥的第一次。

中國日報一度因經濟艱困，與文裕堂合併。李氏出資五萬元維持報務，并司財務，少白司理報務，容星橋專管印務，三人均稱總理。同志們改良粵劇，組織采南歌劇社，做宣傳革命的先鋒，李氏和陳少白，程子儀與粵紳黎國康等

聯合籌組，資本三萬元，李氏獨任二萬元。所演劇本，如：文天祥殉國，地府革命，俠男兒，黃帝征蚩尤，兒女英雄等，多是破除迷信，或是含有民族性。這是開闢改良粵劇的先河，跟着其他的新劇社，也紛紛成立了。

李氏爲了革命工作，直接間接，耗去家產已有十之八九，但他對於社會事業，還是努力的贊勸，意志絕不鬆懈，如在九龍開闢青山農場數百畝地，辦理種植畜牧，出品優良。又出資十萬元開辦李陞格致書院，紀念其父。後來因商業失敗，書院僅辦兩年中止，只靠青山農場的收入，勉強日常開支。然對同志的革命運動或亡命交涉和日常生活等用費，還是熱忱幫助。

辛亥年秋，廣東光復，他出任交通司長，以後又任過幾次的縣長。因爲行政經驗和志趣關係，都不如意，潦倒不堪。他的長次兩兄，在港中擁着數百萬，面團團作富翁，視金錢如性命，一薰一蕕，判若鴻溝，大家絕不聯絡，絕不援助。使到他的農場和學校，都無法繼續維持。民國前所居住自建在炮台道傑閣崇樓的大廈，不得不忍痛變賣，而屈居在九龍何文田租賃一層樓，比之以前傭人的住房也不如。時變世換，隔鄰的與同居一屋的，有誰識得他是曾爲

革命事業，犧牲百萬金錢的開國元勛呢。然而他的不慕榮利，安貧樂道，不背乎心之所安，只在付與，不求酬報的高尙思想與行動，確是革命家的模範。

一個人的生死，本屬尋常，李紀堂叱咤風雲，輸財仗義，忠心主義，功成不居，求之中外革命史中，實不多見。今他在渝逝世，感悼國士，謹借用「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八個字，來表揚他生平於萬一，其他找不着相當的文字了。

卅二年十月六日寫於上清寺畔

憶王陸一

一件很奇巧的事情，竟然的經驗到。當十九日的晚上七時後，我曾到監察院拜訪于右任氏，一傾積愫。并帶了趙堯生張大千兩位合作的鄉居詩圖手卷請他題詩。在談話間，我們談到王陸一的近况。于氏說，陸一近來病得非常沉重，因此九月十一中全會他也不能來出席，現在病勢怎樣，難以詳知，據說是很久不能够起床的了。我說，陸一近年身體日胖，容許血壓高，是中風病。歸寓之後，本想寫信去問他的起居，可是我恰患河魚之疾，精神困頓，懶於執筆，想着再過一兩天寫信給他。怎知今晨看到報紙，驚悉他於二十日的晚上七時後在西安逝世的惡耗。回念十九晚上于氏和我談到他的時候，正是他彌留之際的了。俯仰人天，真有不勝今昔之感。他由二十歲左右，便追隨于先生，而至今日，在靖國軍，在上海大學，到廣州，到莫斯科，在中央黨部，在監察院，無役不隨，倚之如左右手，歷時二十餘年，今死在晉陝監察使任內，思今念往，于氏的傷感，當然較深了。

陸一，原名天士，陸一是他的字，後來便以字行，是陝西的三原人，和于民是同縣。他少年在四川很久，後來回里做事，就在護法之役，于氏任靖國軍總司令的時候，參與機要，一連四五年，從艱苦環境中奮鬥，在西北樹起護法大旗，與南方相呼應，戮亂討賊。後因時勢轉變，在民十一年隨同于氏間關跋涉上海。不久，于氏出長上海大學，他任國文教席。

他任監察院祕書長時，梁寒操是任立法院祕書長，兩人素有才子之譽，王是三原才子，梁是高要才子，文筆敏捷，書法清逸，也多相像。而且二人都好作打油詩，有時在某種會場之際，別人雄辯滔滔的爭論，他們却用拍子簿來傳遞小詩，能在熱鬧場中，舒暢他們的興致。陸一的字，別有一體。很像于先生在民國十年左右書法的字樣，能詩詞，能駢體文，寫起文章來，揮筆即成，確有文學的修養。記憶力尤強，于氏平生的詩，他每首都能够諷誦得出，不錯一字。因之子的詩集，是由他箋注的，一首一句的本事，他都了然於懷，聰明與強記，兼而有之。和朋友談天，好帶逸語，別有一種風趣。

他在靖國軍中時，所有軍政界裏的奇聞逸事，與夫和敵人鉤心鬥角，縱橫

揀閱的內幕，知之最詳。他把所見所聞寫成一部書，好像鼻盾隨筆之類，當時準備出版，約了幾個人作序，我也替他寫了一篇。不過當時他是要文言的，尤其是要駢文，因之很費工夫，記得開首的幾句，是：「華陽奔命，庾信當年，江表聞歌，桓伊此日。一這一部十數萬言西北護法期中革命野史，因着環境和人事關係，無法印行。只有在三數人的談天，他高興時，拿出來看看，閉門讀未刊的野史，確是人生快事。但是他現在撒手人天，這一部未刊的珍祕文稿，不知如何，深以記念了。

他的爲人，英明俊爽，最重友情，治事謹嚴，文學瞻敏，當年總理奉安的時候，奉命撰作哀詞的有數十人，獨胡漢民和他被選。最後胡氏自動放棄，推重他的作品。

他一度任安徽大學文學院的系主任，但爲時僅一年，便又回到上海，住在蒲柏路蒲柏公寓，時時找些朋友，談天吃小館子，尤喜到浴室洗澡。也有一個特殊脾氣，在上海時，每次洗澡，都換一家，朋友有戲呼他是「浴室巡閱使」。他本屬基督教徒，二十年前，在陝西提倡華人自立教會播道，應該脫離西

教會的津貼與統治，在當時的自立教會裏，他是鐵中錚錚的一個。但後來對於宗教信仰問題，不大談到，更不涉足教堂的門檻了。

在民十七年，他任中央黨部書記長時，曾電約我與同事，我因有別事辭不掉。沒有前去。去春，我由香港返曲江，他聞着，也電催我到渝。我也因先答應了固定工作，不能夠脫身，故也沒有來。今秋我來了，滿擬上月十一中全會，他必出席，可以暢叙闊別，怎知他又因疾病纏綿，沒有參加。二十六年的故友，真像黃晦聞弔諸貞壯的詩所說：「歿無訃告病無書，流涕平生痛有餘」了。他以前題贈我的詩詞，先後有二十多首，還存在滬寓。頻年違難，身無長物，這些故人手澤，更談不到攜在行篋中了。

客中怱怱，想着引申陸一的幾首詩詞，也很難找得着，後來于氏在詩冊裏，找出幾首給我，今把他錄下，以示一般，王詩云：

隨于右任先生經敵陣至武功行營（民國十一年作）

垂危拋病母，伏地一長號。此淚終天別，橫心百楚遭。倉皇從間道，險阻望金甌。問訊軍中使，陰雲入陣高。

教稼台空在，周原久輟耕。壺漿隨一旅，煙火贍孤城。幸續遺民命，還依上將營。弓衣潛出涕，月色轉危旌。

上陵詩（民國十九年作）

體國誰爲億衆心，此時開創亦駸駸。生民水火無全策，大地沉荒有變音。空望陵園依北斗，絕難冠冕想東林。諄勞遺命分明在，作誓微聞昔至今。

萬物劬勞敝楚種，晶瑩樓殿楯欄垂。風飄大漠獅身石，炎火窮荒鷲首旗。雨粟雨金奴隸分，犁泥犁血主人知。棕櫚散髮冰熊吼，久矣生民現瘁時。

百種髡鉗匝地來，天平吾族亦堪哀。賈奴腥醉磨牙齒，屬土誅求闢草萊。黑鐵聚爲賢政府，黃金高是受降台。人羣解放無宗主，組練驅除且一回。

府海官山事可爲，授田兼令授民衣。一夫失所天無宇，萬族咸熙貴有歸。始以征誅求曠隳，極緣耕鑿得依依。春來楊柳青旗色，墨世何人嘆式微。

奄然咻息遏窮年，不是民初近葛天。奇器自從趨什百，五刑之屬過三千。幾聞網罟虛宵織，何處黠蒙有政權。欲喚直須齊喚起，豪強驅盡海爲田。

書成相斫世間同，血肉殘傷號古風。惟以至仁能大勇，必無私有始爲公。



山林原澤規民事，緼作耕桑著考工。自是知難行甚易，精誠昭鑒黨人中。

我們更希望他的夫人能够把他未刊的詩詞文稿，好好的收集保存起來，待到相當時期，把他印行，或者由幾位朋友擔任印資。我想這是很有意義的紀念亡友的工作，比之舉行一兩小時的追悼會含義更深，流傳更遠。

卅二年十月廿一日寫於重慶

## 徐宗漢女士

這篇稿，雖然不是由我所寫，而其中材料，是由我口述或搜集，告訴重慶中央日報記者徐鍾珮女士所記述的，特把他附入，并說明原委如右。 丹林附志

辛亥年的三月廿九日的深宵，黃克強先生的手受了重傷，在血雨腥風的廣州街道上迷了路，言語又不通。但他知道他的目的地是在河南溪峽，偽託辦喜事胡宅——一個黨的祕密機關。

在那個機關裏，平時類似一所顏料行，以外國顏料罐頭夾藏着軍械運輸，由一位名叫徐宗漢的女同志假扮主婦。

兩條結婚用的紅對聯，使黃先生猛想到這裏也許就是機關所在地。是的，在那裏，他找到了徐女士。

徐女士時已孀居，對於革命，她却有如火如荼的熱情，她的金蘭閨友張竹君，莊漢翹們，也都受着革命洗禮的。

莊漢翹女士把革命思想灌輸給她的小叔馮子平，馮子平又把革命思想灌輸給他的好友高翰書，那時馮高兩個孩子見黨內經費拮据，在三月廿九日的前一月，竟自動的要革命黨人把他們藏起來，用「龍虎堂」名義寫信給他們家人勸贖，贖金七千元，以貼補黨內費用。

陪伴着兩位小同志藏在香港擺花街的，也是徐宗漢女士。那時搜捕黨人很急，黃克強先生也匿居到擺花街去。據說，就在那時，已經建立了兩人感情的基礎。

四月初一日，徐女士護送黃先生乘哈德安輪去香港，那時輪上已沒有房間，黃先生坐在大廳的沙發上，徐女士拿身體把他擋住。而船上大半都是加三二九革命的黨人。

到香港後，黃先生傷指劇痛，還有一指將斷未斷，於是進雅麗士醫院割治。照例，割症需要親屬簽字。徐女士以他妻子的名義簽字，兩人就此締結了良緣。

辛亥年八月，武漢起義，黃先生自滬去漢。那時適張竹君女醫師組織赤十

字會救傷隊，赴漢口救傷。黃先生和夫人夾在救傷隊裏，混入漢口。

民國十年，蘇聯災荒，上海成立俄災振濟會，黃夫人擔任演講部主任，到各地各團體去演講，代爲奔走呼號。十六年，革命軍到達南京後，黃夫人接辦貧兒院，貧兒院的數百個孩子都依她得活。民國二十年，她又和一個職員赴美，向華僑募款。去美不久，東北發生了一九一八事件，她立刻拋棄爲貧兒院募捐的初衷，轉而爲東北義勇軍奔走。因之，在美一年，並未爲她的貧兒院捐募得分文。

在美國，她曾以工作過度生病，病中她囑咐廣東同鄉，她死以後，可以火葬，所燒骨灰，代她寄回祖國。

天幸那次她不久就痊愈，在國家以三月二十九日定爲青年節的第一年，在國際婦女節的這一個偉大的日子，她却溘然長逝，在學習先烈革命精神的青年節，在懷念無數英勇奮鬥的婦女前輩中，我們再也見不到這位銀髮蒼蒼的巾幗老鬥士。但她永遠是我們的榜樣，她大膽，英勇的革命事跡，將銘鑄在每一個男女同志的心裏，直到將來，直到永遠。

## 「革命通」馮自由

在初期革命的同志中，現在還健在的，根據「總理年譜長編初稿」所載述的人名，馮自由可說是魯殿靈光了。馮氏的名字，在這書裏第一次發現的，是「清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公元一八九九）——三十四歲。先生仍居橫濱，往來東京，長崎各埠，提倡革命主義。留學生吳祿貞、戢翼翬、馮自由等均加盟。」但據馮氏的自述：「當橫濱興中會成立時，余年甫十四歲。是歲夏，余以母疾自粵蒞日，余父命余夜習英文，日中無事，惟讀小說消遣，於國事毫無所知。一日，有久未剃頭髮長逾寸之長衫客二人來訪余父，余父引之至樓上客室，密談多時乃去。余後始知來客姓名爲孫逸仙、陳少白。嗣興中會分會成立後約一星期，某日，中山、少白、士良三先生在余家午膳，余侍末座。中山先生詢余『好讀何書？』余曰：『好讀小說。』中山先生曰：『好讀那部小說？』余曰：『三國演義。』中山先生曰：『三國演義人物，汝最喜歡何人？』余曰：『孔明也。』中山先生笑曰：『汝知喜歡孔明，即是明白古今順逆之理，我等

之興中會，便是漢朝劉備諸葛亮。今之滿洲皇帝，便是曹操司馬懿，我等已起兵驅逐滿洲，即如孔明之六出祁山也。」因謂余父曰：「令郎能熟讀三國演義，何不令其入會？」余父遂命余填寫誓約，此余以童年加盟革命黨之原因也。」按橫濱興中會成立，是在前清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的十一月，即革命黨人第一次在廣州舉義失敗後的第二個月，總理與陳少白鄭士良由香港到日本後所組織的。光緒三十一年（一九零五年）七月，中國同盟會（聯合全國革命黨各派，如：興中會、華興會、日知會、光復會等）組織成立於東京，他是發起人之一。並即由總理首次派他歸國組織分會於香港、澳門、廣州等地，且任香港中國日報的記者，第二年升任社長。關於南方各省市的革命運動，多由他主持或直接指揮。兩次出國往北美、加拿大、舊金山等地，主持報館總撰述，和向僑胞籌措軍費，成績卓著。

武漢首義，從事革命亡命海外的同志，紛紛歸國，參加建國大業，馮氏被舉爲美洲革命黨總代表，也回國參加組織共和政府事宜。南京政府成立，任總統府機要祕書。北京政府成立，任臨時稽勳局長。民二的秋間，給袁世凱逮捕

下獄。因那時他任國會議員。自二次革命而後，袁世凱對於民黨看做亂黨，驅逐逮殺，爲所欲爲。馮氏是民黨中堅，給袁氏的嫉忌，是意中事的。他在稽勳局任內十五個月，搜集了歷年黨史珍聞，異常豐富。有一部分檔案，後來也由行政院運到南京保管去了。

馮氏原名懋龍，蘇曼殊的「三次革命軍序」開首即說：「馮君懋龍，余總角同窗也」，就是替他做的。他與曼殊在日本同學三年，對於曼殊身世，知道很詳細。他在橫濱加入興中會之後，於革命工作很努力。只就庚子至壬寅（一九零零至一九零二）的三年間，他在日本曾和同志們發起四事：一、與鄭貫一等創刊開智錄；二、與李自重王寵惠等組織廣東獨立會；三、與沈翔雲戰翼輩秦鼎彝等合辦國民報；四、與章炳麟等召集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和擔任香港、美洲、星加坡等黨報的駐日記者，聯絡各方，很關重要。

護法之役，馮氏曾任宣傳局長。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容共時候，他與章炳麟、居正、馬君武、劉成禺、周震麟、但懋、焦子靜、謝良牧、茅祖權等，從事護黨救國運動。不久，在哈爾濱、上海等地，主持商業。國民政府定都南

京，五院先後成立，簡任立法院委員，和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國史館、革命債務調查委員會等機關的重要職務。黨中每有關於黨史及調查革命同志履歷，必向他諮詢，故老同志們給他的徽號爲「革命通」。顧名思義，可以知道他對於黨史的精熟，同時也可以證明他在黨內的資望了。

他在民國十七年，出版「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是他三十年來所珍藏的各種書報筆記表冊刊物圖片的材料，及同志知交所經歷的事蹟而編成。上篇出版之後，十九年續出中篇，給研究黨史的一種翔實正確的最寶貴資料。民國二十五年春，簡又文聯合同志在上海創辦逸經文史半月刊，他就按期寫述「革命逸史」。他在第一篇的弁言裏，冠有七絕一首云：「白頭宮女談天寶，古董山人說晚明；今古興亡多少恨，狂歌當哭萬千聲。」滿腔感慨，如聞其聲。他的「革命逸史」，和劉成禺的「洪憲紀事詩本事注」，簡又文的「太平天國著述」，同爲「逸經」鼎足而三每期特有的珍貴史料，是一般讀者所愛讀的文稿。「八一三」滬戰發生，「逸經」停刊，後在香港改出「大風」，「革命逸史」也繼續發表。這是他六年來不斷地寫述黨中掌故軼聞的成績，也可以說是他有



生以來在固定刊物中寫作最長久的一題。已經彙集編成兩冊出版。這些稿件，我任逸經、大風兩刊物主編的時候，每期都得先覩爲快，眼福不淺。

卅二年春間，他榮任國民政府委員。以革命的資歷來說，他是興中會時代的中堅分子，而生平所貢獻的又大，確屬當之無愧的。憑着他的經驗與努力，相信今後對於黨國的貢獻，一定不少。

在民國三十年的秋天，他因病到香港療治，怎知抵港僅兩月，港九即淪陷。他因脚病，又被敵監視，逃脫不得，延到卅一年十月下旬，纔得伺機化裝扶病脫險歸國。他未離港前，蟄居九龍窩打老道廨所，教孫自樂。有時興到，便借吟詠來消遣，發洩胸中憤悶。摘錄幾首，以見他當時的心境。

### 歸 思

杜門多幸記青盲，時數餐餐度活難。荆棘載途歸未得，不堪低唱念家山。  
讀寇萊公傳有感

伏櫪危城歎道窮，三番虜使向衰翁。契丹亦解尊元老，不負微名革命通。

（去歲二月間，倭興亞機關代表井崎喜，訪余三次，託辭慰問革命元老，並供應需要。余均以病卻之。自是每星期必派佐藤定男前來問候，實則監視也。）

宋室阽危似斷蓬，獨持抗戰建奇功，澶淵博得雷州獄，怪底欽徽辱祖宗。偕內子扶病登輪脫險感賦

危城十月坐針氈，百病千災祇自憐。在昔賈生憂跋扈，嗟予身受更何言！相將扶病出昭關，梁孟同歌行路難。來歲我軍光漢土，老夫先上太平山。他在少年期間，已懷有大志。十七歲，在橫濱的大同學校讀書時，有扶危定傾，舍我其誰之概；曾有自撰聯，貼在書房云：「大同大器十七歲，中國中興第一人。」蘇曼殊替他作「三次革命軍序」，說他：「少有成人之風，與鄭君實一齊名，人稱雙璧。……君有澄清天下之志，人但謂廣東人有生爲亂，而不知君固克己篤學之人。……」評述的當。他今年雖已六十三歲，白髮鬚鬚，但談話興致很濃厚，含着幽默意味；談往說諧，滔滔不絕。有一次，他和胡漢民說笑：「胡胡塗塗」，胡即答他道：「馮馮翼翼」。若果逢着二三知己，來玩無情對或打油詩，更感興趣。樂觀主義，是他養生處世的一法吧。

## 胡適之與競業旬報

當前清光緒三十年左右，革命空氣，已經瀰漫全國；一般熱忱國家民族的志士，多趨向革命新潮，直接間接的去活動，共同喚醒國人，推翻滿清專制的君主政府。於是各省市多有學會或刊物來從事聯絡與宣傳。有幾位革命同志，於前清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一九零六）在上海組織「競業學會」，會址是在愛而近路慶祥里。他們的主旨，表面是：「對於社會，競與改良，對於個人，爭自濯磨。」其實骨子裏是一個革命團體。這個會的主事者，不特是在文字方面鼓吹排滿，還有直接的行動，如楊卓林、廖德璠們，就是因為從事實際工作，而給清吏捕殺的。

學會成立之後，跟着編印「競業旬報」，來做宣傳工具。這個刊物，是注重語體文的稿件，目的是在「傳布於小學裏之青年國民」。他們對外宣傳的目的，是「振興教育，提倡民氣，改良社會，主張自治。」而他的內容呢，是不離卻學會的中心宗旨，鼓吹革命的。

旬報的編輯。先後有數人。第一位是傅專，字君劍，號熊湘，別署鈍根（後因與王晦的別號鈍根相同，乃改屯艮），湖南醴陵人。第二位是張廷禮，字丹斧。第三位是葉德爭。第四位是胡適。其他如謝詒莊、丁慧仙等，都是努力寫作的。現在就談談胡適之和競業旬報的關係。

胡適之因在上海澄衷學堂，爲了同班一個同學給學校開除。他以班長資格，向學校當局抗議，不特沒有結果，反而被記大過一次。因此，他當時心裏感覺不平，不願意在澄衷再讀下去，特轉學到中國公學。在宿舍裏，由鍾文恢介紹加入「競業學會」。當旬報創刊的時候，鍾文恢見他平日好看小說，又能作古文，就勸他寫稿子。第一期發表了一篇「地理學」，署名是「期自勝生」。後來又用了許多筆名，如「希疆」、「鐵兒」等，寫了不少文章，小說、論文、叢話等都有。這個時候，他還祇有十五歲的年紀呢。旬報出版到第十期，便停辦了，直到戊申年（一九零八）三月纔復版。復版後，傅君劍別往了，編輯部無人負責，適之也不投稿。等到七月，旬報從二十四期起，便歸胡主編，一直到第四十期停刊時止。

傳君劍對他是很推重的。當君劍將要回湖南時，適之寫了一首送別詩，親自送給君劍，順便請教像不像詩。開首兩句：「我以何因緣，得交傳君劍」。君劍看着，異常的誇獎他。第二天，君劍也有「留別適之即和贈別之作」，詩中有：「天下英雄君與我，文章知己友兼師」。這兩句話，卻使十五歲的少年胡適之看了，嚇了一跳，有點受寵若驚。然而在後來的事實，胡適之的成就，確是卓爾不羣。君劍當日這些鼓勵話，不是沒有關係的。而且適之也因此發憤做詩，想要做一個詩人，也是從這時開始的。

適之那時的思想怎樣呢，他在旬報寫了一篇「真如島」章回小說，用意是「破除迷信，開通民智」，看他第一個回目：「虞善仁疑心致疾，孫紹武正論祛迷」，便知道他的主旨所在。他又寫「無鬼叢話」，有一則，痛罵「西遊記」和「封神榜」的無稽，大意是說：

「夫士君子處頹敝之世，不能摩頂放踵，敝口焦舌，以挽滔滔之狂瀾，曷若隱遯窮遽，與木石終其身。更安忍隨波逐流，阿諛取容於當世，用自私利其身？（本條前面說封神榜的作者，把書稿送給他的女兒作嫁資，其壻果然因此

發財。所以此處有「自私自利」的話。」天壤間果有鬼神者，則地獄之設，正爲此輩。此其人更安有著書資格耶！

他自己也估計不到，在十五年之後，熱忱地替西遊記做兩萬字的考證。又有一則說：

「吾嘗持無鬼之說，論者或咎余，謂舉一切地獄因果之說而摧陷之，使人敢於爲惡，殊悖先王神道設教之旨；此言余不敢受也。今日地獄因果之說盛行，而惡人益多，民德日落，神道設教之成效果何如者？且處茲思想競爭時代，不去此種種魔障，思想又何從而生耶？」

這些話，都可以做他後來思想的出發點。據他說：競業旬報四十期，其中的文字，大半是他寫作的，是他自由發表思想的機會的一個刊物；尤其是對於迷信思想。這是證明他在十五至十七八歲參加革命團體的外圍工作。前幾年，中央宣傳部徵集民國前的革命刊物，競業旬報也在其內。

## 革命雜事談叢

越秀山上的三老樓 廣州越秀山（觀音山）有文瀾閣，軍閥龍濟光踞粵時，因其逢迎北廷，屠殺民黨，得授振武上將軍，特將此閣劃入禁區。護法之役，龍即失勢，總理開府廣州，將閣易名三老樓，特請初期革命之「四大寇」陳少白、楊鶴齡、尤列三人在樓中居住，取五更三老之意，俾得朝夕相晤，擔簞戴笠，永毋相忘，意義非常深切。其中尤列因在袁世凱時期，曾入北京寄寓甚久，陳少白對之，時有譏諷，言語尖刻；尤不能耐，悄然而去。無何，陳楊各因料理私事，亦不能久居，於是三老樓只成爲革命史上的陳迹了。

總理步行演講三民主義 總理於十三年三月三日，在廣州的高等師範開始演講三民主義，自下午二時至四時，演講兩小時。由河南士敏土廠渡河至高師，路程有六華里，租汽車三輛，總理和侍從乘一輛，衛士乘一輛，便衣偵緝乘一輛。後來總理深覺所租三車每次耗費三十六元，實不合算。於是囑咐副，不必僱車，由河南渡東堤之後，步行往高師，以省經費。當時，總理尙

無公家汽車代步，即僱用汽車，每次只需三十六元，也覺得耗費。這是證明他真有平民思想，爲了闡揚三民主義，不辭辛勤。總理的偉大，實在難能，

孫夫人未隨北伐之原因 民國十年，總理親率大軍，出發廣西，實行

北伐。此役孫夫人宋慶齡女士沒有偕行。其原因傳爲廖仲凱諫阻。蓋廖以中國古來出征，多不攜帶家眷，女子在軍，視爲不祥，且恐惹起其他誤會。總理本大無畏之精神，打破一切封建陋習思想，即答廖說，此爲不可爲訓的惡習，革命黨人不該存此思想。并引梁紅玉輔佐韓世忠大破金兀朮故事來說明女子在軍中的貢獻。但因部屬既有此種思想，故亦勉從衆意，孫夫人乃暫留廣州，未即隨同入桂。

李紀堂籌款奇謀 李紀堂生平捐輸革命款項，在一百萬左右，可說是捐

助革命運動費用最多的一位了。民國前數年，他家產即已蕩然，同盟會南方支部又值經濟拮据，一切活動，進行艱困。他曾提出覓款方法兩種：其兄擁有家資百多萬元，父親遺柩，停在廣州白雲山下未葬，可派人把棺木搬匿，向他的哥哥，勒索十萬八萬元。再者，他的大侄子，常到廣州郊外掃墓，亦可預伏隊



，把他綁票，勒索十多萬元。此兩事任擇其一而做，即可得款十萬元左右。并謂可請李福林委派同志去辦理，當必成功。因他的哥哥，擁有鉅資，非如此去辦，是無法去找他分毫的等語。當時幹部同志們聽着，皆啞然失笑，以此種擾亂社會公安的舉動，黨部雖然窮困，也不該幹此違情背法行爲，只有婉言推却。事雖未辦，然李紀堂爲着黨中籌款，不惜以父親遺骸作犧牲，於此也可以見到當時同志爲了黨的活動，籌措款項，千方百計，無微不至的了。

劉錦洲裝瘋脫罪 史堅如謀炸清吏粵督德壽，給史烈士爲埋炸藥而租屋的擔保人，是基督教長老會的宣教士劉錦洲。後來史案事洩，清吏尋出根由，知道這所屋子是劉擔保，必定是同謀犯罪，把劉拘捕。劉入衙署後，裝瘋癲語，忽說天堂地獄，忽叫耶穌基督、上帝耶和華、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東扯西拉的瞎說連篇。過了些時，又向天大聲的禱告。使看守的差役，當他是瘋狂人，報告長官。當局的囚重犯已得，不想拘押瘋漢，且他又是宣教士，恐怕引起西教士的交涉，惹出麻煩；將錯就錯，便將他釋放。這樣一來，正中了一山人妙計，劉就得恢復自由了。

### 毛文明不住公家房子

總理到檀香山希路時，策動華僑歡迎。總理的是毛文明，當時毛在希路傳教，深知保皇黨陰謀，特把實情向總理申訴，唯有即日恢復革命黨機關，纔能和異黨搏鬥。總理深韙其說。毛平生做事無論在政界或教育界，都有一貫主張。即絕對不肯義務的住公家的房子，必須納租，方肯住宿。因此惹起許多同事對他不滿。但他保守着素來的主張，除了月薪之外，其他分毫都不受用，確是革命黨人本色。他的夫人是醫生，收入很豐，故他生活毫無關係的。

### 嶺南培英是革命機關

嶺南學堂（初名格致書院）和培英學堂，都是美國教會在廣州設立的學校，因着有西籍教士的掩護，革命同志在這兩校活動或產生的很多。嶺南方面，有陳少白、鍾榮光、史堅如、廖德山、這是前一輩的。後一輩有高冠天高劍父兄弟，李希斌（原名唐裔）。陳少白是嶺南學生之第一人，史堅如烈士革命史，不必贅述。廖興是博濟醫院的同學。辛亥廣東光復，劍父任軍團協會會長。培英呢，有毛文明、黃旭昇、徐甘棠、何輯五等，他們在國內外都努力革命。後一輩的有張華生、高恩松、楊啓康啓壯兄

弟，時秋霖（原名浦霖）等。記得民國前一年，有一晚舉行同盟會加盟，教職員及學生參加的四十多人，盟誓畢，大家立即剪去辮子，表示堅決。廣東反正前，有許多民軍隊伍的炸彈，是在培英校裏製造。一般同志都動手配製。培英在宣統三年的理化實驗，是把製造炸彈做中心課程。因之事急時需，即可分工合作來趕製應用了。

尹文楷自認不能做官

尹文楷醫生。畢業天津北洋書院醫科。歸粵后，

在博濟醫院任教習。

總理在廣州開設東西藥局，因業務發達，曾請尹醫幫同診

病，共同合作。后來

總理因第一次革命失敗，亡命海外，尹也到香港行醫，一

生不入政界。惟對黨務直接間接，輔助極多。尤以聯合基督徒集股開辦大光報，

努力擁護正義，替民黨宣傳最力，深得總理嘉許。有人問他和總理如此深交，

爲什麼不找個差事，如陸軍醫院長，醫務總監之類。他只有笑口而說：我是醫生

我只能開業與教書，我絕不懂得行政，即醫政也沒有學過。爲什麼要放棄固有的

熟練的工作而幹外行的無聊差事呢？這幾句話，可以代表他的思想了。

排滿通俗歌詞

在前清的時候，黨人們宣傳革命，採用原來民間歌曲的

調子很多；因利用他較易普遍深入人們腦海的緣故。當時廣州香港的革命黨人主持的報紙雜誌，在副刊的作品，滲入宣傳排滿的劇本、南音、粵謳等，不可勝數了。記得當時流行一首仿「陳世美不認妻」的小調，事隔三十多年，現在還記得他的詞句，可見歌曲的深入腦海的能力。聽說這首歌是「冤禽」作詞的，原詞如下：

同胞們，若問起，亡國遺民悽慘事，待我從頭說你知，未開言來心內悲！我本是，漢族人，廣州番禺×子家，不幸水衝六脈渠，祖宗爸娘早去世。皆因是，李自成，聚集黨徒亂帝基，崇禎下令吳三桂，大起朝廷問罪師。又誰知，戀妓女，不顧中原伏亂機，後來敗北無人倚，賊徒縱橫迎滿師。最可憐，聖明主，哭泣煤山來自縊，聲聲慘切傷黎庶，寧願千刀碎朕屍。滿洲兵，殘生靈，軒轅黃裔四百兆，揚州嘉定血成河，地慘天愁草木悲。到如今，屈指計，二百多年施壓制，貪官污吏逞淫威，剝盡民膏心未死。萬望着，衆志士，嘗膽臥薪切齒記，但願光復漢江山，洗盡遺民奴隸恥。優待清室條件的主稿人 紹興諸貞壯（宗元），在前清的時候，任瑞澂

的幕友很久；夏劍丞（敬觀）李拔可（宣龔）等，都是他的同僚。辛亥武昌首義，兩湖總督瑞澂逃走，他到上海去。張謇的「齋翁自訂年譜」宣統三年辛亥（一九一一），五十九歲，八月二十二日，有說：「江寬舟中遇諸宗元，益知十八十九兩日之情狀，知禍即發於按籍大索。自黃花岡後，革命風潮，日激日厲，長江伏莽滋多，終有最烈之一日，大索，但促之而已。」這是說武昌起義的近因。諸氏對於公牘，異常諳練，詩文也有獨到之處，張謇、吳昌碩的詩文，有許多是由他代筆的。關於「優待清室條例」，當此主稿的，外間多說是由張謇主稿，而由趙鳳昌參加意見。即在張謇逝世之後，張孝若所寫「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給胡漢民看到關於此事的紀載，胡即寫信給譚延闓轉與孝若，也有說明。其實優待清室條例，是由諸貞壯主稿的。在民國十七八年，我與貞壯同寓上海，他曾把這件事的前因後果，詳細申說，併說出張謇的詩文那一首、那一篇，是由他代作的。

吳羲如善於化裝 庚子，史堅如謀炸兩廣總督德壽之役，參加的黨人有吳羲如。吳是順德人，向充營弁，屬順德縣城大良花基的長老會教徒。此人從事革

命運動，化裝隨時應變，忽而漁翁，忽而賣物挑擔，忽而叫化子，忽而道士；有時又偽裝紳耆，宣教士，有時變爲老太婆。有一次竟假扮知府下鄉查訪，使一般滿虜奸細，無所捉摸。這種舉動，在革命黨活動時期，實不可多得的人才。到了廣東光復，他也影息田園，時到教會叙集研道，不再談說革命；只說今後工作，等待建設人才的來負責。他有自知之明，他已盡了他的職責了。

順德三傑趨向不同 在前清末年，廣東順德有廖丕子、伍憲子、盧信三人，少年英俊，各抱大志，工於寫作，時人號爲「順德三傑」。然他三人後來趨向不同，志趣各異。廖丕子從事十餘年宣傳革命，在中國日報、平民報、平民畫報等，撰著最多；即在廣東光復以後，也在報界工作，及任孤兒院事務。廣州陷敵，則效陳子壯偉績，組織游擊隊，專打倭軍，沈着苦幹，壯志熱願，一般舊同志對之，都佩服他。晚年精繪事，品格清高，似不食人間煙火的，得者莫不珍寶。伍憲子因王秋湄的推荐本入中國日報任撰述，但同時保皇黨的商報也託人請他，他因貪圖商報月薪比中國日報多了五元錢，便就了商報職務，從此投身在保皇黨隊裏的羣中，一沈而不能覺悟。不久，到美洲，還是在保皇黨

的機關報寫作，盡惑僑胞思想，人於歧途。一念之差，涇渭判別；要是當年不爲五元的些須收入，恐怕早已成爲黨國要人了。盧信著有「人道」一書，專以抨擊世界不良的政治、軍事與反對封建制度；反對富豪、反對地主、反對戰爭，近於無政府主義；民國初年，風行一時。未幾，他投入「金星系」（即金星人壽保險公司）唐紹儀的門下，與李茂之、歐陽榮之同屬唐系的三大台柱。因唐的關係，曾任農商部次長，以唐的嫡系自恃。而當年北方政府因唐氏本人不入閣，故任盧爲農次，來敷衍唐氏。由此看來，「三傑」思想不同，後來的路途也各異。最值得推許傾佩的，還是廖平子。

從事革命的教士 在滿清專制政府的時代，基督教的宣教士，藉着西教士的掩護，清吏顛預，對教會也不敢正視。因之教士們從事排滿的革命工作，比較的便利了。今列舉若干如下：

湘鄂的日知會主持的，在長沙是黃吉亭牧師，在武昌是胡蘭亭牧師。上海聖彼得堂牧師吳國光與黃吉亭極多聯絡。光緒廿八年，黃克強返長沙，就是吳牧師寫信介紹給黃吉亭的。（吉亭或作吉庭）

甲辰九月，湖南舉義失敗，黃克強逃匿在長沙的聖公會教堂，幫助黃氏脫險的是黃吉亭牧師曹亞伯教士的力量。

史堅如謀炸兩廣總督，埋炸藥的屋宇，是教士劉錦洲代爲擔保的。

總理於一九零五年到檀香山，在希路傳教士毛文明，面陳保皇黨邪說橫行，并條陳恢復革命機關。史堅如謀炸德壽，毛氏也曾盡過力量。後來廣東反正，毛即出任財政司長，不久，調任連縣縣長。毛的姻親黃旭昇牧師，也任過連縣縣長。

宋子文的父親宋躍如，也是宣教士，對革命工作，很爲努力。總理在自傳中，也有提及他。

長老會宣教士謝己原，初在廣東順德城傳教，廣東光復，即任順德縣長，不久，任廣東省議會議長。

廣州聖教書樓的教士左斗山，王質甫，對於革命運動，非常努力。乙未，廣州第一次起義，他們倆工作很多，王質甫且因此亡命到韶關。

王煜初，楊襄甫兩位牧師，區鳳墀長老，他們和總理的關係，都在師友



之間，對於初期革命的策劃和宣傳文字，幫助很多。

廣東反正，教士高恩松出任新會縣長，黃文卿，廖雲翔，張華生等，對排滿運動，盡力不少。

浦化人，董健吾兩位牧師，在西北軍隊裏，從事革命活動多年，從此且不幹教會工作，專事政治活動了。

宣教士深明大義，從事國民革命運動的，指不勝屈。但在抗戰中，有一位閩籍周之楨牧師，却做了偽汕頭市長。真如耶穌基督所說，「外似羔羊內實豺狼」的人了。

練達成借教排滿 廣州初期革命黨人中，有練達成者，曾充博濟醫院尹士嘉醫生之護士；粗知醫藥，與其妻張翠真分設美嘉氏藥房於廣州及陳村。人不知其來歷者，祇見紅綠黃黑藥水，滿陳架上，即驚爲名醫，其門如市。練氏夫婦，以行醫爲手段，陰則圖謀革命也。練每逢下鄉運動革命，必乘三人伙轎，攜帶舊新約全書一部，美國旗一面；洋裝革履，儼然宣教士。所到之處，人皆以傳教士目之，又烏知其僞裝乎。廣東反正，組織民軍，任練字營統領。

即乙未廣州第一次起義，彼亦屬幹部人員也。惟在民十以後，因外遇關係，夫妻先後死於非命。蓋此時，彼之思想與行動，已離革命隊而矣。

馬君武勇挫陳羣 護法時期的政府秘書長，章炳麟，徐謙，馬君武，邵元冲等，先後擔任過。章炳麟時期最短，徐謙較長，其中有一個時期，由秘書吳山代理。然在大元帥府時，秘書陳羣，人極暴躁，常常和同寅爭執，三言兩語，便揮拳相打，人多鄙陳下流，不與計較。獨馬君武不肯示弱，曾和陳毆打，陳不敵，事後輒向人說，「廣西佬惹不得」。有一天，我到大元帥府訪徐季龍（謙），請他替先母寫作墓志銘，正在相談之際，忽聞辦公室人聲沸騰，喧嘩聒耳。徐命工友前往探視究竟。據覆，陳羣吳山攪作一團，同事排解，始得無事。原來吳擬一稿，內有「務懇」二字，陳自命通人，說吳不識公事，應用「伏乞」乃對，因此相毆。後來陳因事與邵元冲爭執，幾至用武。邵報告總理，總理溫言勸諭，陳猶嗷嗷不已，說邵挾天子以令諸侯。然陳之暴躁，好事生風，民十六，在上海，貪污暴戾，無惡不作，降至投僞辱國，暴徒結果，有由來也。

林瑞銘運藥炸倭相 日本利用袁世凱叛國稱帝，乘機提出二十一條件，要挾袁世凱承認，造成國家的重大恥辱。當時寄居東京的革命黨人，就計劃謀炸日本的首相，來洩忿恨。炸藥是存在橫濱，運到東京，很不容易。因為日本的刑事（即警察）偵探，偵緝才幹，實在厲害。於是利用孩童暗運。林瑞銘（近任廣東坪石的培正培道聯合中學的主任）當時年僅十二三歲，他的父親林少彭，原屬革命黨人，就派他去充當這個差事。他不愧不忙，穿了平日的學生制服，帶了炸藥，乘火車到東京，神不知，鬼不曉，給他掩飾過去，安全的抵達目的地，交差了事。一班前輩都誇獎他有膽有識，完成使命，確是革命種子的有為少年。等到黨人們把炸藥安頓好之後，這個倭酋，已經過了埋藥的地帶，施放也來不及了，辜負了事前的一番策畫。事雖不成，然而林瑞銘和黨人們已盡了他們的責任了。

蔡鍾浩的死別 長沙蔡鍾浩別字樹珊，年纔弱冠，即從事排滿工作，他本時務學堂的學生，讀書不久，便東渡日本留學。漢口，唐才常舉義之役，他曾參與。事後，他秘密走回故鄉，他的家長勸他結婚，怎知婚禮完成，正在宴

請戚友共督梅酌的時候，忽被滿吏的偵緝探着，馬上去逮捕他。他的家人們，向清兵求情願出款千元，留家住一夜，第二天早晨纔遞解。清兵其勢洶洶，務必立刻遞解，絕不通融，他只有從容而去。在獄中萬感交集，做有七律四首。他本是梁啓超的學生，梁特把他的詩收入飲冰室詩話裏，來紀念這位「血性過人，治事機警」的革命青年，蔡詩云：（二首）「蟻磨盤舒又一年，元黃爭戰幾推遷。寒沙白日淹鸞地，短褐雕弓射虎天。終見蜩螳同水火，那堪懷琬在風煙。雞鳴午夜頻搔首，看劍挑燈意惘然。」（二首）「觚稜夢裏寒金雀，諫草堂前起暮鴉。誤國千秋仇介甫，通蕃幾道問充華。蜉蝣竟夕成毛羽，螳臂當車挫爪牙。西狩無麟天閨爽，逋逃人海豢龍蛇。」（三首）又聞麻達葛山奇，輕重當年類舉棋。貂珥雙簪矜別邸，蘭椒三熱拜西閨。酬天祀典憐雞寶，排日笙歌駕鳳螭。營得菟裘身欲老，克家猶護綠幢兒。」（四首）蕭牆旋起八王戈，麾寇其如召寇何？碧海膏流成赤鹵，紅蓮豔結舞妖魘。九朝典冊新鈴散，千騎宮裝老淚多。辜負香衾驚破夢，不因封事動鳴珂。」蔡烈士懷八斗之才，飲萬斛之恨，所事未就，賁志九泉。他就義後一月，逮捕他的清吏，有一天，在臥室裏給人行

刺身死。據事後傳說，是蔡烈士的夫人，因憤恨清吏的蠻橫兇暴，特地替丈夫報仇雪恥，來發洩胸中忿恨的。後來吳芳吉到長沙，探聞此事的因果，也就寫詩來表揚他倆，詩共五章，是古體，今錄於下：（二首）「南嶽何巍巍，浩氣何纍纍。高堂置美酒，欲飲軍令催。願君且緩且勿催，等是漢兒急何爲？願君共飲兩三杯，丈夫視死本如歸。」（二首）莫用千金贖，莫憑兩眼哭。千金好結士，眼枯將見骨。慷慨且各分手去，以身殉國吾所欲。慷慨且各長分手，即茲暫會意已足。（三首）君淚如連絲，待我飲君淚。感君意氣深，使我心魂醉。我知此淚化爲血，血染墓田成嫵媚。我知田裏種嘉禾，爲君年年出雙穗。（四）不有偷生者，何以持苦辛？不有輕死者，何以示后人？願卿且住勿從死，從死無益傷我心。願卿相愛復相勉，勉我道義與精神。（五首）滿腔孺慕思，臨別不能吐。此身誓犧牲，久已忘痛苦。只有一心忘不得，歎息無辜長累汝。只有一心不能忘，未見中原歸故土。」

慷慨激昂，浩氣萬丈，蔡志士的心志，也赤裸裸表露。今日讀了，恍如蔡烈士臨別時的口號，和荊軻易水別同等哀怨。（鍾浩名字，鍾字有作忠的，同

是一人，合說明。）

曲石詩錄中的革命稗史 曲石詩錄，是李印泉（根源）的詩集，當中十之八九是含有史事的，關於革命史料的作品，也佔不少，摘錄幾首，以例其他。

「與太炎右任行嚴溥泉君武烈武怒剛鐵橋祭鄒威丹（容）墓」，墓在上海華涇劉三的黃葉樓旁，詩云：「君倡『革命軍』，殺身何壯烈！醉酒弔荒塚，桃花共泣血。」有一首雖屬追述他的胞弟根濤，但和革命史蹟有關，他在記中說，「胞弟根濤，字武誠。任滇軍第七師師長。民國十二年，陳炯明攻破石龍，孫先生陷亂軍中，狀危甚。根濤自樟木頭還師救之。出孫先生於險，恭送登車，血戰斷後，廣州得以保全。見廣東參謀部所著『孫大元帥戡亂記』。又一二八倭寇淞滬，調充第一路軍上官雲相參謀處長，由贛赴滬參戰，積勞得肺炎，轉成肺萎。延至二十七年病歿，年四十有七。一棺孤寄，猶未歸葬」等語。詩是這樣子說的：「石龍揮戈日，英武何桓桓。慟哭申江上，孤燈照一棺。」又有一首在光緒戊申暑假，任大森體育會教習。這會是黃克強所設立，訓練同志得識兵學，準備回國排滿之用。當時入學的有林時壘，劉揆一，焦達峯，陶成

章，喬宣齋，孫武，夏之時，張大義等七八十人，後來都成了革命志士。詩云：「大森任教日，驕陽繼張火。當時革命雄，指揮悉聽我。」又在那年的四月，在東京錦輝館，發起雲南獨立死絕會，越南巢南子也參加演說。他的詩云：「赴義不顧身，誓爲獨立死。到會者萬人，難得巢南子。」後來他到北京去，給滿酋壽勳良弼得了密報，險些被扣留，然已一個多月，行動不能自由的了。其他關於革命運動護國之役和其他珍聞逸史的詩，也有許多，都可給將來纂修黨國史的一個參考。

章太炎家裏的鱷魚皮 芥川龍之介，是日本新技巧主義派之代表作家，他生於一八九二年，即明治二十五年，光緒十八年壬辰三月一日。在干支說，是辰年辰月辰日辰時，故命名「龍之介」，因他出嗣舅父芥川道章，故姓芥川。他的筆名很多，如：我鬼窟、我鬼生、了中菴、澄江堂、澄心亭、綠梅洞等。他是夏目漱石的弟子，在民國十年，來中國游歷，歸日著「支那游記」，忽於民十六年，服毒自殺，年紀只有三十六。

他在「支那游記」中，曾說到往訪章太炎（炳麟），他在章寓所見的最注

意之點，是壁上掛着的鱷魚皮，說是「冷得澈骨」他描寫章氏，是「他的相貌，實在不堂皇，色皮差不多是黑的，鬚髯希少得可憐。突兀地聳出額角這些地方也幾乎要把牠當作是瘤。可是只有那副絲一般的細眼，惟這雙在上品的無眶的鏡背後，總是冷然的，總是微笑的眼睛，確是比衆不同。就爲了這雙眼睛，袁世凱曾困先生於囹圄之中，同時又就爲了這雙眼睛，雖曾把先生監禁而終於未能加以殺害。……章太炎連一接二地搖着長指甲的手，滔滔然陳述他獨得的議論，而我呢？只是覺得寒冷。」

芥川所描寫章的神態，真是形容盡致，一點不差。我還記得章太炎住在上海敏體尼蔭路裕福里的時候，他的屋裏，確實有一隻剝製的鱷魚皮，掛在牆上，做裝飾品的。

趙聲詩文拾屑 丹徒趙伯先（聲），在前清末葉光宣之間的江蘇籍黨人中，文韜武略，算是鐵中錚錚的人材。趙氏十九歲即入學爲秀才，所做詩文，已使父老們歎服。有一個時期，住在南京江南陸師學堂隔隣的一家和尚寺。有一次，無意間，偶然替一個學生作文，給陸師學堂監督俞明震讀着，大加激



賞，即傳詢署名作文的學生。結果，得着究竟，輾轉請趙氏入校，於是他就棄文學武。在校的時候，和同學章行嚴（士釗）意志相投。畢業後，從事排滿運動，并親撰「七字唱本」，叫做保國歌，來激勵士卒。詞句誠懇，讀着的無不大受感動。章氏且代印刷幾十萬分，由曹工丞扮作工人模樣，麻鞋布袋，沿長江上下游而傳播。於是長江一帶的軍隊和黨會們，多得看到。這是傾覆滿洲專制政府，收效很大。可是當時的軍隊黨會間，雖然看到這種宣傳歌謠，而還不知道是出於趙伯先的手筆。

廉州劉恩裕抗稅起兵，他那時恰在廣東任新軍第二標統，奉命前往剿壓。他知道有機可乘，派人與劉通聲氣，并和防軍統領郭人漳密約。怎知劉是無能庸材，郭也不合作，事遂無成。廉事安定，他設宴廉州南郊的海角亭，和各將士痛飲，滿腹牢騷，在酒酣耳熱的時候，即席吟詩，有「八百健兒齊踴躍，自慚不是岳家軍」。慷慨激昂，其中含着有志未逮，不能够討伐異族爲憾的意義，也可以見到他的心志了。

他的書法，也有獨到之處，有一次，替朋友寫聯子，上句寫了「汲古得修

綆」。他的朋友說。下聯是否「盪胸生層雲」呢？他說，我是不作頭巾語的，隨着即寫「交情脫寶刀」。題款之後，蓋了一個閒章，印文是「天水王孫」，豪情俠氣，溢於言表。

當着辛亥年春，三月二十九廣州之役的前兩旬，他在香港策劃廣東起義，因籌募軍費，曾寫信給柳亞子，請柳匯款二千元到港。這封信寫得情文并至，略云：

別來三載，相思無已。偶於近刻，得見詩文，吟誦至再，如對故人。茲有請者，弟自出亡以來，未敢稍自放棄，近極意經營所事，在指顧間。惟阿堵物，尙虧一簣。就力所到，已窮羅掘，焦思欲燃。若因是掣阻，殆不止王敦笑人。昔公瑾用兵，子敬指困以贈，江鄉先哲，高義如許，矧用急難，遙呼將伯，千鈞一髮，尤甚前人。見信，望即於數日內，籌措至少兩千圓，電匯香港，以供急用，萬勿見卻。他時握手中原，必有以謝君也。

「中華民國萬歲」牙印質疑 中華民國的名稱，最初發見於黨史文獻的，是在於民國前六年（光緒三十二年丙午）總理手定的「革命方略」，且

也經過中國同盟會本部開會議決。「革命方略」在四綱之中的第三「建立共和國」有說，「制定中華民國憲法」，是中華民國的名稱之最早出現於文字中的。「革命方略」宣言，後來有些編書的把他標題易爲「中國同盟會宣言」，和原來有點相異，但文字還是一樣。

可是在馬小進記述「中華民國萬歲」牙章的印拓，却有點錯誤了。馬文云：（原文見廣東文物）

尤令季先生，亡命日本，寓橫濱山下町前田橋一百二十一番館，與中山先生商定中華民國國號後，爰於公曆一九零一年一月一日，假上野精養軒，召集同志及我國留學生公布之。時王寵惠、張繼、蔡鍔、戢翼翬、程家樞、吳祿貞、沈翔雲、劉伯剛、吳練之、秦力山等數十人。皆在坐（坐字照原文），而日人犬養毅亦與焉，並拍照以爲紀念。遂鐫象牙圓印一紐，作大小二獅文曰：「中華民國萬歲」。進於尤先生逝世後二十一日，到首都莫愁路，仁孝殯儀館，焚香敬禮，伏棺慟哭。旋至蘆蓆營一百三十九號先生病歿之所，撫摩遺物，其嗣子少甫兄，秘書馬白眉出示斯印，因鈐一紙，

識其厓略焉。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三日馬小進呵凍書於白下寒月行窠。

文中所說尤令季，即初期革命黨人「四大寇」中的尤列別署。「中華民國萬歲」印文是篆書，卽是圓的，「中華民國」四字排在中心直下，「萬歲」二字，分列兩旁。這個印從未見有著錄，我們暫時不去理他。惟有說「中華民國」的名稱是起於一九零一年一月一日，似乎不對。因爲一九零一年的一月，即光緒二十六年的冬間，那時中國同盟會還沒有成立，且和總理手訂的「革命方略」，所用的中華民國國號，早了好幾年，事實有點不符，且中華民國萬歲的印文，有點不倫不類。恐怕是尤列的誤記年月，或後來刻印的存玩而已。

陸丹林先生著

革命史譚

吳稚恆題



陸丹林書

革命史譚

右任



## 馮序

自國民革命軍統一全國以來，國人始漸注意於編纂開國前革命史。十數年來，坊間出版關於清末民初之光復掌故及黨人軼事，有如雨後春筍，蓬勃不已。迄今所知者，已無慮數百種，倚歟盛矣。然細察各書之內容，大都根據前清官書及歷年舊報，輾轉鈔襲而來，於民黨艱難締造民國之真相，固未明瞭，而志士各自奮鬥之歷程，亦多隔闕。因而敘事述由，往往道聽途說，訛誤百出；求其真能探本求源，大體不悖事實者，百不得一焉。此何故哉？曰，是在執筆者不知研求事實之門徑，而缺乏考據徵實之過也。夫事實之真偽，不可不藉考據以明，而考據之方法，不外三種：所歷所見所聞是已。開國諸賢，能將生平身歷手經之大小事蹟，據實寫作，公之於衆，使後世史家，得所憑藉，頭頭是道，自屬難能可貴。次則以目擊爲比較可信，耳聞又次之。且有直接間接及遠代近時之別。若出夫間接或遠代者，則其信效更遞減矣。觀輓近各刊物之記載，屬於第一種之所歷者，固如鳳毛麟角，即所見亦寥寥如晨星之可數，要不出於

所聞一類而已。坐是之故，執筆者每多穿鑿附會，習爲故常。舉例以言：滿清官書，慣以竄改黨人名字筆畫爲能事，如總理之名文字，輒加水旁，改爲汝之類。此在前代稍有讀報經驗者，莫不知之。昧者不察，妄認滿清所竄改爲正確者有之矣。民國前五年，丁未四月，有革命軍舉義於粵省黃岡。黃岡，地在潮州饒平縣。昧者不察，誤認廣州之黃花岡，卽黃岡者有之矣。丁未九月，黨人嘗由日本僱日輪幸運丸運載軍械，至惠州汕尾海岸。昧者不察，竟誤會次年春發生中日二國大交涉案之二辰丸，爲革命黨所有者，亦有之矣。尤可異者，丁未十月二十七日，革命軍將領黃明堂關人甫等奉總理命攻佔廣西鎮南關礮台。總理得報，乃率黃克強等由越南河內首途，於二十八晚抵達礮台，事詳余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某書局小學教科書，竟謂總理親自督兵攻佔礮台，殊屬不符事實。此種歷史教程，關係兒童之常識，至深且鉅，誠不可不慎。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一言以蔽之，則亦缺乏考據徵實之過也。吾友陸子丹林，從事文化運動工作之餘，雅好研究近代史。黨中先進，多所晉接。三十年來，蒐藏革命史料，至爲豐富。本諸目擊耳聞與各方研求，攷證得失，分



析異同，雖一名一字之微，亦潛心探討，務求正確，是誠有志史事者矣。近成革命史譚一集，徵序於余，余與陸子在上海逸經社及香港大風社，同事多載，深知其所記史實，足以補充正史，而策勵學子。謹陳管見如右，并告世之讀史者。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一日南海馮自由序於陪都

革命史譚

## 自序

革命史譚，編定付印，趁此機緣，略述幾句，似乎不是多餘的話吧。

二十多年來，公餘之暇，每好研究近代史料，尤其是對於國民革命史，與會更較濃厚。可惜所蒐藏直接與間接的資料，還是不多。雖然搜羅所得有一部分史料，都已成了世間孤本，可是屬於片段的一鱗一爪的却佔了大多數。加上整理，比較，分析，綜合等程序，就要化去不少的時間。有時用了許多心思，纔整理好一點，偶然發見了新材料，又得把結論改動，甚至於全部推翻，也是常有的事。

存在上海與香港的八十多萬字的文稿和歷年所積蓄的文物，滬港淪陷，經過兩次遷徙，都沒有機會把它帶出。敝帚尙且自珍，何妨它是化去了不少的腦力和光陰積聚而成的寫作，留戀心情，是免不掉的。這些文物，將來是否能够無恙，是很難預料得到。況國遭寇亂，烽火連天，經籍蕩然，絕對不可用數字來估計其價值，個人所留存的區區圖書稿本，遭受摧滅燔棄，也是意中事。而且

這些史料，羈留歹土，在目前情況之下，搶運既不可能，只好任之而已。

去歲春夏間，寄寓粵北坪石的金雞嶺下，白沙橋邊的培聯校園，趁着風景宜人的環境，得暇便寫些稿件。這本革命史譚的文稿，有一半是在那時寫成，陸續在重慶的中央周刊，三民主義半月刊，組織旬刊，時代精神，國風，掃蕩報，桂林的黨義研究等刊物發表過。其中「總理在香港」一篇，是民國二十九年在香港的大風半月刊發表，近承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鈔副寄回編入。這些稿件，雖然在彙編的時候，曾經一度略事整理。可是爲了行篋中缺乏參攷圖書，其中所述事物，有許多全憑個人記憶，沒有方法再精詳考據，疏陋與舛誤，是所難免。這一點，深望同志們讀者們各就所知，拾遺補闕，賜予指政，俾得再版時修改，那是作者衷心的企望。

書中引用的人名，用名用號，以及紀年等，並不一律，這是當時因行文之便，信筆寫述所致。好在每篇各自獨立的，間有稱謂稍異，沒有什麼關係。還有幾段文言短稿，參在其間，爲了保全初稿原文，也沒有把它更改。修政統一，只好待諸異日了。

本書出版，深承無錫吳稚暉先生，三原于騷心先生題署，南海馮建華先生撰序，熱忱的贊助獎掖，光增篇幅，謹此表示謝忱。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二十日三水陸丹林寫於重慶。

革命史綱